

目 录

序言	1
----------	---

第 一 部 分

馬克思列宁主义, 还是修正主义

关于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提綱草案	9
-----------------------	---

一、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而不断地进行 阶级斗争, 还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1.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我党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的提綱受到了嘲弄	12
美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侵 略集团, 是世界上主要的侵略势力和战 争势力	12
削减軍費一百亿比利时法郎	15
互不侵犯条約	16
民主修改政府綱領嗎?	18
政策的失敗	19
核武器的扩散	19
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	21
印度反动资产阶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侵略	21

侵略社会主义古巴的威胁.....	25
政治局違背了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決議 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	32
2. 武器的性质能否决定一切? ——修正主义的 矛盾.....	33
3. “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傳和平, 是愚弄工人階級 的形式之一”	40
4.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有效地进行反对帝国主 义侵略战争危险的活动的指南.....	41
<p>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国际范围内的阶 級斗争, 还是在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 同资产阶级合作</p> <p>(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提綱和八十一个 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被拋棄)</p>	
1. 剛果.....	44
剛果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	45
比利时的軍事干涉.....	47
剛果和联合国.....	48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間的“和平共处”?	49
加丹加的停火.....	50
帝国主义对剛果的“新政策”.....	51
2. 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古巴——中国.....	52
3. 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呢, 还是新殖民主义?	54
現代修正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55
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各个阶段.....	58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	59

三、为当前的要求、为民主自由和为有利于人民群众的 改革而进行有效的斗争，还是长入社会资本主义

1. 反对单一法的斗争和百万人大罢工.....61
 - 紧缩政策.....61
 - 百万人罢工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62
 - 罢工.....64
 - 罢工过程中政治局的错误.....66
 - 罢工的后果，选举.....69
 - 勒菲弗尔—斯巴克政府.....72
2. 关于工厂的、职业的、职业间的纲领.....74
3. 行动和谈判.....75
4. 税收改革.....77
5. 社会纲领.....79
6. 把工资同生产和利润联系起来吗？.....82
7. 反罢工法案.....83
8. 争取改革的斗争——有各式各样的改革.....84
9. 联邦制.....92
10. 帮助左翼社会党劳动者摆脱改良主义呢？还是
援救右派分子呢？..... 101
11. 群众行动呢，还是议会迷？..... 106
12. 共同市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 108

四、要革命呢，还是要社会改良？要马克思列宁 主义呢，还是要修正主义？要共产党呢，还是 要改良主义的政党？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 结呢，还是要在修正主义基础上的假“团结”？

1. 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吗？..... 113
2.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是否必要？..... 116

3. 通过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	117
4. 国家是否为阶级的国家?	121
5. 修正主义者的“民主”手法	124
6. 是“后退”了, 还是从十一大到十四大	129
7. 政治局与威胁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团结的危险	131

第 二 部 分

社会革命党, 还是社会改良民主党?

关于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章

修改草案	141
一、一个修正主义的总纲领	143
二、是社会革命党, 还是社会改良民主党?	145
三、党章绪论(我们的草案) 或者马克思列宁 主义——我们党内团结不可缺少的基础	146
帝国主义	146
帝国主义的掘墓人	147
共产主义社会	147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可避免的胜利	148
马克思列宁主义	149
社会主义革命	149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151
比利时共产党	152
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 界胜利的时代	153
四、民主集中制, 还是官僚集中制	156

第三部分

愈来愈深地陷入修正主义

从政治局的暴力行为到它的制造分裂的

阴谋手段	163
------------	-----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及其后果

一、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手法	165
一个宗派主义领导集团的形成	165
既成事实	166
修正主义者害怕政治讨论	167
分裂主义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169
修正主义者的惶恐和“四人”的被开除	170
党领导机构的分裂活动与日俱增	173
二、比利时社会党右派与政治局相互支持	178
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路线”与实践中的修正主义	181
关于伯内尔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82
再论反罢工草案	185
党领导机构是否丢掉了自己的纲领?	186
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对西班牙贵族进行的“有效工作”	187
修正主义的骗局与有效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相对立	187
反对修正主义者所要的分裂——怎么办?	190

序 言

報紙和电台 1963 年 4 月 16 日宣布，四名黨員——大家熟悉的布魯塞爾地區委員會的領導人——被比利時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開除出黨。

代表大會主席團剝奪了他們的發言權，甚至拒絕他們進入會場。

布魯塞爾地區黨代表大會和這幾位黨員所在的基層組織均未得到通知。

這種不能容許的做法，理所當然地使人不能信任並加以譴責黨的領導。

現在，受類似這種專斷行為迫害的，已經是好幾百名布魯塞爾共產黨員了。這種專斷行為的目的，在於不惜一切手段，維持領導集團對黨的控制。

所有這些同志的“罪行”何在呢？

安特衛普全國代表大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絲毫未提及政治分歧的問題。

將近兩年以來，《紅旗報》一直用無恥的誹謗，既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政治觀點，又對他們本人進行人身攻擊。

* *

黨的政治局把自己所挑起的、分裂黨的嚴重衝突公開了。

難道只有誹謗別人的人才有發言權嗎？

受攻擊的同志們所闡明的立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

是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立場。經驗證明，只有這種立場，才能引導工人階級取得對資本主義的徹底勝利，才能引導工人階級達到社會主義。

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幾個專家的事情，也不是學派討論的對象；它們關係到整個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

因此，我們不得不出版這本書。

通過向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提出的黨章修改草案、工作報告和提綱草案，黨的領導集團企圖制定一種違背比利時共產黨第十一、十二和十三次代表大會決議的，違背 1960 年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憲章——的政策。

黨的領導的政策是修正主義的政策。

1957 年莫斯科宣言說：

“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

奉行修正主義就意味着：我們這個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先鋒隊的黨，被取消了。

修正主義者的政治活動是有危害性的，同時它還採取各種打擊手段，破壞列寧主義的行動準則和黨章。

修正主義者知道：如果遵守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如果全體黨員能夠行使共產黨員的正常權利，那麼，由上面強加於他們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很快就會被清除掉。

因此，他們對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的同志們開展一個

造謠中傷的運動，也正是為了掩蓋他們的活動。

領導機構里的修正主義者害怕黨內的同志得悉真實情況。

幾個月以來，他們再三再四地進行各種分裂主義陰謀活動。這些陰謀活動在今天已達到聞所未聞的程度。

* *

同時，政治局公開污蔑和攻擊了一些兄弟黨，這樣，便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推向分裂。

黨的領導人對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死敵，是秋波頻送，頌揚備至，而對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上進行鬥爭的革命戰士和兄弟黨，卻懷恨在心。

* *

然而，形勢對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多么有利啊！資本主義動搖得多厲害啊！

的確，我們的時代是資本主義腐朽的時代，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代。

偉大的十月革命打開了道路，十天的時間便震動了世界。一個落後的國家已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國有着六億五千萬人口，占社會主義陣營人口的三分之二——，在亞洲給了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對世界力量對比的变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從柏林到河內，從地拉那到平壤，從莫斯科到北京，組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擁有十億人口。

以後，勝利的古巴革命又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團結一致，社會主義陣營是不可戰勝的。它是爭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勝利的保證。

民族解放运动的偉大革命力量不断地壮大，猛烈地冲击着殖民奴役制度。占資本主义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还处在不能容忍的剝削与压迫之下；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即将被世界革命所突破的环节。

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正进行着不断高涨的斗争，反对托拉斯、壟断資本和它們的国家，维护他們的要求与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爭取社会主义。

劳动人民的一切胜利是战无不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各个壟断集团之間的竞争日益剧烈。

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正在激化。

的确，資本主义总危机的現阶段可能是个最后斗争的阶段！

在我国，壟断資本及其政府的进攻和阴谋詭計，却碰到了經常表现出意气風发的无产阶级，碰到了日益提高的阶级觉悟。

不久前的百万人大罢工，沃冷罢工，1961年底公用事业职工的行动，几星期前冶金工作人員的行动和反对反罢工法案的斗争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就是上述情况的证明。

直到现在为止，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一优秀的工人阶级取得其战斗性应该可以取得的成果呢？

誰使得国民收入中純工資部分下降了呢？

誰使得：

——对民主自由，对罢工权的威胁越来越明显了呢？

——我們同美帝国主义指揮下的北大西洋公約侵略集团勾結在一起的呢？

——軍費开支有增无减呢？

为什么在我国工人阶级具有如此战斗性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仍然如此强大呢？

其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騙人的思想，是比利时工人党和比利时社会党先后宣傳了几十年的这种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

是：

——这样的一种改良主义，它按照我党领导机构中修正主义者嘴里的詞汇，把革命者称为危险的、沒有耐心的人，教条主义者、空論家和浪漫主义者。

——这样的一种改良主义，它认为談判可以代替行动。

——这样的一种机会主义，它只談所謂的“实效”和“明智的妥协”，以掩盖其投降行徑。

——这样的一种改良主义，它断言应当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它頌揚资产阶级的議會制。

——这样的一种改良主义，它为了在资产阶级挑起的大屠杀中，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去，而不断地否认战争的阶级内容。

——这一类改良主义者，他們誣蔑革命者希望战争，誣蔑社会主义国家是侵略性的国家！

——这一类改良主义者，他們謊称为和平服务，背叛了西班牙共和国，贊成慕尼黑，从而把世界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們参預冷战，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这样的一种改良主义，它显然不要战斗的、先鋒队的

党。

——这样的一种改良主义，它掌握着强大的組織，用以向工人階級內部滲透資產階級思想，把中央各部門“老爺們”的欺騙性決議強加給工人階級。

——这样的一种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其失敗，一直是任何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甚至是任何局部成功的先决条件。

——列宁毕生与之斗争的机会主义、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改良主义。

这种改良主义建立了些什么呢？

除了失望和背叛之外，它給工人階級带来了些什么呢？

无产階級越来越厌恶它了，并竭力要摆脱它。

*
* *

目前，党内情况如何呢？

政治局在最近三年中加紧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今天，它想把什么东西强加給我們呢？

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和实践是惊人地相似，以致不能不引起黨員積極分子的警惕。

难道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是“新思想”嗎？

难道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变得沒有意义了嗎？

*
* *

中央委員會起草的提綱草案和新党章第一条构成了在我国推行的現代修正主义的完整綱領。

塞尔治·科尔斯、雷納·兰多尔夫同志和我自己，那时候为准备代表大会而草拟了两个文件。

其中之一，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它一方面批駁了提綱草案

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同时也阐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

这个文件于 1963 年 3 月 1 日脫稿。以后，我們只作了若干修訂，特别是关于对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估計和关于瓦隆人民运动作用的分析。

另一文件，即党章修改草案，政治上最重要部分的詳細摘要，构成本书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也保持了原来形式。

莫里斯·德洛涅、莫里斯·馬索茲和其他同志們为撰写第三部分，为全书政治上和文字上的校正，贡献了力量。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将近两个月的今天，党员們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們还看不到代表大会“通过”的所謂提綱。宗派主义领导集团的“老爷們”还在为之“加工”……

这說明，对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他們并不賦予任何价值和重要意义，而这次代表大会却是他們的杰作，他們自称这是他們的代表大会。

总而言之，领导机构起草的工作报告、提綱草案和党章修改草案暴露了领导机构的真面目。它的政治实践和它所使用的反党专断方法，也表明它是有罪的。

不要很长时间，党领导机构里的修正主义者就会被所有誠实的共产党员从革命工人运动中清除掉。

向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目标前进，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目标前进。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雅克·格里巴

1963 年 6 月 5 日

第 一 部 分

馬克思列宁主义, 还是修正主义

关于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
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
工作报告和提綱草案

在开展爭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中，在爭取滿足要求、爭取民主自由、爭取有利于劳动者的改革的斗争中，中央委员会有没有奉行一种符合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利益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经常关心保卫我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最高利益，有没有经常关心促进那些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民以及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特别是对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刚果、古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开展必要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及其对工人阶级的腐蚀、反对构成当前主要危险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同时也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关心加强劳动者的斗争意志，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工人阶级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有所准备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正确地执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的指示和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检查一下，这些提纲是否已由事实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证实呢？

中央委员会在制订政治路线时有没有正确地估计到形势的一切具体方面和一切新因素呢？

中央委员会有没有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总而言之，中央委员会有没有起到一个革命党、先锋队 and 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机构的作用呢？

这些就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应该回答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就会使人看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总的来说，没有完成任务。

一、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而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还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1.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受到了嘲弄

美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集团，是世界上主要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

我们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揭露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主要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是欧洲的和平共处、裁军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头号敌人。

声明还揭穿美帝国主义领导下的、并有英、法、西德等帝国主义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参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军事集团的侵略性。

根据工作报告和提纲草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其本质来说，已谈不上什么侵略性了，问题已不在条约本身，而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极端分子”了，波恩复仇主义者就是这些极端分子的代表。

工作报告一方面承认：

“美国壟断集团繼續奉行一种超軍备政策，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鼓励德国侵略意图。”

但另一方面宣称：

“……美国不得不提出更具体的裁軍建議，不得不在柏林問題上繼續談判，并遏制德国軍国主义者过份好战的言論。”（提綱草案第一条、第二条）

1962年9月7日（肯尼迪决定侵略古巴所采取的严重措施六个星期之前），让·特尔夫在《紅旗报》上写道：

“在爭取和平的斗争中，肯尼迪起着主角的作用……”

“肯尼迪总统走上了和平道路。現在重要的是：防止他走上另一条道路。”

让·特尔夫又在1962年2月4日和5日的《紅旗报》上发挥了同一論点。而且，在让·特尔夫看来，“加强肯尼迪的地位”已成为爭取和平的行动目标了！

为了支持他的論点，让·特尔夫还引证了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停止核試驗的談判。然而，同一个《紅旗报》却指出，在英国的支持下，美国不願停止核試驗！果然，几天之后，美国又进行地下核試驗了。

至于勒菲弗尔—斯巴克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如果說它曾对談判的必要性作过积极的声明……但它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极端分子的压力下，逐步屈服了”。

关于斯巴克，1962年9月7日的《紅旗报》确曾說过：“他脑子里考虑的显然是均势解决办法。也正是因此而使他得到威信”。

因此，中央委员会，从机会主义陷入修正主义，把下列論点規定为所謂爭取和平斗争的三个基本观念之一（提綱草案第三十七条）：

“特别重要的是癱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极端分子。

共产党并不认为比利时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可能的。但是它认为：使比利时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反对冷战狂热分子則是可能的。这些狂热分子，例如波恩复仇主义者，否认走向緩和局势的必要性。”

放棄階級立場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是有其必然的邏輯的。

中央委員會不是去分析戰爭危險的真正原因和爭取和平斗争的基本力量（在我国，是工人階級联合其他劳动人民阶层和利用帝国主义內部和壟断集团內部的矛盾），而是对形势进行了一种十分主观主义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和最明显的事实完全相違背的，这种分析的基础是使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行动服从这个或那个壟断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立場。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綱草案里，一次也沒有揭露作为世界主要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的美帝国主义，这难道不是已經够意味深长的了嗎？

分析国际形势而“遺漏”这样基本的因素，只能是錯誤的分析。因此这种分析只能导向錯誤的結論，导向根本錯誤的政治路綫。

- 信任斯巴克的“均勢解决办法”(?)；
- “肯尼迪，是爭取和平斗争中的主角”；
- “肯尼迪走上了和平的道路”；
- “加强肯尼迪的地位”；

这样就完全錯了。

1961年11月20日《紅旗报》社論向肯尼迪进言：“要郑重地确定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的領導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說應該？）不退出而完全并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便在該組織內起“有效的”作用，来

加强肯尼迪(和斯巴克)的地位!

轉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地来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似乎都需要肯尼迪的支持。肯尼迪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的代表。放棄反对战争危险的真正斗争,从而什么都是“有理由的”了。

削減軍費一百亿比利时法郎

我們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曾經认为“目前比利时在爭取和平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任务”是:迫使政府削減軍費一百亿。

事实上,中央委员会已放棄了这个目标和要求,而代之以另一种目标:“不再增加軍事开支”!

很久以来,我們就习惯了社会民主党在它的代表大会和竞选綱領里提出某些正确的口号和要求,但是后来它們就借口“现实主义”、“效率”、“責任心”和“必要的妥协”,而把这些口号和要求一脚踢开了。

我們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綱很好地解釋了削減一百亿軍費这一目标的意义:它意味着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指令一刀两断(恢复到朝鮮战争前的預算),并且指出哪里能获得必要的錢来满足工人的迫切要求。

“冻结軍事开支”这一目标絕不意味着依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侵略集团这种对外政策的根本改变。它不能同动员劳动者提出要求联系起来。它和某些资产阶級集团(包括某些极端分子)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些集团批評军队中的“浪費現象”,他們只希望军队开支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工作报告企图为此进行辯解,說什么“削減一百亿軍費”是一种“解釋性的”(?)口号,而“冻结軍費”則是行动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党本来應該使党员具有的信心,就被中央委员会的这种

态度所破坏了。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难道就不再是行动目标了吗？

一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指出“削減一百亿軍費”不是行动口号，而另一方面，同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提綱草案，却說“有监督的普遍裁軍已成为当前的行动目标了”！

如此自相矛盾的政治观点，难道有一点点严肃之处嗎？

事实上，在这方面犹如在其他方面一样，这几年来政治局的政治态度沾染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被这种或那种时髦观念，成者是自以为是时髦的观念，牵着鼻子走。

互不侵犯条約

我們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規定的爭取和平的具体斗争的其他方針是：

——完全停止核試驗，作为完全銷毀核武器的第一阶段；

——支持一切裁減軍备的倡議（腊帕茨基計劃和非軍事化地区）：

——防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繼續奉行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政策（这个目标特別包括不使西德国防軍获得原子武器，不許在比利时領土上建立德国軍火庫）；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以上这些方針，都已經被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没有討論过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华沙条約成員国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条約”这一“新”口号所淹沒了。一年半以来，这个“新”口号已被看作为首要的目标，看作为爭取和平斗争的三个基本观念的首要观念（提綱草案第三十七条），看作为“当前最完全和最切实际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为其他的解决办法开辟道路，而不排除任何一个解决办法”（1962年7月14日《紅旗报》）。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提出这种互不侵犯条约，作为缓和局势的若干措施之一。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支持这项建议。但是，对任何一个通理的人来说，这种条约的政治价值，只有迫使帝国主义者事先或至少同时，采取缓和局势的具体措施，才有意义；就是说同它们的侵略政策完全不同的措施，真正能巩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措施。

联合国宪章不是已经含有不使用武力和消除任何侵略行为的庄严保证吗……？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不惜任何代价，顽固地在群众中宣传（而且毫无结果）这种思想：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是“孤立原子冒险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关键”。（见1962年5月10日《红旗报》，埃内斯特·伯内尔评在别的口号下进行的伟大的5月8日运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宣传有什么根据呢？

1961年9月，柏林问题和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缔结和约问题，曾经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消息。而且，即使不是唯一的焦点，似乎也是焦点之一。当时本来应当迫使帝国主义至少在这一方面放弃它们的侵略政策。

赫鲁晓夫曾肯定和约将在那一年签订。帝国主义者意识到他们地位的软弱而显得有点不安。当时斯巴克就插手进来，拿出他的“出色”的替代办法：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从那时候起，政治局就把这个口号提到前面来了。这样做，恰恰符合后来当斯巴克已经像丢掉一件过时的上衣那样丢掉了他的“英明的”想法时所清楚地表明下列估计：

“况且，继保罗·雷诺和范范尼先生之后，斯巴克也在去年9月访问了赫鲁晓夫，这难道不是一次重要的活动吗？听了当时斯巴克的声明，难道还不能认为：他终于找到了谈判和缔结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一真正的均勢辦法嗎？”

保羅—亨利·斯巴克的這種暫時的而且其動機是很明顯的立場，竟然成為黨爭取和平鬥爭的主要目標了！

始終是同一看法：一切都好像資產階級政客保羅—亨利·斯巴克是爭取和平鬥爭的主角之一，因而也是我國爭取和平鬥爭的唯一主角了。

而且，在這方面，政治局的這種態度，和 1954 年前我黨領導的態度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者，當時的口號是宗派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而現在則是右傾機會主義。

例如 1962 年 5 月 8 日，強大的群眾組織，其中有比利時總工會、天主教工會聯合會和自由工會，都以罷工和示威來支持：

——爭取和平，

——停止核試驗，

——原子能只用於和平目的，

——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國際問題，

——為在國際監督下普遍裁軍而締結必要的協議，

這一廣泛的運動。

黨的領導想要把自己表現得非常杰出，而提出“互不侵犯條約”這一口號，這就使 1962 年 5 月 9 日的《紅旗報》上出現了下列標題：

《幾十萬工人罷工。發電報給日內瓦會議，要求簽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間的互不侵犯條約》。這一標題有意歪曲 5 月 8 日這一天的性質和內容。

民主修改政府綱領嗎？

在國際問題上，黨的領導事實上已經拋棄了真正的鬥爭的

立場。放棄到了什麼程度，特別可以從伯內爾 1962 年 10 月底的談話中衡量出來。談話的題目是《爭取民主修改政府綱領》。

在涉及國際政策方面，伯內爾考慮的唯一一點是“凍結 1963 年全年軍事開支”。

在伯內爾看來，一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只限於凍結軍事開支，就應該得到共產黨的同意和支持了。

關於大量削減軍費，在比利時駐扎能攜帶原子彈的空軍，在我國建立外國基地、特別是德國基地，延長兵役時間，對剛果、共同市場和歐洲煤鋼聯營的態度，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後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緩和國際局勢的倡議，等等這些問題，當前竟和這種所謂民主地修改政府綱領沒有關係了。

政策的失敗

工作報告的第一章第三點承認：“因此，我們應該看到，為什麼爭取和平的鬥爭尚未達到能夠阻止壟斷集團的罪惡行動的規模。”工作報告的以後部分還確認“其原因應該主要從我們自身、從我們黨內去找”。

但是，中央委員會不去批評它自己所奉行的政治路線，不進行自我批評，而是像一切堅持策劃的領導一樣，事實上認為失敗的原因是由於同志們的不了解，由於同志們對這些“新思想”沒有足夠的認識，沒有很好地執行！

實際上，修正主義的失敗的根子在於這些事實。

核武器的擴散

各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國家擁有大規模破壞性武器，以及這些武器愈來愈擴散，感到特別的不安。

除了美国——主要资本主义原子大国之外，英国和法国都正在建立它们自己的原子“打击力量”。

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直接地或者是根据各种军事协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许多核基地。从土耳其到台湾、在美国本土、在英国、意大利和其他许多国家建立的八十个基地，威胁着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

配备着核武器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航行在海洋上。携带氢弹的飞机在空中不断地飞行着。

是的，各国人民都反对扩散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核武器，不论是挂美国招牌的，还是挂其他国家招牌的。

1962年6月21日《红旗报》不加评论地转载了比利时保卫和平联盟的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得到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和合作而出版的，它特别指出：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愈多，爆发原子战争的危險就愈大。如果人们不加以警惕，这种核武器就会扩散。根据某些人的说法，中国不久将拥有这种武器；邻近我们的德国正在坚持要求核武器；如果不停止军备竞赛，德国的要求就会有兑现的危險”。然而，美国确确实实在把核武器扩散到世界各地，却没有作为扩散危險而受到揭露。

但是，《红旗报》却支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是和平的）和波恩的复仇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宁可使六亿五千万中国人忍受来自美国本土、冲绳岛、菲律宾和太平洋任何一点的核侵略，却不能让他们拥有原子武器！

这难道是为和平事业服务，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沮丧吗？

这是欺骗人民，这是为帝国主义效劳。

階級鬥爭的不同形式

對我們共產黨人說來，反對世界大戰危險的鬥爭，爭取和平的鬥爭，以及爭取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和平共處的鬥爭，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其他形式的鬥爭，同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都是沒有矛盾的。

恰恰相反！

這些其他形式的階級鬥爭和這些革命運動打擊戰爭力量和帝國主義力量，削弱它們的力量，在客觀上加強和壯大世界和平力量。

正是根據這樣的精確，我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聲明反對反動派企圖在剛果進行血腥冒險，支持剛果人民的鬥爭。我們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英勇鬥爭也表示了關懷。

根據幾年來的局勢，特別還應該加上對受侵略之害的古巴、越南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注。關於西班牙、阿爾及利亞和剛果，我們在後面還將談到。

印度反動資產階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

關於印度侵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作報告竟一字不提！

在這個問題上，《紅旗報》簡直和大多數資產階級報紙唱同一個調子，有時比社會民主黨的報紙還要更右些。《紅旗報》只轉載新德里的造謠消息。

黨內有人提出了抗議，而《紅旗報》是這樣解決問題的：1962年11月15日和16日，該報僅僅轉載了新德里的消息，和資產階級報紙轉載的一模一樣，並且謊稱是北京的消息！

這些手段是難以想像的。

如果在反對侵略和戰爭危險的鬥爭中，不依靠人民的行動，

而宁願指望像肯尼迪和斯巴克这类主角，指望在反动的民族主义的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所謂“第三种力量”，那就不得不隱瞞真理，不得不歪曲事实，不得不采取敵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場。

資產階級報紙和《紅旗報》无耻歪曲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不仅对于一切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于一切不受錯誤思想蒙蔽的人來說，情况是很清楚的：事实駁斥了政治局的歪曲和誹謗。

代表印度反动資產階級的尼赫魯，在对內政策和对外政策上愈来愈陷入反动立場，这是很明显的。克拉拉邦所发生的事情，便是一个例证。

成千上万的印度劳动者，由于示威反对极端貧困，而死在尼赫魯的警察的子彈下。少数民族遭受压迫，种姓制度繼續存在。

印度反动資產階級，在同帝国主义的合作中，越来越依靠帝国主义大国的投資，特別依靠所謂“美援”。这种“援助”高达几千亿比利时法郎（去年一年約六百五十亿比利时法郎）。

自称“反帝”的印度反动資產階級（同时却使印度留在英联邦內）越来越执行和帝国主义，特別是和美帝国主义同謀的政策，这是不足为奇的。

必須撕下尼赫魯在国际政策上所謂“不結盟”的假面具。讓我們举几个尼赫魯立場的例子：

1956年：誹謗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1958年：为美英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和約旦辯护；

1958年：为伊拉克人民的敌人和劊子手費薩尔之死，表示遺憾；

1960年：拒絕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日軍事条約的斗争；

1961年：当美国的雇佣兵企图入侵古巴时，尼赫魯发表声明

說：“印度既不能，也沒有資格，根據古巴的國際形勢，判斷誰是誰非。”

1959年，印度軍隊在中國領土上進行了攻擊。我們的中國同志，多次建議談判，但沒有結果。早在1959年，中國同志就建議雙方武裝力量從實際控制綫後撤二十公里，以便創造談判條件。此外，中國軍隊還單方面從這條控制綫後撤了二十公里。印度軍隊佔領了這個地區，重新恢復了侵略活動。1962年10月15日，本來談判即將恢復三天前，尼赫魯下令進攻。究竟誰是侵略者呢？新的進攻發動後，我們的中國同志又建議停火，各從實際控制綫後撤二十公里，並舉行談判。但尼赫魯狂妄地拒絕了這些建議，他的軍隊進一步深入中國領土，在某些地方甚至越過了印度反動資產階級繼承英帝國主義後所主張的所謂“麥克馬洪綫”。

以後的事情也是盡人皆知的：中國邊防部隊打退了侵略者。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議：立即停火，撤退到1959年的實際控制綫，在這條控制綫兩側建立一個二十公里的非軍事地區，並舉行談判。儘管尼赫魯拒絕這些寬宏大量的建議，我們的中國同志還是撤回到它所提出的這條控制綫，再一次證明他們的和平願望。此外，我們的中國同志原則上接受了科倫坡會議六國代表的建議，但是，在最重要的舉行談判這一點上，六國建議被尼赫魯拒絕了。

誰趕去救尼赫魯的呢？是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是南朝鮮和南越的腐敗政權。蘇聯以米格21戰鬥機供應印度的消息，在我們的隊伍中引起很大的震動，也使消息不靈通的、受欺騙的我國輿論，迷失方向。

在印度共產黨內，一部分領導表現出政治衰退，稱贊尼赫魯的侵略，並且捐工資給反動資產階級購買軍火，而另一部分領導

則被关进監獄并受到死亡的威胁。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应当和被侵略的社会主义国家團結一致。对我们來說，这意味着要頂住情緒激动的狂徒，要有勇气看到真理，并說出真理，代表印度反动資產階級的尼赫魯是侵略者。

1962年11月6日布魯塞爾地区委員會执行局作出了一項決議，揭露尼赫魯是侵略者，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声援。全文如下，

“共产党布魯塞爾地区委員會执行局注意到，一部分輿論在中印边界問題上受到歪曲报道的欺騙，茲特，

——提醒注意：人民中国不仅同印度有边界問題，而且同尼泊尔、巴基斯坦和緬甸也都有边界問題；

——強調指出：人民中国同尼泊尔、巴基斯坦和緬甸通过談判，已和平地解决了这些边界問題；

——提醒注意：許多年来已向尼赫魯的印度提出过和平解决的一样建議；尼赫魯頑固地拒絕进行任何实际談判，甚至利用人民中国从实际控制綫后撤二十公里的单方面諾言，占領了这块撤出的領土；尽管对人民中国进行种种挑畔，但它仍然繼續不断地建議談判；1962年10月12日尼赫魯公然告訴全世界，他已命令他的軍隊驅逐中国人；在人民中国的領土上发动了进攻；

——譴責代表印度反动資產階級的尼赫魯，他是侵略者，他伙同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陣营挑畔；

——要求比利时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贊成恢复它在联合国被傀儡蔣介石窃踞的席位；譴責印度反动資產階級的侵略阴谋，贊成苏联和人民中国建議的不帶任何先决条件的談判。”

为尼赫魯宣傳的《紅旗报》不发表这个決議。先是政治局，后来是中央委員會，竟譴責这个決議，說它違背党的路綫！！

在这些事件中，中央委员会不仅違反了最起码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义务，而且事实上已站到帝国主义帮凶那边去了。

侵略社会主义古巴的威胁

阶级斗争最紧张的时期更清楚地暴露了机会主义者的立场。它迫使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暴露出自己是斗争和行动的敌人，革命的敌人，因而就有意无意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1962年10—11月加勒比海事件又一次暴露了政治局的机会主义立场。

对于那些不管这些事件，而仍然认为“肯尼迪是争取和平的主角……”，“肯尼迪走上了和平道路……”，“应该加强肯尼迪地位……”的人，不可能对古巴有真正团结一致的行动，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也就必定会继续把斯巴克看作是和平人物。在1962年10月24日《红旗报》第一版上，不加评论地引用斯巴克称赞肯尼迪的声明，其标题是：《斯巴克赞成谈判》。难道这是可以容许的吗？

在1962年10月23、24、25和26日《红旗报》第一版的标题中，“支持古巴”这样一个口号一次也没有出现。这样还配称为共产党报纸吗？1962年10月27日和28日，我们党出版了一个宣传专刊，并发行了好几千份。当时我们正处在人们所说的“加勒比海危机”的高潮。有一页是关于埃内斯特·伯内尔的谈话，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古巴事件！

在那一页的背面，如果说美国侵略古巴的战争措施受到了

譴責，但仍找不到支持古巴的具体行动口号。罗伯·达歇还在坚持說古巴沒有发射台，而赫魯曉夫此时却已經证实了这件事。

*
*
*

10月27日馬特維夫在《消息报》上說得对：“美国有些人，以他們无耻的討价还价来衡量一切，以为，可以让出接近苏联領土的几个美国基地，以換取古巴放棄其反对美国侵略的防御手段。例如《紐約时报》駐华盛顿記者10月25日的文章中就是这样推論的。这类所謂建議只不过暴露了建議者的恶意罢了。”

但是同一天，赫魯曉夫却“同意从古巴撤出肯尼迪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而以美国从土耳其撤出类似武器为交換”。

翌日，10月28日，肯尼迪在一封罕有地驕橫的信件中，提出他的“美国和平”的条件：“在适当的联合国視察和监督下，把这些武器系統撤出古巴，并且在适当的保证下，肯定不再把这种武器系統运入古巴。”在作出这方面的适当安排之后，美国就“馬上取消隔离措施，并提供不进攻古巴的保证”。

然而，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代表的话，特别是肯尼迪的话，有多少价值。尤其是在古巴問題上，大家都知道，美国侵略政策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肯尼迪的“保证”又有多少价值！

10月28日赫魯曉夫在复肯尼迪的信中說：

“我对您1962年10月27日信中所作的声明表示尊重和信任，这个声明就是不对古巴进攻……正如我在10月27日的信中通知您的，我們同意同您达成協議，让联合国代表去古巴核实您称之为进攻性武器的拆除工作。”

*
*
*

《紅旗报》1962年11月8日的标题是：

《赫魯曉夫說：要么我們信任肯尼迪的諾言，要么就走向戰爭》。

根据《紅旗报》的解釋，人类的命运，战争与和平，都取决于我們是否信任肯尼迪的諾言。防止世界大战不再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斗争，不再取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取决于我們是否信任肯尼迪。

这种“推論”的邏輯結果，必然认为：要对战争危險負責任的，不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那些对肯尼迪不信任的人，例如我們的古巴同志們。

而且，让·布魯姆在1963年2月12日《紅旗报》上就是这样說的。他把原应属于帝国主义的罪責，归之于那些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危險的人，归咎于那些号召人民保持警惕以防止威胁和挫敗侵略者（如果侵略者发动疯狂进攻的話）的人。实际上，如果帝国主义者不認識到人民能够挫敗他們，那么侵略的危險就不能够防止。

面临着侵略的危險而不动員群众，这就是准备让自己彻底失敗。

以古巴的主权做交易，同意把古巴变成又一个剛果，来换取肯尼迪不侵犯的諾言，这不是妥协的基础。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对这种要求驕傲地回答說：不！他們提出了五項真正保证的条件。

*
*
*

1962年11月6日，当还在对古巴实施海上軍事封鎖时，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以多数票通过了下列決議：

保卫古巴，就是保卫和平。

“共产党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意識到，美国在加勒比

海挑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尚未结束——肯尼迪政府已提出若干新的要求，并使它自己在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交换信件时所作的保证成了问题，兹特：

——强调指出：全体公民必须提高警惕，以便挫败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美帝国主义已经，并且不会不，乞灵于这些新阴谋，企图实现其根本目标：消灭卡斯特罗领导的人民政权和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

——要求一切正直的人们积极声援古巴，使古巴人民获得他们认为必要的保证，以便确保他们的主权，确保他们的独立，确保他们有可能来建设他们所选择的制度，这种国际声援是挫败那侵略成性的、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新计划的主要条件之一；

——认为声援古巴人民保卫权利，是保卫和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呼吁人民要求政府不支持美国侵略集团，特别是拒绝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任何封锁古巴的行动，要求政府采取或支持一切旨在保证古巴独立和世界和平的行动。

1962年11月6日”

先是政治局，后来是中央委员会，都认为这项决议是违背党的路线的。

我们党的领导就是这样一个谴责一项呼吁支援古巴人民决议的领导！

* *

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一个问题的第二点说道：“他们（美帝国主义最富侵略性的集团）在这一地区（实行经济封锁、破坏交通、侵略这个岛屿的威胁）所挑起的、把世界推向热核战争边缘的严重危机，已由于苏联和古巴的冷静而得到解决……”。

然而，經濟封鎖、破壞交通和侵略这个島嶼的威脅仍然存在，有了些什么變化呢？

同我黨政治局的意見相反，我們贊成並支持菲德爾·卡斯特羅 1963 年 1 月 16 日在哈瓦那舉行的美洲婦女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對我們說來，加勒比海危機並沒有得到解決。我們的意見是，避免了一場戰爭，但沒有贏得和平。迫使我们採取我們曾經採取的那些措施和迫使我们採取我們曾經採取的那些步驟的一切情況，還依然存在，這難道不是真實的嗎？難道美帝國主義者公然宣稱的敵視和侵略我國的政策不是依然存在嗎？我們不相信肯尼迪的話，而且肯尼迪也沒有許下什麼諾言。如果說他曾經許下過什麼諾言，那麼他也早已把它取消了。

“因此，我們說，對我們說來，並不存在實現我們在那次危機中提出的五項要求的令人滿意的保證。如果說，我們仍在这里，只是由於肯尼迪的諾言，這就不是真實的了。

“對我們說來，和平是什麼呢？我們現在有的是什麼樣的和平呢？自從肯尼迪在奧蘭季博爾發表談話以來，帝國主義特務已犯下了四次謀殺罪行，他們攜帶美國武器，執行美國命令，這是帝國主義者公開宣稱的顛覆政策……

“我們當時是怎樣說的呢？我們曾說，如果帝國主義者自認為有权用飢餓來扼殺我國，孤立我們，在空中和海上的一切航綫上施加壓力，剝奪我們的基本原料物資，在我國製造飢餓的話，如果帝國主義者自認為有权不顧國際法、不顧聯合國的原則，而執行這一封鎖我們、給我們製造各種不可設想的困難的政策的話，如果帝國主義者自認為有权擾亂我國的社會秩序、運送武器、派進來和訓練從事破壞活動的特務、並組織雇佣軍的話，如果帝國主義自認為有权侵犯我國領海和領空的話，如果帝國主

义者自认为有权組織海盜集团的話，如果帝国主义者自认为有权賴在我国的一块領土上；威胁我国心臟的話，如果是这样，怎么能使問題获得解决呢？

“帝国主义者有什么权利要求撤走朋友的武器，而在我們祖國的土地上保留着敌人的武器呢？这是些用于侵略的武器。帝国主义者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肯尼迪先生在危机后发表的三次声明中，使用了威胁性的欲言又止的語言，坚持他在經濟、政治和其它方面对古巴施加压力的政策，他說如果我們不策动顛复活动，他就保证不侵犯古巴。但是，对肯尼迪說来，一个討論拉丁美洲飢餓和极端貧困問題的妇女代表大会，就是顛复活动。”①

卡斯特罗还提到肯尼迪在奥兰季博尔向雇佣軍的講話，他在这次講話中說：他将在哈瓦那把雇佣軍的旗帜交还他們。卡斯特罗还提到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的講話，腊斯克說：美国沒有作过任何不入侵古巴的保证。

“他們在这样說的时候，不但否认他們不入侵古巴的諾言，而且也否认根据国际法的規定有不进行侵略的义务。此外，他們还暴露了美国統治者的强盜和海盜的本性。

“帝国主义者表现出某种乐观情緒，这反映在他們的估計中。我并不认为这种乐观情緒有任何根据，它只不过是过低估計了世界的现实，过低估計了各国人民的力量。”“当然，他們希望在拉丁美洲連一个指头都不要动一动，他們希望各国人民不要起来斗争。例如，委内瑞拉人民的英雄行为對他們來說，是一場可怕的惡夢。他們希望能讓他們在更加慘无人道的剝削的基础上平安无事地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基础。……

① 參見菲德爾·卡斯特羅：《在美洲婦女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4頁。——譯者

“……也有个别的人批评我们。很自然，有些好心的、感到困惑的人，或居心不良的人，就古巴自危机发生以来，在视察和海盗飞行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批评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在这些人看来，似乎我们应该让人来视察，应该授权帝国主义者指定什么武器我们可以有，什么武器我们不可以有。似乎我们应该让这个国家退回到普拉特统治的时代。

“接受视察，就是意味着我们同意向美帝国主义请示：在我们领土上，哪一类武器我们可以拥有，哪一类武器我们不可以拥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就等于是放弃我们的主权，等于承认我们国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低人一等。我们现在不接受这一点，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这一点。

“以为这是可以接受的那些人，还认为应该让他们登陆而对他们不放一枪，因为这条道路正好是导致这个结论。但是，走这条道路，就不能在吉隆滩保卫住革命。这一切得以实现是由于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的道路。

“这些人似乎认为：我们应该让美国飞机在我们高射炮头顶上‘俯冲飞行’，而不要下令开火。这一点，我们是永远办不到的，因为敌人必须估计到，我们永远只能在战场上，而决不能在叛变中见面。

“我们要的是拥有权利、拥有主权和拥有尊严的和平。我们要和平，但决不会放弃革命者的立场，决不放弃革命。

“向侵略者投降是导致战争的道路，是使各国人民遭受奴役的道路。我们为保卫我们的主权和权利而斗争，正就是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当我们向拉丁美洲人民谈话，向他们说存在着进行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在保卫和平。因为帝国主义越软弱，它的危险性和侵略性就越小。各国人民维护自己主权和独立的斗

爭，就是爭取和平的鬥爭。

“我們是戰爭的敵人；正是帝國主義者把戰爭強加給人類。帝國主義者愈是覺得自己強大，他們就愈是具有危險性。因此，全世界各國為爭取自己主權和獨立而鬥爭的人民，都在保衛著和平。”①

政治局違背了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決議 和八十一个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

分析一下政治局以及追隨它的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方針和工作，就可以看出：自從列日代表大會以來，在爭取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侵略政策的鬥爭方面，黨的領導已經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破壞了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八十一个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越來越走上了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道路。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和提綱草案，証實了、並加深了這種傾向。

儘管領導上有這種錯誤傾向，許多黨員和黨的組織仍然忠於我們的原則，在反對戰爭危險，保衛和平的鬥爭中，發揮着先鋒隊的作用，進行着廣泛的積極的活動，並採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如請願、派出代表團、遊行示威、在工人組織和其他組織中提出決議草案、罷工等等……。

我們特別指出如下一些活動：

- 反對在比利時的德國基地，反對駐紮德國海軍，
- 爭取柏林問題協商解決，

① 參見《在美洲婦女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第14—19頁。——譯者

- 爭取停止核試驗，禁止核武器，
- 反對德國軍國主義的危險，
- 反對在比利時駐紮攜帶原子彈的空軍，反對建立原子基地的危險，
- 爭取削減一百億軍事開支，
- 反對延長兵役時間，
- 積極參加“5月8日運動”，
- 擁護支援古巴，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等等。

2. 武器的性質能否決定一切？

——修正主義的矛盾

修正主義者提出一個“巨大的發現”，熱核武器已經“在本質上改變了戰爭的性質”（提綱草案第六條）。

根據專家們的看法，上次世界大戰中，交戰國所擁有的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已具有消滅大量人口的威力。

當然，現有的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壞力，足以造成空前的毀滅。描繪世界熱核大戰的恐怖情況，那是容易的。

但是，面對着威脅和危險，怎麼辦呢？

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喚起勞動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可怕罪行提高警惕，因為如果帝國主義並不由於害怕會受到人民懲罰和遭到徹底失敗而被迫住手的話，他們就會毫不遲疑地去犯下這種罪行。

各國人民的這種警惕性，應表現為經常的、堅決的行動，組成最廣泛的聯盟，以便對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潑冷水，削弱他們，並且明白地警告他們：發動侵略就是自取滅亡。

修正主義者大肆宣傳核武器的恐怖、神秘、令人喪失信心和

毁灭性。

众所周知，杜魯門曾在广島和长崎使用过原子彈，他并不是为了消灭那几乎已經是屈膝投降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威胁苏联和革命运动，尤其是威胁正在向前发展的中国革命。

美国的原子訛詐，作为政治武器和思想武器，就在那时候开始了。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对之屈膝。在美帝国主义实际上壟断着原子武器和軍事上占压倒优势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取得了胜利。

联合国支持下的、美国在朝鮮的侵略被打敗了。

在美国的大門口，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古巴解放了。但是修正主义却企图制造混乱，在所謂和平主义的幌子下，事实上只是为帝国主义原子訛詐帮忙。他們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鋒队内部，贩卖投降主义和懦怯思想。

不仅如此，例如，当中国人民拒絕向原子訛詐屈服时，他們竟指責中国人民是“好战分子”，是想打原子战争！

誰看不出这类誣蔑有多么荒謬和可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要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現在并不是一个“原子大国”，它自己不掌握原子武器，却受到帝国主义热核武器的威胁。

修正主义者所恼怒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帝国主义的訛詐面前，毫不屈膝，正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高举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旗帜。

战争的性质是否在本质上起了变化呢？

說穿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战争是資本主义的必然結果。有

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修正主义者认为，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已经不存在了。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方面已经过时了。修正主义者认为的“新发现”是：战争现在只具有一种性质了，战争的性质取决于武器的特性，而不再取决于政治的阶级内容了，尽管政治是战争的基础。

在前一个世纪中，有些工人破坏机器，而不去打击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們主張，工人要对技术屈膝，而不要去开展阶级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打倒帝国主义。

对于我们，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說来，最終解决社会对抗矛盾的，是革命阶级，是人民群众。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既不是机器，也不是武器的特性，而是人民群众。反之，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实际上是对革命力量悲观失望和丧失信心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最終只能是錯誤的毫无出路的抉擇：要么投降帝国主义，要么自杀。这种观点，一方面把修正主义者引导到冒险主义，另一方面又把他們引导到投降主义，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种“战争的性质已在本质上改变了”的“理論”所产生的矛盾。

提綱草案第七条說：

“战争性质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一点对帝国主义也同样有效。帝国主义的某些领导人，从那时起，也终于勉强承认：战争已不能用作解决根本对立的手段，因为一場热核战争，也会給他們带来巨大的危险。

“这种倾向虽然还是犹豫的、不肯定的，但是它也成为当前形势中的新因素。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因为它有助于孤立最富侵略性的集团，并有助于达成有利于和平的妥协。”

因此，提綱草案的修正主义起草人认为，引起战争性质发生

“本质上”变化的核武器的存在，就其本身性质而论，是积极的因素，因为它有助于“达成有利于和平的妥协”。

按照修正主义者的论点，从逻辑上讲，禁止和取消核武器将会扩大战争危险，因为核武器的消灭将会减少资本主义集团的恐惧思想！

请看，关于战争性质已在本质上改变的修正主义“理论”，会导致多么荒谬的矛盾：这种理论和恐怖平衡论同流合污了。

但是，好像变戏法似的，就在同一提纲第七条中，又若无其事地谈论起“有监督的普遍裁军是当前行动的目标”来了！

仍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动摇性在作祟，一忽儿幻想现在全世界普遍和解，一忽儿又吓得目瞪口呆，摇摆不定。

修正主义就是这样引诱人们放棄进行有效斗争，争取实现两项重要的、有现实意义的、可以在斗争中团结全世界巨大力量的目标，停止核试验和禁止核武器，限制军备！

这样，修正主义的立场事实上接近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策在这方面的立场，最近斯巴克在答复社会党议员格利纳时，还重申了这种政策，他说：

“这个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数成员国一致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比利时政府认为，只裁减核武器的计划，对于西方国家的安全是危险的。”

比利时政府的确认为：这种计划旨在转移公众舆论的注意力，使他们忽视目前人类尖锐地因临着的真正问题，有监督的全面裁军问题。

在提纲草案第五十四条中，很清楚地暴露出：修正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概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是截然相反的。

在第三段中写道：

“……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是作为一种符合目前条件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革命手段。”(1)

在这里说什么“革命手段”，这是冒名顶替，这是欺騙。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和平共处，素来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和平共处并不是一项适用于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关系，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压迫者的关系的原則。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不能代替别的阶级斗争形式，既不能取消，也不能否认别的阶级斗争形式。

而且，别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由于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加强了人民力量，却增加了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提綱草案中，經常是只談和平共处而“忘了”加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这不是偶然的！

• • •

此外，当让·特尔夫(在1963年2月5日《紅旗报》上)继别人之后，重复說：“組織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时，他也在国家政策上注入了間样的修正主义观点。

对于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說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綫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这就是說，应当包含下列各个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間，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互助；

——为反对反革命輸出、反对侵略而进行坚决斗争；

——坚持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尽一切力量援助和支持

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利益；

——为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而斗争。

提綱草案第五十八条的特点是充滿着修正主义理論的紊乱，和他們企图散布的幻想。

这是一种主观主义推論的典型，是无視革命斗争现实的假理論的典型。讓我們来引述这段提綱吧：

“說和平共处是牺牲各国被压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那是不真实的。

“恰恰相反，避免一場世界大战，就为仍然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各国人民的解放，为巩固已从殖民主义枷鎖下解放出来的各国的民族独立，創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作为和平共处的决定性因素的普遍裁軍，并不解除那些正在为爭取独立而斗争的人民的武装，而是解除帝国主义者们的武装，因为正是要从帝国主义者手里夺下那些他們用以阻止进步的武器。因此，普遍裁軍只会加强各国人民的反帝正义斗争。”

关于第一段，我們說：馬克思列宁主义主張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和平共处**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否认、不能反对、更不能牺牲仍被压迫的各国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而修正主义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事实上是牺牲这种斗争，其結果恰恰是危害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和平共处本身。

第二段中，“和平共处”仅滿足于防止世界大战。

但是第三段中，却說“普遍裁軍是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

这事实上是設想一个“沒有战争、沒有武器的世界”。我們的

世界難道是沒有戰爭、沒有武器的世界嗎？如果我們不違背現實，也即不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話，當帝國主義還繼續存在的時候，難道能夠設想一個沒有戰爭、沒有武器的世界嗎？

沒有武器嗎？武裝力量是國家的一個根本特征。難道能設想沒有國家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嗎？正是由於存在着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存在着帝國主義和被壓迫人民，所以資本主義，出於它的本性，是不會放棄武器的。

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存在侵略戰爭和壓迫的可能性，因此也就存在國內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可能性。只有當帝國主義被推翻，當人剝削人的制度被廢除的時候，才能有一個沒有戰爭、沒有武器的世界。

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強盜壓迫着、并剝削着擁有十億人口的国家，他們所以能夠如此，正是由於他們有武裝。由於帝國主義敲骨吮髓的剝削，每年有千百萬人餓死、累死和由於缺乏治療而病死。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死於帝國主義的槍彈和其他殺人武器之下。

然而，我們的修正主義者，却向這十億爭取解放的人民講述一些荒誕的故事和寓言，如果那些掠奪你們、壓迫你們的強盜放下武器，你們看，那多好呀！……你們看，這些修正主義的傳教士在傳布一種新的教義：一邊是原子地獄大災大難的威脅，另一邊是壞人裁軍的天堂；於是請耐心地忍受痛苦吧！這就是修正主義新教義麻痹人民的鴉片。

3. “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傳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①

借口和平，斯巴克于1938年为在法西斯威胁面前实行“中立”政策辯解，为他的“不干涉”政策，即为拒絕援助遭受侵略的西班牙共和国辯解。

借口和平（也是害怕），斯巴克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他参与帝国主义加速准备战争的政策“辯解”。

借口和平，他现在追随肯尼迪的政策！

借口和平，达拉第和張伯倫曾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军队打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门，从而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态演变。

借口和平或綏靖，殖民主义者过去干了、现在还在干着强盗勾当。

借口和平，美帝国主义建立了許多侵略各国人民，特别是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子基地。

借口和平，帝国主义者干涉了朝鮮和老撾，现在又干涉南越和文萊，并威胁古巴！

借口和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把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引入歧途的活动，分化世界和平力量的活动，削弱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以服务于美帝国主义。

借口和平，党的领导中的修正主义者宣揚他們的投降主义和麻痹群众行动的观点，誣蔑党内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的同志，誣蔑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說他們是“好战分子”，修

^①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會議》，見《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0頁。——譯者

正主义者就是这样和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唱同一个调子的。

面对这些迷惑和欺騙群众的勾当，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刻更需要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方面，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方面，肯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

4.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有效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危险的活动的指南

战争是帝国主义最駭人听闻的、最无人性的、最野蛮的必然产物。即使沒有公开的冲突，軍費負担也沉重地压在人民头上。劳动人民是这种资本主义产物的受害者。

馬克思主义者不仅一贯譴責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以实际行动来反对战争，反对备战。

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战争并不是人民注定要遭受的不幸的命运。

馬克思主义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有所区别的，因为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及个别国家里的阶级斗争和战争根源之间的联系。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真理，“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1960年八十一個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知道，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这种战争或那种战争的可能性。

“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①

^①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見《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9頁。——譯者

“沒有战争的世界”只能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廢除了人剝削人制度的世界。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区别开来。我們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正义战争，支持被剝削者反对剝削者的国内战争，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些正义战争都是对剝削者一贯进行的侵略的回击。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譴責 1914 年至 1918 年战争的交战国，并称这次战争为帝国主义战争；他們曾号召各国人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中，曾反对希特勒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他們以苏联为首，事实上领导了反希特勒联盟的胜利斗争。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支持了中国、朝鮮、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及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解放战争，我們曾揭露了，并反对了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侵略。

• • •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陣营的强大，由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由于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由于一切和平力量，面对着因矛盾重重而四分五裂的帝国主义，在斗争中警惕和团结，所以现在有可能防止世界大战了。

維持和巩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和平共处是一项可以实现的目标。

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組織有效斗争，其条件是要揭露这种侵略，要揭露其性质和内容，为了防止和避免这种侵略，也必须准备去迎击它。

目前，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在它的帮助下，德国复仇军国主义已成为一个侵略性的大国，成为欧洲和平共处的头号敌人。我們應該揭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侵略本质，揭露我国壟断資本及其政府的統治政策，它們尽管有国内外的許許多多矛盾，参預了这种侵略政策。

- 为了保证人民群众在这一斗争中提高必要的觉悟，
 - 为了能够制訂出正确的宣傳、鼓动和行动的目标，
 - 为了区别当前的目标和长远的目标，
 - 为了正确地确定行动方法，
 - 为了实现一項正确的联盟政策，
 - 为了利用敌人的矛盾，
 - 总之，为了保证斗争的效果，
- 上述揭露是必要的。

目前，在比利时，在这方面有效行动的目标要求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政策划清界綫。这些目标是：

- 削減比利时軍事預算一百亿法郎，
- 不延长兵役時間(十二个月)，
- 不在比利时設立外国基地，
- 不准在比利时有原子武器，
-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支持一切旨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势的倡議(腊帕茨基計劃，无核武器区，和平解决德国問題和柏林問題，承认目前边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簽訂和約，取消一切外国基地和国外駐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同华沙条約成員国締結互不侵犯条約)，裁減軍备，提出揭露和孤立帝国主义战争販子的普遍裁軍建議，

——停止核試驗，禁止一切原子武器和核武器，銷毀現存的原子武器，

——支援遭受侵略的各国人民，支援反帝革命运动。

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組成以工人階級为核心的、最广泛的統一戰綫，以便为实现上述目标而进行胜利的斗争。

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还是在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同资产阶级合作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提綱和八十一個
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被拋棄)

1. 剛 果

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项迫切的基本任务。这种团结应该特別表现为具体支援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

对于本国的资产阶级还压迫着殖民地的那些国家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这种团结就包含着采取下列明确的态度：

“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①

^①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見《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4頁。——譯者

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表面上承认各民族平等，会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一样，满足于改良主义政党习惯奉行的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和起义同时，能够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

紧张时期，例如我们在刚果事件时所遇到的这种紧张时期，再一次显示出是机会主义的“一面镜子”。

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1960年6月30日以前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1958年，刚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1959年1月爆发的事件说明比利时殖民主义的危机。对比利时殖民当局来说，继续用老一套办法来维持统治，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已是危险的了。比利时殖民主义者（至少这是当时殖民主义者中的主要倾向）想试一试新的手法，即采用新殖民主义的形式。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其他始终窥伺着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来分享特权。

伊斯更斯政府的计划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一种事实上的“比利时—刚果共同体”，可能的话，则实现一种得到法律承认的共同体。

比利时垄断资本手中掌握的王牌是：一方面刚果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解放运动的大多数领导人缺乏经验和思想锻炼；另一方面，当地有一套强大的殖民统治机构，包括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

但是，由于比利时殖民主义的深刻危机，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完全有希望的，特别是考虑到国际范围内的力量对比，

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各国人民对运动的支持和声援，以及我国工人阶级的反殖民主义情绪。

我们党本来能够并且应该在用行动支持解放运动方面起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党没有这样做，反而大大帮助散布对局势和对“圆桌会议”意义的幻想。

让·布鲁姆（在1960年10月11日的《红旗报》上）显然违反事实地说：

“终于举行了圆桌会议，而鉴于当时我们政府的实际情况和它听命于宫廷和大资本家中最反动的阶层，6月30日宣布的刚果独立，在当时其条件算是尽可能优越的了。”

在1960年10月20日的《红旗报》上，他又说：

“自6月30日起，比利时和刚果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地位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的新阶段。……”

但是比利时的垄断资本和他们的政府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刚果的解放运动愈来愈声势浩大。涌现出一批立场愈来愈坚定的刚果领导人，其中有伟大的人物——卢蒙巴。

其他有一些人事实上证明是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自从1960年6月23日卢蒙巴政府成立起，随着解放运动的愈益高涨，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即施展各种阴谋，并准备反击。通过这些事件，又一次证明了人民群众不可能“利用”压迫者的国家机器，证明了革命的民族运动不可能利用殖民主义者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而必须粉碎这种国家机器，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国家。

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是怎样说的呢？它说：“独立实际上向卢蒙巴政府立即提出了控制国家机器的首要问题。主要

的控制手段是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

这又是改良主义的荒谬言论！不是摧毁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是“控制”殖民主义者的国家机器。用什么手段去控制呢？用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也就是说用构成这个国家的主要支柱！比利时殖民主义后来就是用它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特别是“治安部队”来向刚果解放运动和卢蒙巴政府发动进攻的。

治安部队的比利时军官试图把他们的部队投入反对解放运动和反对卢蒙巴的斗争。但事实上，在极端复杂的形势中，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治安部队里的一部分刚果人甚至投到了卢蒙巴政府一边，反对殖民主义者。

党的领导，在当时和在工作报告中，对这些事件做出了估计，这是在“混乱状态”面前惊慌失措的机会主义者的估计。

比利时的军事干涉

1960年7月9日，星期六，上午十时，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董事长兼通用公司经理吉勒特先生向政府进行了一次交涉。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因治安部队阴谋失败而忧心忡忡，并担心他们的统治地位有失掉的危险。在当天，就开始了比利时对刚果的公开武装干涉。卡米纳军事基地的比利时伞兵投入行动，而且还从比利时本土派出了援兵。

1960年7月11日星期一的《红旗报》参与了比利时官方宣传的造谣，说什么干涉是应刚果政府的请求而进行的。

同一天的《红旗报》发表了政治局的一份公报，强调“在刚果的比利时人的安全”和在刚果“恢复平静”。这个公报不但不号召用行动来反对这次殖民战争的开端，反对派军队到刚果去，争取撤回这些军队，反而借口“向刚果政府提供它认为必要的人

力、物力上的支援，来帮助它击败叛乱者”，它继续写道：

“比利时工人阶级（而且是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能容忍一支人数比任何时候更为众多的军队在刚果领土上暂时耽一个尽可能短的期间。”

在同一天的传单里又说：

“所以，保证比利时和刚果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一旦恢复平静，就准备把所有在刚果的比利时军队撤回。”

“一旦恢复平静”！对武装干涉一点也不加谴责；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侵略，干涉刚果人民和卢蒙巴政府的比利时军队在刚果的出现，都被描绘成为可以和恢复平静相容的了！

这显然是在资产阶级面前投降，是放棄阶级斗争，是害怕而不是勇敢地斗争。

可是对坚持斗争立场，反对殖民主义干涉的共产党人却怀恨在心。7月10日共青团发表一份传单，要求：

“1. 立即召回被刚果政府撤职的比利时官员和军官；

“2. 立即停止派遣和立即撤回未经刚果政府同意的军队。”

政治局事实上否定了这份传单。有一个中央书记竟在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恬不知耻地说，这种传单“缺乏政治勇气”。

刚果和联合国

1960年7月13日，政治局建议联合国干涉刚果。正是这次干涉断送了卢蒙巴和他的战友们的生命，葬送了卢蒙巴政府。在消灭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在刚果建立了新殖民主义的（即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者，主要和美国之间的）新的“力量均势”。

《红旗报》不断为联合国干涉刚果进行辩护，而工作报告也肯定了这一方针。

1960年10月13日，让·布鲁姆在《比利时和刚果有着同样利益》（！）的一文中說：

“但是联合国制止了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和他們的同謀者进行大規模的打击……再說在討論时期中，並沒有打仗，而这已經是一个可貴的收获了。”

就在这个时候，殖民主义和反革命恐怖籠罩着利奥波德維尔、下剛果、加丹加、卡賽等地。

成百的剛果爱国者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进攻下牺牲了。在联合国的掩护下，剛果議會无法行使职能。合法政府不但无法管理国家，而且实际上已处于非法状态。而像卡薩武布，邦博科，伊利奧，蒙博托，冲伯，卡隆吉之流却巩固了他們的地位。尽管如此，政治局在1960年11月3日談到剛果問題时却仍然說什么“在1960年6月30日以前就已經证明了其有效性的和平道路”。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間的“和平共处”？

同年10月11日，让·布鲁姆在《紅旗报》上以《誠实和經濟擴張》为副标题的一文中說：“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不管是資本家还是工人积极分子，为了制訂一种健康的政策，必須考虑历史事实及其发展……

“为什么对經濟擴張如此关心的比利时資本家們（如果人們认为可相信他們这一点的话）未健看到：和剛果維持誠实的关係，可以使他們的貿易繁荣，使工厂开工，可以保障成千上万的比利时劳动者和技术人員的前途？”

如果已經到了这种地步，即：要求資本家誠实，要求不管是資本家还是工人积极分子，制訂一种“健康的政策”，向資本家献策，如何在受新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里发财致富，这就意味着

已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而成為資本主義的謀士了。

在已經提到過的1960年10月13日以《比利時和剛果有同樣利益》為題的一系列文章中讓·布魯姆還說過：

“和平共處是對世界生活和人類發展的現代的觀念。”

“尋求和發現一項解決衝突的真正文明的方式，一項既民主又得人心的、為改造社會和世界而鬥爭的新的方法——和平共處，應歸功於工人階級和他們的思想家。”

同列寧主義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概念相反，讓·布魯姆在這裡談到的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和平共處，特別是殖民主義者和殖民地人民之間的和平共處。這樣的和平共處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对被壓迫人民來說，是進行革命鬥爭和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問題。鼓吹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和壓迫者合作，是麻痺被壓迫者。

採取這種立場，其結果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譴責革命鬥爭，說它是“暴力行為”，“不耐心的反應”，“左傾主義”，甚至說是“好戰”。

1960年11月3日在《紅旗報》發表的以《剛果，和平與經濟擴張》為題的一項政治局決議中說：

“如果這種形勢延續下去，可能在剛果會出現一些不耐心的反應，一些採取孤立的暴力行為以解決一些主要是政治性的問題的、絕望的企圖，而這些問題可以並且應該通過政府機構的正常工作和政黨之間的明智談判來解決。”

加丹加的停火

1961年12月12日，共產黨議會黨團竟至向議會提出一項和極端分子立場一致的，關於加丹加停火問題的提案。中央委員

会的工作报告对此未加譴責，而只是认为这个提案可能被誤解。

难道真的是誤解嗎？算了吧！

最后，共产党議員們終於对主張干脆停火和談判，从而对政府表示信任的多数派決議案投了棄权票。这次棄权的理由是：

“事前，加斯东·穆兰是这样說明共产党議會党团的投票理由的：議會党团不投票反对这个提案，因为这个提案重提談判和停火的主張；但是也不投票贊成，因为这个提案支持政府政策，而議會党团是批評这个政府的。”（《紅旗报》，1961年12月13日）

共产党議會党团最后的投票证实了这个党团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立場，在有关“停火”問題上，追隨了比利时殖民主义的立場。

帝国主义对剛果的“新政策”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一点也沒有揭露美国新殖民主义在剛果的公开和无耻的干涉政策。中央委员会也不譴責斯巴克所执行的比利时壟斷資本統治的“新政策”，即同美帝国主义合作仍不免有重大的矛盾和共同剝削剛果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工作报告第二章第二节描繪美国在剛果的政策如下：

“华盛顿也知道，它在整个非洲的威信日益下降，它在加丹加分裂問題上非常明显地是个同謀。”

这是錯誤到极点的观点：实际上，华盛顿殖民主义者，在他們为了加强在剛果的地位的活动中，特别是在加丹加問題上，遭到了布魯塞尔、巴黎和倫敦殖民主义者有时是很猛烈的反击。

接着，中央委员会又說：

“阿杜拉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在政治策略上的一种改变，但对于殖民主义世界來說，并不是个胜利。然而壟斷資本家們却利用这个政府的財政困难和經濟困难，企图把它推向錯誤的方向。”

实际上，阿杜拉政府是一个傀儡政府。它为各种各样的殖民主义，特别是为美国新殖民主义打掩护。

*
*
*

总而言之，从列日代表大会以来，为中央委员会所赞同的政治局的一贯立场，是一种在资产阶级面前投降的政策，直至借口“民族利益”而同意阶级合作和殖民主义者对刚果的干涉。这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纲领也完全受到了嘲弄。

2. 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古巴——中国

阿尔及利亚

政治局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的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不是大胆地号召群众为声援阿尔及利亚人民而采取行动，具体地帮助组织这种行动，却只是停留在纯粹的精神同情的立场上，即使这种同情，也极少表示过。

1962年2月17日，当法阿谈判接近尾声时，让·布鲁姆在《红旗报》上“发现”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行动目标：

“坚决请求外交部长斯巴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法阿谈判的结果以一项稳定的保证。”

要比比利时殖民主义的代表斯巴克干涉阿尔及利亚事务，对这样可笑的建议，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

但是，1962年3月26日《红旗报》甚至还这样说过：对于被派去反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法国）士兵们说来，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一种痛苦的，流血的职责……”

把参加镇压，参加反革命的殖民战争看成是一种痛苦的，流血的职责，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立场。

西班牙

一次巨大規模的罷工，動搖着佛朗哥政權。西歐工人階級聲援西班牙無產階級的大規模行動，本來很可能促使法西斯獨裁者垮台的。但是為了緩和西班牙經濟癱瘓的緊張情況，曾不斷地向佛朗哥的西班牙供應煤，特別是電力。改良主義者阻撓我們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有效地表示同情，雖然是如此巨大的同情。政治局滿足于空空洞洞的口頭支援保證。

罷工在4月23日就开始了，他們却只是在5月14日才發表一項決議。

政治局事實上不願意黨去領導大規模的實際支援行動，因為這種支援很可能会“轉移”我們如此“重要”的目標：參加訂立一個“比利時的良好社會綱領”。

古巴和中國

我們在上一章已清楚指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背離了工人階級立場，沒有支持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

政治局在中印邊境衝突問題上，竟至反對社會主義中國，擁護反動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對美帝國主義有利的侵略。這是有目共睹的。

這種駭人聽聞的態度是經過長期準備的。

美帝國主義又一次發動了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大規模的運動。肯尼迪說過，目前資本主義世界所面臨的最最重要問題就是對付：“共產黨中國政權”。

占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三分之二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成為帝國主義及其僕從最惡毒的（不僅是口頭上的）攻擊的目標。

對中國同志卑劣的誣蔑，特別是為讓·特爾夫在他的1962

年1月的文章及1962年2月22日所謂政治局的“意見書”中所發揮的誣蔑，支持了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及其御用報刊所發動的這次反華運動。

資產階級報刊，包括外國報刊（尤其是《外交世界》和《紐約時報》）興高采烈地抓住讓·特爾夫和政治局的言論來支持他們的反共誣蔑。

難道這是我們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路綫嗎？

難道這是八十個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的路綫嗎？

*
* *
*

這裡，讓我們向那些不顧這種陰謀而繼續像共產黨人那樣鬥爭的黨組織和同志們致敬。

3. 被壓迫人民的解放呢，還是新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的完全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沖擊下，殖民主義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歷史意義說來，僅次於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形成。

“殖民主義國家不會把自由恩賜給殖民地人民，也不會自願放棄被它們剝削的國家。

“隨著社會矛盾的尖銳化，民族資產階級越來越傾向於同國內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妥協。而人民群眾確信，消滅長期落後狀態和改善他們生活條件的最好道路，就是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上。人民只有走這條道路，才能擺脫剝削、貧困和飢餓。在解決這一根本的社會問題中，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群眾應當起最重要的作用。”（1960年八十個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

現代修正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

面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群众这股巨大的革命力量，現代修正主义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让·特尔夫在他 1962 年 1 月的文章里及中央委员会(提綱草案第二条)都談到了“第三世界”，这样来迴避就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内容以及它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关系作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

特尔夫說：

“在很遙远的将来，社会主义世界一定会面临这么一个問題：必須給那些为真正独立而斗争的国家，为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新束縛而斗争的国家以它們所要求于它的帮助。为准备胜利地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所必需的沉重的負担依然压在社会主义世界头上。只有当它自己能从这些沉重負担下解脫出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世界才能大規模地帮助这些国家。”

中央委员会提綱草案第三条提到新殖民主义时說：“它必然把后者(指前殖民地和附屬国的人民)引到这么一个阶段，那时他們一定会迫切地提出政治上、經濟上和財政上真正独立的問題。”

特尔夫和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概念是附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搗乱立場的，而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實踐中早已显示了自己的革命价值。修正主义者故意否认殖民地附屬国民族資产階級作用的矛盾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但是动摇不定，而且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这个資产階級内的反动阶层甚至会同帝国主义勾結，与之合謀。

修正主义者企图不承认这一事实：无产階級能够、并且应

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领导作用，以便使运动能进行到底，直至社会主义革命。

特尔夫在 1962 年 1 月的一系列公开地、恶意地攻击中国同志的文章中，对經他歪曲后而加以譴責的革命立場的所謂客观根源，作了如下的“解釋”：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骨干，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发展程度是不一致的。許多地方，工人无产階級迅速壮大了，絕大部分新成員来自农村。他們的階級觉悟历史不长，往往还不很巩固，他們缺乏革命斗争傳統和經驗。

“有些国家，如阿尔巴尼亚、越南、甚至中国，工人階級的数量比起整个人口来仍然是微弱的。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发展过程必然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同的傳統和影响，不同的觉悟水平。

“群众内部存在的这些不同情况必然会对作为先鋒队的共产党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反映到共产党内去。

“因此，这种不同情况可能成为各国共产党之間观点分歧的根源。”

特尔夫的思想本身才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階級和工人貴族阶层所接受的资产階級思想的反映。这些国家的托拉斯和壟断資本从殖民主义剝削中获取超額利潤。这就是輕視所謂“不发达的”被压迫民族的、“文明人”（资产階級文明！）思想。

他的理論与社会民主党头子們的簡單概念是相吻合的。那些头子們輕視俄国革命，輕視一个农民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內的这个无产階級革命，強調在这种条件下建設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难道中国工人階級的階級觉悟是历史不长、不很巩固的嗎？难道中国工人階級缺乏革命斗争的傳統和經驗嗎？难道他們沒

有同农民結成出色而巩固的联盟，并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水平嗎？

誰能无視中国人民悠久的革命傳統，无視中国工人运动胜利的丰富的斗争，特别是近四十年来的斗争？

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列宁曾重申、保卫和发展了关于下列問題的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观点：在世界資本主义最薄弱环节的国家里，依靠工人阶级同其他阶层，首先是貧农阶层，結成的联盟，社会主义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即使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比起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来要少。

在我們的时代，怎么能否认这些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呢！

根据特尔夫和政治局的这些“理論”，从对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出发，那么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已处于死胡同中了：

“对第三世界的許多国家來說，首要的問題是在經濟方面、社会方面組織起来，以便这些国家的居民能有充分滿足他們最起碼需要的生活水平”。

“由于这些国家无法自力解决这些問題，所以轉向国外要求帮助和支援”。（让·特尔夫，1962年1月11日）

让·特尔夫跟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很快地建立起关于不同社会結構的国家“共同干預”不发达地区的理論，这是一种变相的阶级合作。对他說来，这样簡單得多。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大規模地”进行这种援助，必須等待普遍裁軍。这就和前面研討过的提綱草案第五十八条在政治上、經濟上接近了。由此得出結論說，在这个期間，被压迫人民应当耐心地忍受痛苦。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和支援”来自資本主义国家，所以新殖民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反动民族資產阶级及腐朽阶层的帮助下，实际上将是一个过程，一个必要的阶段。然后来点安慰

(提綱草案第三條)，由于，而且无可爭辯地，被壓迫者與壓迫者之間的矛盾將得不到解決，而只有發展，那麼終有一天，

“前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既然只是殖民剝削形式的改變，為什麼稱前殖民地附屬國？）必定會走到這麼一個階段，那時他們將迫切地提出關於經濟上、財政上真正獨立的問題”。

你們看，這就是修正主義者的好心？他們背棄革命鬥爭，他們向被剝削人民鼓吹忍耐，但是有朝一日被剝削人民總會提出他們的解放“問題”！民族解放運動勢不可擋，修正主義者想要阻擋和壓制它的任何企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

修正主義者完全摒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內容、重要性及革命意義的根本觀點。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各個階段

關於這方面，還必須作些解釋。

我們的時代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是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由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始的。這一革命的勝利，以及在大多數其他國家中成立了共產黨，這就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一階段的特点。

希特勒法西斯主義以及它的附庸，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被擊潰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標誌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二階段。全世界革命運動的飛躍發展，東歐一系列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國家體系的形成，標誌了第二階段的結束。

第三階段的開始大致在中國革命勝利的時候。人類四分之

一获得解放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从那时候起，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比原来多三倍的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在亚洲、非洲和美洲以更为波澜壮阔的形势发展着。美帝国主义，依靠了其他一些帝国主义者的帮助，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于1950年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占领台湾。这是一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对所有为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侵略。但是由于朝鲜人民，它的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抵抗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美帝国主义终于遭到了失败。

这样为防止一场新的世界战争，为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为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新的胜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新的条件。

越南人民击败了法帝国主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万隆会议——在这次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了决定性作用——表明了亚非国家所起作用的重要性。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了向帝国主义效劳，加紧了他们的捣乱活动。

他们借口“置身于两个集团之外”，主张建立所谓国际第三力量。实际上，早在1953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就已跟希腊和土耳其一起，参加了巴尔干公约。这是一个和美国一手制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有联系的军事政治集团。

他们从美国手里领取了总数达一千五百亿比利时法郎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帝国主义援助铁托决非为了帮助社会

主义！

修正主义者利用自称的“社会主义”作为招牌，把国际局势中存在的危险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而是归咎于集团的存在；这就把社会主义阵营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等量齐观；他们企图起特洛伊木马的作用。他们企图转移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的斗争。

他们的作用是依靠各被压迫国家的反动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腐朽阶层的支持，帮助帝国主义和平地把殖民主义旧的形式改变成新殖民主义。

他们企图维持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被奴役状态，以便让帝国主义保有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让它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保持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

这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民族解放运动为自己规定的反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者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企图依靠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上层的势力，来破坏被压迫者的大团结。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可能是自由的。”

修正主义者的阴谋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帝国主义必将被彻底打倒；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和十亿忍受着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的剥削的人民联合起来发动的革命攻势下，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像社会主义阵营十亿人民所已经取得的胜利那样，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三、为当前的要求、为民主自由和为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改革而进行有效的斗争，还是长入社会资本主义

1. 反对单一法的斗争和百万人大罢工

紧缩政策

1960年，壟斷資本家和他們当时的伊斯更斯政府在剛果的行动遭到了某些挫折。

另一方面，比利时的經濟在与它的竞争对手相比之下，露出了衰弱的迹象。比利时資本决意执行原来的政策，即，不仅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中，而且也在对付帝国主义竞争对手方面保持它在剛果的障地。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强加的負担也日益加重。

金融資本为了保持它的利潤，想要劳动者为它的政策付出更大的代价。

它甘冒較量实力的風險，提出“单一法”案。政府把希望寄托于工人階級的分裂和机会主义的影响上。它企图利用剛果事件，但是，沙文主义运动迟迟沒有奏效。資產階級实际上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劳动者的斗争意志，比利时社会党以为通过“真理运动”找到了太平門。社会党主要使工人階級注意議会的反对和未来的选举結果，它利用人們反对单一法的情緒，进行一种純粹的选举活动。

党的政治局在其“和平共处”的錯誤观点推动下，对資產階級

的殖民主义刺激运动压力让步了；它低估了劳动者的斗争意志。它看不到这个运动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已经遭到失败，看不到无产阶级不愿意为了比利时垄断资本的政策而付出代价。

像布鲁姆那样，在《和平共处、反对紧缩计划》的标题下，说什么（见10月10日《红旗报》，大约在反对单一法的大罢工开始前两个月）：

“在刚果的比利时人的安全和活动是目前的关键问题。”

这是出奇地脱离实际。

这是从违反动员观点的前提出发，而这种动员观点是具体组织斗争反对紧缩政策这一同样具体的威胁所必需的。

百万比利时罢工工人在给紧缩政策的辩护士以严重打击的同时，也给了政府的大西洋联盟和殖民主义政策以打击，增加它的困难。

劳动者对自己力量的强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相对薄弱，同时作了验证。他们的行动对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力量，低估劳动群众的力量，的机会主义观点，打开了缺口。

百万人罢工的准备工作

党的领导清醒过来并提出了两条行动建议：

——11月5日举行全国性示威。

——11月8日，即议会复会的一天，为全国抗议日。

这两条建议虽然有号召斗争之功，但并不适应当时的可能性和具体条件。

11月5日举行全国性示威，这个口号并不附合当时所达到的动员水平，它并没有使得在最有可能迅速发动地方性行动日的地方，——即通过比利时总工会的各业地方工会和地方联业工会，为斗争的发展，打下必要的基础。因而，这口号显得不结

合实际情况，太难于馬上做到；所以，它沒有得到响应，实际上也无助于“粉碎工人运动中右派分子的抵抗”。

另一方面，把全国行动日和議會复会日（11月8日）联系在一起有这样的坏处：那就是把先进劳动者的活动对准議會的活动，而不是对准具体准备行动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比利时社会党右派分子效劳。

列日的先进劳动者們就懂得應該采取什么方針。在他們的推动下，列日“共同行动委员会”于11月9日决定采取一个具体計劃，規定在11月21日举行地方性行动日，并全部停工两小时。

继列日“共同行动委员会”會議之后，政治局于11月11日号召把11月21日作为“全国第一个群众性行动日”。

可是，这次糾正作的太晚，列日劳动者的行动沒有在指定日期，遍及全国其他各地。

中央委员会于11月26日向比利时总工会全国局发出呼吁书，其中建議召开比利时总工会全国委员会紧急會議以便决定立即向全国发出总罢工預告，宣布：

“在議會开始公开討論灾难性法案的当天，将发动全国总罢工和强大的群众示威。总罢工将一直繼續下去，直到該法案被撤回或被否决为止。”

在1960年11月29日《紅旗报》上发表的同一呼吁书規定，通过地方性行动日、工厂停工、工人群众集会来准备这一行动。

这项決議非常积极的外表并不能在我們面前掩盖它的弱点。決議談到发出总罢工的全国性預告和通过地方性行动日，准备总罢工，于是就引起一种想法，即举行地方性行动日必須以預先发出全国性預告为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呼吁书势必成为一个鼓动性文件，而主要的應該是組織这次行动。但是，只有由工人阶级通过地方行

动日的阶段，表示出它的斗争意志，才能冲破比利时总工会全国局和全国委员会的右派多数的阻挠。幸而，后来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由比利时总工会许多地方组织参加的12月14日行动日为此后开展行动创造了条件。

党的骨干事实上是朝着这个方向行动的；在这个时期里，他们为组织好的地方行动日而斗争，为发动各业总罢工工作准备；而不让地方行动日的筹备工作受到总罢工预告的限制。

公用事业总工会的“市”全国部于12月5日，通过了一个决定，主张在议会开始公开讨论单一法的那天，在本部分发动总罢工。这对罢工的发动具有重大意义；自12月20日起，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罢工核心，例如，安特卫普港即被瘫痪。

12月16日，比利时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多数（其实只是微弱的多数），连反对单一法的全面行动这种想法也拒绝考虑。

12月18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各工人会议决定于12月20日开始行动。

罢工

果然，从这一天起，罢工在“市”的范围内和其他范围内有力地展开了，首先是在沙勒尔瓦，安特卫普，列日等。它迅速地扩大到整个瓦隆地区，佛兰德的许多工人区以及布鲁塞尔的许多企业和公用事业部门。共产党员干部表现无限忠诚并表明是罢工的先鋒战士和组织者。

反动势力加紧进行阴谋活动。

天主教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反对罢工。范·罗爱主教谴责了罢工。政府没收了社会党和共产党报纸和传单，它布置镇压部队，对进行斗争的工人们实行镇压。

在这次镇压中四名工人遇害。

好些地方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不論在哪里，罢工委员会，都在扩大和巩固行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惜这种委员会不够多，而且往往不能发展成地区性联合委员会。因此，沒有代表全体罢工工人的机构，来进行全国性的协调工作。

比利时全国总工会在任何时候也沒有发布过总罢工的口号。哪里是右派领导人統治的地方，哪里就宣布取消比利时总工会地方工会的資格，以便阻碍各行各业联合罢工。在1月的最初几天，尽管政府为了阴谋拖垮运动，已中断了在議会的討論，但仍然有一百万劳动者罢工了。

对罢工工人的压力愈来愈加强，特别是在反对罢工的天主教工会联合会力量較强大的地区。改良主义的領袖們开始散布涣散人心的所謂强大部門和弱小部門的“理論”。根据这种“理論”，主要是让“强”的部門，即碼頭工人，矿工和冶金工人，从地理上分，則是列日，沙勒尔瓦，安特卫普等坚持下去。其他部分，尤其是布魯塞尔在罢工中的作用是不重要的。

于是，即使工会組織已决定罢工，一些工会领导人仍单独地成群地去瓦解某些部門的罢工工人的斗志，分裂罢工，试图剥夺罢工的普遍性和統一性，从而实际上孤立“强”的部門。

这种“分阶段”投降的阴谋愈益发展。1961年1月9日夜間到10日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当时在“教育”部門执行局的一次所謂會議上，在繼續积极进行罢工的地区好几个成員缺席情况下，决定向穆洛大臣的所謂征調令屈服，并下令政府教育工作人员复工。

1960年^①1月10日，布魯塞尔铁路工人地方工会，在一次突然召开的，参加人数极有限的會議上，右派分子策动于翌日复

① 疑为1961年。——譯者

工。从此以后，罢工工人的团结迅速瓦解。同一天(10日)，范·阿克尔搞了一次可耻的背叛阴谋，他宣称：

“对于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治安，这一点，我是非常理解的，要是我，我也会这样做……我们了解国家的财政情况。政府得找出一个解决办法。问题就在这里，这问题是任何政府都会遇到的。”

比利时社会党和比利时总工会之间的鸿沟便愈来愈深。

瓦隆地区社会党某些人士提出成立联合组织的要求。要求本身是对的，但是在混乱中，这就显得像给罢工以另一个目标，而不是为了反对单一法。

有些工人就因此迷失了方向，比利时总工会的右派分子的分裂阴谋，特别是在弗兰德地区和在布鲁塞尔也因而得到方便。1月15日，比利时社会党和比利时总工会的领导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备忘录同意对单一法进行修改，同意增加间接税，即商品流通税共六十五亿法郎，为期一年（但这项增税规定至今还在执行）。

这份备忘录提到一个税收改革法，提到把单一法的其他条款交给各个委员会研究，还提到其他的所谓“改革”的建议，这样的改革在勒菲弗尔—斯巴克政府的政纲中，也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

尽管有这些阴谋和叛变，瓦隆各大工业区还坚持斗争到1月23日。

罢工过程中政治局的错误

在罢工过程中，政治局犯了某些错误。

正当百万工人罢工的时候，“特别强调组成代表团去见议员”，这并不是足以使斗争达到更高水平的口号。在这次罢工的

情況下，派遣代表團去見議員，可以作為一種次要的行動方式來考慮，而“集中於一天內派遣代表團對議會施加壓力”，這可以被視為一種冒險主義的口號。事實上，具體地說，這就意味着代表團向議會“進軍”，讓代表團面對集中於“中立區”的軍警，和冒一切可能因而造成的挑釁的危險。

對於當時應該組織、擴大和推進到更堅決形式上的群眾運動來說，這完全不是一種嚴肅的和對運動負責的態度。

此外，意味深長的是：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在對罷工的困難時期進行分析時，不是強調右派分子出賣罷工的企圖，而是強調所謂“極左的”傾向，說什麼“這種傾向使敵人有機會喘息，和重新恢復他們對某些階層的罷工者和對中等階級的影響”。那麼，誰是極左傾向的代表呢？根據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主要是那些“為數眾多的，不顧黨的多次警告，而仍擁護向布魯塞爾進軍這種想法的信徒們”。

還有那些“大談扔下工具的列日工會分子”，這個建議是“在聖保羅廣場集會的四萬名列日工人所一致通過的”。

對於許多社會黨左派工人尋求新的行動方式以迫使政府讓步的做法，這樣簡單地加以譴責，是不公正的。

在一定時期，適宜採取這種或那種鬥爭方法的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但是那就必須能夠提出其他能夠團結鬥爭中的工人，加強運動的建議，並清楚地表達出來。

如果沒有政治局的錯誤，黨本來能更有效地起到它的先鋒隊作用。從地方上來說和從全國來說，並不是沒有行動的可能性，以便進一步發展罷工運動，把它提到更高水平。應該對來自群眾戰鬥意志的創造性意見，給以更多的注意，而不應不問是非就予以否定。

應該廣泛徵求群眾意見，以便嚴肅地研究各種鬥爭方法和

研究怎样实行这些方法，或者摈棄那些失敗主义的，絕望的或挑釁性的解决办法。

应在这基础上安排发展斗争和增加更大压力的各个阶段。

党的领导人在批評所謂“极左”口号时，却不是那样。这些批評，事实上，如拿来同下面的讲话对照一下，那就更加清楚了：

《同多数派代表的交涉和談判》。(1961年1月8日雷納·貝倫在列日記者招待会上的发言)

在这情况下，这种“批評”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遺了；它构成一种完全是消极的，右傾的和分裂的态度。

从1月5日起，政治局的两个委員在政治局的庇护下，就在布魯塞爾，借口罢工工人在某些企业和公用事业中只占少数，劝告同志們“回家”，不要“硬充英雄好汉”，不要“当小嘍囉”，不要“自寻煩惱”(?)。他們就这样在某些部門(其中有社会保險全国局，比利时航空公司，政府各部，邮政部門)的同志中制造了怀疑和混乱，并按照右派分子的压力行事。这种机会主义态度是一个一貫的政治观点所造成的后果。这可以从政治局反对1961年12月1、2、3日布魯塞爾地区党代表大会的一項決議中第二节內下列一段得到证实：

“布魯塞爾地区委員會的一貫立場是勉励共产党员要当工会的模范骨干，要站在战斗的前列，来执行工会的行动決議。这种立場是有效果的。

“地区委員會的一貫立場是着重指出，罢工者，即便居于少数，他們的团结一致对全国性罢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地区领导机构在需要的时候每次都同表現得犹疑不决的同志进行討論，这些同志害怕孤立，既看不到全国总的斗争，也忘了自己工会組織的口号。”

概括來說，如果人們研究党在百万人大罢工的准备，发动和

开展过程中的行动特点,那么,可以得出下列几点:

——党的骨干无限忠诚。政治局一方面合理地提出了总罢工的正确口号,这是符合当时工人斗争的需要和可能的,但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有时是轻率的,甚至是冒险主义的口号,有时又是明显地落后于运动需要,妨碍和分裂运动的口号。

——罢工发动起来后,政治局没有起到它作为先锋党的领导机构的作用,而鉴于比利时总工会领导的态度,实际上,展开全国规模的行动的全部责任落到了党的身上。

——政治局的某些委员在实践中采取了明显的机会主义态度。

——多数地区领导机构都同罢工运动密切联系,一般地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政治局的失职。

*
* *
*

罢工的后果,选举

大罢工未能阻止通过“单一法”。工人们复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斗志,相反地,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天主教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破坏罢工者的面貌暴露了,这就使许许多多天主教劳动者觉悟起来,这种觉悟后来在他们要求同比利时总工会劳动者统一行动的意志中表现出来。沃冷罢工和公用事业两个工会组织的斗争协议就是例证。

比利时社会党右派和总工会右派的面目同样暴露了,广大阶层的社会党工人抛棄了改良主义;这种觉悟甚至对总工会国家一级某些干部的态度都产生了好的影响。他们对于反对壟断资本及其政府的行动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和比较言行一致的立场。

这全部事实促成了瓦隆人民运动的成立和巩固。壟斷資本遭到了狠狠的打击。因而产生了“新政策”，这种政策一面保持壟斷集团的基本目标，同时被迫注意到在劳动群众中表现出来的更强的战斗性。

議会被解散了，并进行了立法选举和地方选举。

工作报告对3月26日投票結果的分析諱莫如深，同样地对国内近年来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百万工人大罢工也含糊其詞。

党是带着一个正确的綱領去参加竞选的。这就是“十——二十——五十”个十亿法郎的綱領：

——節約軍費十个十亿法郎，

——征收大資本利潤二十个十亿法郎，

——由銀行提供五十个十亿法郎。

可是工作报告也未提及，为什么？

是否因为这个竞选綱領符合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而被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扣压起来呢？

讓我們簡略地分析一下1961年3月26日的投票結果：

天主教社会党，即伊斯更斯的党，它是无耻地投靠托拉斯政策的代表，这个党，到处后退，失掉了1958年所得选票的11%左右。

自由党踏步不前，比1958年才多了七千票：它大开空头支票，但实际上并未招徠新的选民。

其他各极右派候选人名单，这些“小”名单多得了十一万八千票。工人运动領導的弱点，使得极右派政党能够蒙騙一部分对伊斯更斯政策极为不滿的中等阶层分子。

然而这种現象是比較有限的。資產階級从中吸取了一个教訓：自由党后来就改变成一个新党——进步自由党，它漫无边

际空許諾言的綱領比天主教社会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党搜罗各方面的极右派分子。

它眼前的政治目标是清楚的：鼓动极右派这个訛詐手段，来为天主教民主党領導人和比利时社会党右派領導人的投降行为提供“借口”。更长远的是打下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基础，以备其他为資產階級服务的政府班子“过时”后之需。

天主教弗来米人民联盟由 1958 年的十万零五千票上升到 1961 年的十八万二千票左右。这个現象可以同上面所分析的現象相比。为了这次选举，天主教弗来米人民联盟的右派和极右派領導人巧妙地把弗来米全国联盟的遗产置于第二位，而籠絡人心地提出表面上反对資本主义的要求。

社会党和共产党得票的总数比 1958 年增加大約四万二千票，这是由于天主教社会党在 1958 年的选民抛开这个党而投了“左派”的票。

这表明，由于反对壟斷資本的行动，把天主教工人从反动势力掌握中爭取过来的道路是打开了。

比利时社会党一共丢失約二万票，在右傾机会主义政策最为明显的地方，如艾諾，布魯日（有范·阿克爾），布魯塞爾（有斯巴克）等，选票損失得特別严重。

我們党几乎在它参加竞选的所有地区，都取得了进展。比 1958 年多得六万二千票以上。在我們 1958 年参加选举的全部选区中，进展达 31% 左右。然而这个进展在各个区域是很不平均的。如果說在蒙斯、苏瓦尼、沙勒尔瓦、都因、奈佛耳等选区，这个进展超过总进展的平均数的話，那么另方面，在惠伊—伐雷姆选区的进展是微不足道的（1%），在土尔內—阿特才 10%，在列日选区是 17%。

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认真分析这些結果，以便判断党的政策

的效果。

誠然，同以往的选举相比，党取得了进展（自 1946 年来这是第一次），这一点值得特別指出来。

但是，在估計这些成果时，放棄任何批判的立場，那是錯誤的。当然我們党通过剛剛展开的斗争是應該贏得选票的。但讓我們进行一些比較吧。无須說，情况不是絕對相同的，但有某种类似之处。

党从 1932 年到 1936 年的选举期間多得了 116% 的选票（从 2.81% 到 6.06%）。

还有一个也許更有意义的例子：党在 1932 年竞选中比 1929 年增加了 45% 的选票，这基本上是通过它在一次罢工中的行动而取得的。但是那次大罢工的規模和意义都比 1960—1961 年罢工要小得多。

事实上，尽管党的骨干在罢工里忠心耿耿，但是党却为领导机构在以前几年和在这次运动中所犯錯誤的后果付出了代价。

列日工业区选举結果特別差（17%），也从这一事实得到明确的說明。

勒菲弗尔—斯巴克政府

正像我們在上面所說过的那样，壟断資本家不得不采取“新政策”，但是根本內容不变。外交政策方面，投靠北大西洋集团的老政策增加了一点比那位維尼的盛气凌人口气較為乖巧的話。

但是事实摆在这里：我們服兵役的时间正在延长为十五个月，国防及警察預算又增加了；主要是由于沉重的軍事負担，国債繼續迅速增加，从 1960 年 12 月 30 日的四千一百七十亿左右增加到 1962 年 12 月 31 日的四千四百四十亿。国債負担从 1960 年的将近二百二十亿增加到 1963 年的二百五十亿。（預計）

德国的軍事基地正在比利时建立起来。用原子武器装备比利时軍隊問題事实上也已决定了。

政府对剛果的政策确实有某些改变；但这个政策决不是尊重剛果真正独立的。它只是承认美国新殖民主义者渗入剛果的事实，承认必須同美国帝国主义共同剝削剛果的事实。

在內政方面，許多罢工者被关进監獄，而杀害罢工者的凶手却逍遙法外。

政府事实上企图把“单一法”“分段”零沽出去。本应在一年期滿后就廢除的增加商品流通稅的規定仍一直有效。所謂“稅收改革”却在巩固着反动的稅收制度，国家的絕大部分稅收压在劳动群众肩上。

紀耳松、維尔梅倫大臣，提出了一套所謂“維持治安法”草案，极其严重地侵犯了罢工权利。所謂結構“改革”（煤炭領導机构和國家投資公司）加强着國家資本主义，而唯一地只有利于托拉斯和壟斷資本。

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对这个坏政府的态度有利于比利时社会党右派。布魯姆在1962年5月26日的《紅旗報》中說：“勒菲弗尔—斯巴克的妥協并未使右派滿足。后者梦想的是另一回事”。

雷納·貝倫在1962年9月1日斷言：

“大資產階級擺脫不了那些使它感到碍事的大臣們，尽管这些大臣的政策不得人心。”

伯內尔1962年10月底在《爭取对政府綱領进行民主修改》的题目下对記者发表的談話也是从同样的思想出发的。此外，伯內尔強調的这个所謂民主修改，其內容之貧乏也是显而易見的。

政府听命于壟斷資本，它的坏政策证明了这一点。反对这个坏政策的斗争如果局限于“不得使政府垮台”的範圍內，那么，人們怎样能为反对这个坏政策而斗争呢。至于說如果政府倒台

就会使更右的政府上台，这种虛假的論据，正是历来改良主义者所持的論据。

問題不在于要提出“要政府垮台”的斗争口号。但是要反对政府的坏计划，满足劳动人民的要求，就需要譴責勒菲弗尔—斯巴克班子的活动和綱領。如果斗争加深资产阶級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它的政治人物，那么我們对此沒有必要感到遺憾。如果政府因劳动人民的更大規模、更坚决的斗争而垮台，那么，就会創造出更好的条件，去阻止成立一个可能更反动的政府、和促使劳动人民的正义要求得到滿足。

政治局的立場只能制造对目前政府的幻想，只能掩盖对其本质的揭露和阻碍群众的行动。

但我們也要注意到会主义者的作法并不是沒有自相矛盾之处的。伯內尔在1982年9月5日突然揭发斯巴克，紀耳松，范登·鮑埃南，范·奧登諾夫为“极端分子”，把他們說成是一丘之貉。……

*
* *
*

2. 关于工厂的、职业的、职业間的綱領

百万人大罢工将各行各业工人、公用事业职工等广大群众团結在共同的斗争中。百万人大罢工使所有靠工資生活者，在阶級敌人面前，提高了阶級觉悟和对团結一致的認識。

从此，在各业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繼續团結全体工人阶級的可能性增强了。

这并不是說可以忽視工厂的綱領，忽視各个行业的或各部门的要求。这些要求仍具有其重要性；特別是在須要为团結一

致行动打下初步基础的时期。例如，紧接着勒菲弗尔—斯巴克政府成立后的情况就是这样。同样各行业間的共同要求不应成为一种借口来妨碍这个或那个工厂，这个或那个行业在行动的可能性已成熟的时候发动斗争。

但是为实现各行业間的共同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是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它为行动的进一步发展，为更进一步的团结一致，更强大的力量，更高的觉悟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能否实现取决于要求权利纲领本身的价值，取决于为实现纲领而采取的行动方法是否有效。

大罢工以来，曾屡次有必要提出各行业間的共同要求。这种必要主要反映在总工会—天主教工会联合会关于税收改革的备忘录中，反映在反对反罢工法的斗争中。

另一方面，可以肯定，工人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大罢工翌日资方破坏工会自由的企图的失败（例如沙勒尔瓦的铁路工人和沙勒尔瓦电机制造厂）；1961年底公用事业工人和1962年矿工的斗争的胜利；在沃冷的出色的、情绪高涨的罢工（在这次罢工中纪耳松宪警的暴行是非常突出的）以及最近正在发展的冶金工人的斗争；这些都是这种斗争性的明证。

3. 行动和谈判

工人要求权利的斗争和所有的斗争一样，也提出了目标的问题，采用什么行动方法的问题，群众斗志和动员程度的问题，他们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以及其他劳动者的声援和支持的问题。

谈判只能是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斗争实际准备工作所造成压力的结果。

在1961年中，党为工人提出了私营企业工人的和公用事业工人的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能构成各行业間的总綱領。召开一个包括公私企业工人代表，資方代表及政府代表的全国劳工會議的想法被提出来了。当时这个建議可能有如下意义：所有有关的劳动者在行动中团结一致，应当能迫使資方和政府接受他們的要求，和在这方面作出一些明确的諾言。

但是只有行动才有希望召开这样一个全国劳工會議，并使會議获得积极成果。

然而在实践当中政治局却企图拿全国劳工會議本身来代替斗争手段。

让·布魯姆在1961年11月27日《紅旗报》题为《年終限期》一文中，最清楚不过地表示了这种想法。下面是主要的摘录：

“事实上很明显，我們关心的任何一个迫切問題除了尽可能平心靜气的談判外，是不能得到合适解决的……。”

“所有这些問題太复杂了，單純的劳資冲突是解决不了問題的。再說反动派也因此才希望劳資冲突。”

这是把“和平共处”运用到一個資本主义国家內敌对階級間的关系上。这是把談判与斗争对立起来，把談判当作行动的最高形式。

在劳資經常的冲突中，不應該宣揚这么一种談判的意义。談判和“妥协”的情况一样。妥协可以是胜利或失敗，可以是有利或不利的，可以是正确和必要的，也可以是投降和叛变。

談判取决于現有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意志和取决于斗争本身。談判的結果也取决于劳动者的代表們的态度，要看这些代表是否坚决依靠群众斗争，是否号召加强斗争，还是主張并宣揚階級合作的思想，惧怕或責难斗争（即“單純的劳資冲突”）。

断言“我們关心的任何一个迫切的問題（劳动者的要求），除

了尽可能平心靜气的談判外，是不能得到合适解决的”，这正是采用最空泛的改良主义的語言。

正当 1961 年 11 月底行动的进展表明公用事业总工会特别是铁路工人為他們的要求、为爭取六万二千四百法郎和取消第五条規定而斗争的情緒正处于“高峰”的时候，政治局还繼續提出召开全国劳工會議討論公私企业工人的全部要求的口号。在这个行动的新阶段，这个目标变成一种右傾的建議，实际上意味着：公用事业人員原应根据私营企业工人的斗争是否成熟，来决定自己的斗争。幸而政治局的口号对公用事业同志的斗志沒有发生什么作用，而总的看来，对这个部門的劳动者的斗争沒有发生什么影响。众所周知，他們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成为私营企业工人斗争的榜样和鼓舞。

4. 稅收改革

这个問題是人所共知的。比利时实行的稅收制度特別有利于收入多的人而把沉重的負担压在劳动人民身上。間接稅的部分是相当可观的，而且由于稅收額“不按指数折算”，劳动人民随着生活費用的提高而付出越来越多的稅。

每次因指数上升而按規定增加的工資，按理应恢复购买力。可是每次这种按規定增加的工資却給国家增加五亿多法郎的稅收。这样，购买力非但未恢复（且不談生活費用指数的作用是大成問題的），实际上反而遭到損害。例如最近按指数規定提高的工資平均征稅 15%。工資和薪金總額在 1939 年到 1961 年之間增至五点八倍，而由劳动人民負担的从收入中直接扣除的捐稅總額却平均增至二十六倍。另一方面，大有产者的偷稅漏稅估計每年約为一百五十亿法郎。

党本应在政府声明一宣布就以一个具体的税收改革草案为中心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该草案主要应具体规定减少间接税多少，规定以五万五千法郎为免税基数，制定税收额的指数，不恢复夫妇双份收入的家庭所得税，可是党的领导完全不是这样做。当政府提出大体上制订一个不利于劳动人民的税收制度的坏草案时，党的领导却确定了下面的目标：收入不超过十五万法郎的家庭所得税不增加，或收入不超过二十五万法郎的家庭的所得税不增加两种说法（1962年2月24日《红旗报》）。这样一个目标丝毫不能动员劳动者，也不能使税收法得到有利于靠工薪为生的职工的真正改革。

总工会和天主教工会联合会在1961年底采取的一个立场，尽管很不够，但它规定惩治大有产者的偷税漏税，规定税率按生活指数递减，以5%为一级，对低于十五万法郎的收入实行减税，低于九万法郎的收入要减得更多。

怎么来评价，怎么来形容党的领导在这方面的态度呢？只能是这样，即它急于通过“尽可能平心静气的谈判”寻求一个资产阶级能接受的虚假要求，以便能够在这个美满的成就上高唱胜利，高呼这个胜利的取得是因为“力量的新对比”和政治局“思想家”的“革新”。

只有在工会组织开始动起来，社会党左派对劳动者发出了警告的时候，党才有所转变。但要使群众的行动具有足够力量地展开起来则已经太迟，太迟了。

而迄今我们在提纲草案（第三十八条）里仍看不到以我们上面重新提到的，已经深入人心的口号为基础的明确的“税收改革”纲领。它只是泛泛地提出：

“减少低收入者的直接税，减少加于日常消费品的捐税。”

5. 社会綱領

工作报告和提綱草案就資方对待制訂綱領的态度，給我們作了一个頗为自相矛盾的敘述。工作报告（第三部分，第二項）中說：

“然而資方終于能避开 1962 年的三方面制訂綱領的全面計劃。”

另一方面，提綱草案第三十一条說：

“壟斷資本被迫应付工人們要求权利和要求改革結構的壓力，于是尽力要制訂一种社会的和經濟的綱領，以阻碍群众民主活动的发展……”

但是提綱草案第三十一条认为需要在上述一句的后面加上这一句：

“和对制訂民主的經濟綱領的願望进行詆毀，而这种經濟綱領是能够促使制訂一个真正进步的社会綱領的。”

另一方面，雷納·貝倫在 1962 年 6 月 23 日对記者談話中却不願把“訂立經濟綱領”作为“訂立社会綱領”的条件。

这些都是不一致的。

党的骨干在讀到工作报告（第三部分，第二項）中以下一句話时，也会非常驚訝：

“1962 年底，为爭取制訂一个良好的各行各业共同的綱領的斗争正在进行中！”

实际上，1962 年底，社会党工人，社会党左派骨干，瓦隆人民运动的骨干，冶金工会等已拋棄了为制訂社会綱領进行談判的想法。

雷納·貝倫和政治局沒有看到或不願看到工人階級所表示

的正当的怀疑，工人阶级不愿像过去一样，受有害的协议所驱。雷纳·贝伦把“制订社会和经济纲领”跟“计划化”混淆起来。

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会有完整的计划化，除非是在考茨基想像中的那种超帝国主义下。

幸而这种世界性的、唯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种骇人听闻的乌托邦，这“铁蹄”，是永远不会存在的。

然而，提纲草案第三十九条丙项却提出了乌托邦的而且确实是改良主义的目标，这就是：

“每年按照现代技术水平，制订一个经济计划。这计划应保证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能从国民收入中得到日益增长的一份。”

对雷纳·贝伦来说，“制订纲领”就是“制订计划”，而且：

“资本家自己也愈来愈坚决地谈论制订纲领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成就的反映；这也是全世界和我国工人运动高涨的结果。”（雷纳·贝伦，见1962年6月23日《红旗报》）

让·布鲁姆也说：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许多反共分子）都在不自觉地搞共产主义！”（见1963年2月11日《红旗报》）

这种“反映”和“结果”是同“促使”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称呼他们的党为“激进社会党”，以及甚至“促使”希特勒称呼他的党为“国家社会党”的那种“反映”和“结果”相类似的。

雷纳·贝伦认为：

“如果说，老板们现在只好同意制订某种社会‘纲领’的话，他们背地里却打算尽可能少丢掉一些，打算限制社会进步，把这些进步局限在很狭窄的范围。

“在劳动者看来则相反，制订纲领应该有利于社会进步，保证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生产率提高和科学技术能力的日益增长而不断得到改善。”

如果說，雷納·貝倫認為，老板們把社會進步局限于很狹窄的範圍內，我們則認為，雷納·貝倫把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立和階級鬥爭，局限于很狹窄的範圍。

雷納·貝倫所介紹的就是“社會資本主義”的概念；照他看來，這種資本主義，通過某種組織工作，通過某種綱領的訂立，似乎就能保證勞動者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照他看來，“老板們”的作用簡單地就是“阻礙”社會進步，并把這種社會進步“局限于很狹窄的範圍”，而勞動者的作用則是“促進”社會進步。

實際上是這樣：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則完全不能容許社會進步，而是恰恰相反，它是走向社會退化的。

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夠阻礙并限制這法則的作用，甚至從資本方面取得部分的改善。

老板們的作法，例如談論訂立綱領問題，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尽可能少丟掉些”和“把社會進步局限于很狹窄的範圍”，也是為了在他們可能的时候，根據情況，也就是說，根據工人們表現的戰鬥性的強弱，設法什麼也不丟掉，甚至還要收回來。

設想實現階級間的和諧；這是階級合作論者的夢想，事實上是不能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立階級間的關係，予以計劃化或“綱領化”的。現在冶金工人的鬥爭戳穿了資方的“綱領化”陰謀，從而又一次表明了這一點。

“制訂社會綱領”並不是工人階級在它反對資本的鬥爭中所取得的什麼“新”手段。這僅僅是壟斷資本家用來迷惑工人階級的幌子之一，目的是使工人階級把爭取權利的鬥爭置于資本主義經濟動蕩變遷的影響下，和宣揚階級合作思想。

壟斷資本家企圖得到的不僅是眼前的最高利潤，而且是長

远的和比較長遠的最高利潤。在這方面，社會和平是壟斷資本家希望能夠達到的目標，如果需要的話，他們也可以付出一點代價來收買。

壟斷資本家所要的，是要工人階級出賣它爭取切身利益的權利，以換取至多是一盆扁豆湯，可能的話，則僅是几句甜言蜜語。

工人們從自身經驗中認識到，只有靠他們的鬥爭才能改善他們出售勞動力的條件，就是說才能防止降低他們的地位和改善生活條件。“很狹窄的範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而不仅仅是出自老板們的意志。

這樣一種戰鬥立場並不等於是“宗派主義”，也不是對待談判漠不關心。如果這種談判是在“訂綱領”的招牌下進行的，那麼工人們應該揭穿一切騙局，進行干涉，提出自己的切身利益，提出自身權利的綱領，並確定為達到目的而需採取的鬥爭手段。

因此，談判的名目不應該影響工人們的行動部署，不管這個名目是“制訂社會綱領”、“全國勞工會議”還是“對等協議”。決定性的因素總是行動，是階級鬥爭（而不是合作）。

6. 把工資同生產和利潤聯繫起來嗎？

先進勞動者反對提綱草案第三十八條乙項所闡述的觀點。這一項談到“把工資同生產和利潤聯繫起來的工資協議”，它把“定期調整”工資協議作為各個行業爭取權利鬥爭的目標。（黑體是作者標的）

把工資同生產和利潤聯繫起來的工資協議，即便定期調整，也不過是把工資的水平同資本主義經濟的需要及其動蕩變遷的需要聯繫起來，而不是同爭取權利鬥爭的需要聯繫起來。這是

对劳资关系的一种改良主义观点，甚至是（雇佣关系上的）温情主义观点。

7. 反罢工法案

从1962年春天以来，政府准备反罢工法案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先进党的责任是立即有力地促使劳动者警惕这一危险。但是政治局在很长时间内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在上面提到的1962年6月23日雷纳·贝伦向记者的谈话中，连一点暗示也没有。直至9月1日那一天，正是纪耳松—维尔梅伦草案提出的那一天，贝伦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自称要描绘出一直到1962年年底的政治远景，但对这个问题仍保持沉默。

但是反对这些反罢工法案的抗议浪潮在扩大。在1963年1月25日《红旗报》上，伯内尔是怎样提这个问题的呢？光是标题就很有意思：

《争取工资的斗争和捣乱阴谋》。

伯内尔一面承认：

“反抗反罢工法案的斗争确实开始了。”“不应该允许把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和为撤消反罢工法案的斗争对立起来。”

接着又说：

“为制订1963年的社会纲领而斗争”（？），

同时他又说，提出“维持治安”法案，是“旨在对工人草拟新的要求工作进行捣乱的阴谋计划之一”。这就使标题的意思明白了。如果反罢工草案是一种破坏争取提高工资斗争的“捣乱阴谋”的话，那么只有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才是唯一有效的斗争。

这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吗？是的。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在云雾、混乱中，在自相矛盾而最后是涣散人心的言论中游来游

去。

提綱草案把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尤其是我國的狀況描寫得安寧幸福，對反罷工法案只用四個字提了一下，並且忘記把反對這法案的鬥爭規定為任務。保衛罷工權利的鬥爭應該是工人階級首先關心的事。

8. 爭取改革的鬥爭——有各式各樣的改革

我們將在後面第四部分來研究爭取改革的鬥爭在工人階級反資本的總行動中的意義問題，這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與修正主義者的區別所在。這裡，我們僅研究一下爭取某些改革的鬥爭的當前具體情況。

共產黨人主張進行符合於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利益的改革。

共產黨人譴責壟斷資本家所期望進行的“改革”，通過這種改革他們得以增強壟斷資本的權力與力量，進一步損害勞動人民來增加它們的利潤。

1935年創立的“銀行委員會”；戰後，斯巴克—伊斯更斯政府任內，國立銀行章程的修改和國家工業信貸公司的成立；勒菲弗爾—斯巴克政府任內，煤炭經理處與國家投資公司的成立，所有這些都是完全有利於壟斷資本的典型改革實例。

我們主張勞動人民通過自己反資本的鬥爭而贏得的改革。

我們主張實行確保免費醫療的名副其實的社會保險。我們主張設有全國衛生部門。

我們主張貫徹“同工同酬”原則，並給以法律保證。

我們主張實行四十小時工作制。

我們主張進行稅收改革，減輕勞動人民的捐稅負擔，打擊巨

額收入者。

我們主張进行真正的教育民主改革，有效地保证劳动人民的子弟能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

*
* * *

在我国工人阶级目前的斗争情况下，在揭发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局势中，特别应该注意正确地估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所谓国有化。

修正主义者掩藏或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

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改革。

当中央委员会在党章第一条的新条文中说：

“一系列结构改革的实现……将标志着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途程中的一些阶段”时，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修正主义的概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难道是：

“工人运动的力量日益壮大”（提纲草案第三条）的结果吗？难道是：

“社会主义制度鲜明的优越性”（提纲草案第六十四条）的结果吗？

不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质上来自法律、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这里面既没有什么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这里面只有垄断资本家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有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合并成为统一的加强剥削和压迫的机构。

在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前，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已經存在和成长。

真实的情况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已經有了巨大的发展。

就这一点來說,資本主义世界矛盾的深刻化的确加快了資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特有的趋向。

劳动群众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加剧了資本主义世界的矛盾。社会主义陣营的壮大也引起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加剧。

这些矛盾的加剧同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加强之間有什么联系呢?

“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加强壟断組織对国家生活的統治,把壟断組織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以便挽救資本主义制度,通过剝削工人阶级和掠夺广大居民阶层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潤。”

这是 1960 年八十一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中所說的。

社会主义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它的条件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权創造出来的,它的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有化实现“对剝夺者的剝夺”,通过社会主义国有化,生产資料变成全民所有。

国有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完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

在資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国有化終归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列宁曾經指出:

“……帝国主义时代,銀行資本时代,大資本主义壟断时代,壟断資本主义轉变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时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鎮

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军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①

1935年，雅克莫特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

“我深信比利时的经验将会向其他国家的工人们表明，社会民主派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只能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进一步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拯救资本主义制度。

“比利时目前正在经历一种管制经济的经验。其初步结果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在第十三次全会上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管制经济’只能加强金融资本，加强它的统治，并为法西斯主义准备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特别是在国有化的形式下，证实了列宁主义的估计。英国、意大利、法国、荷兰的例子充分表明了资产阶级国有化的作用和意义。

同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说法相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非但不能减轻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只能加剧它的矛盾。

列宁也曾经指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②

换言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更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7页。——译者

②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9页。——译者

加有利的**客观**条件。它一点也不标志着“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途程中的一些阶段”。这是向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綱草案”中所用的詞句。

列宁曾經严正地揭穿了這個騙局。他說：

“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錯誤就是根据資产階級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壟断資本主义或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已經不是資本主义，已經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①

列宁就“計劃化”問題繼續說：

“完备的計劃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計劃性，尽管資本大王們預先考虑到了一国範圍內甚至国际範圍內的生产規模，尽管他們有計劃地調節生产，但是現在还是处在資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資本主义。”^②

这就是說，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應該給我們用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决不是用来否定这个必要性，或者用来像修正主义者和現代修正主义者那样竭力吹噓什么資本主义的进步。

修正主义者和現代修正主义者，在企图混淆資产階級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时候，妄想使群众接受資产階級国有化和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加强。

他們在这样做的时候，还企图誣蔑社会主义国有化，从而誣蔑社会主义本身。

我們可以仿照列宁的話來說，在比利时那样的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資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階級专政加上生产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見《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9頁。——譯者

② 同上书，第430頁。——譯者

資料的(社会主义)国有化。

至于把“結構改革”，也就是例如把資本主义体系內的国有化，說成是“由資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轉化的一个阶段”（党章草案第一条），那就是欺騙劳动人民，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馳，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馳，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指示之一，就是必需摧毁資产階級国家机器，并且必需建立无产階級专政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性的第一件事。

因此，共产党人必需向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說明資产階級国有化的真实含义。他們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忽略保卫劳动群众当前利益的必要性，正如他們必須經常展开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来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尤其應該宣揚和保卫必要的措施，来尽可能維護国营企业中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他們的自由权利，他的工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劳动人民作为消費者的种种利益。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重新抬起了改良主义的理論算作自己的东西。这种理論认为：

“一系列結構改革的实现将构成民主的扩大，将标志着由資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轉变过程中的一些阶段。”（党章第一条的修改意見）

这是以改革来代替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

因此，对政治局說来，改革就是党在我們时代、国内問題上的一切行动的目的。提綱草案不着边际，而且对于應該具有实际具体內容的这种或那种改革，这种或那种国有化完全起着消极作用。

中央委员会曾在 1961 年 12 月 16 和 17 日召开一次党的全

国会議。議題是：《讓我們在爭取結構改革的鬥爭中樹立几根標竿吧！》

然而，我們在这些“偉大的新思想”中，在这些小階段中看到些甚麼貨色呢？

——“情報權”，并以“确实的企业檢查員組織”（不过需根据法律規定！）为小階段。

——“公布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營業成本和物資的買价”；

——“控股公司、銀行及大的有限公司等須按各該单位的有价証券、儲備或存款的百分之十的比例強制購買国家投資公司的股票”；

——“制定外国資本在比利时經營企业的保护(?)條款”；

——“限制自供資金”；

——“使設在瓦隆区的企业把一部分儲備用于弗兰德区的投資上”。

这就是大部分“杰出的”“新思想”的例证。

这就再一次表明了修正主义者的內容貧乏，空洞无物。誰不再是一个革命者，誰就終归要放棄进行真正实际的爭取切身权利和爭取有利于劳动者的改革的鬥爭，成为“資本主义的忠实代理人”。

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在第三部分第三节第四点提到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往往把爭取結構改革的鬥爭和寻求結構改革的道路單純寄托在議会的发起倡議上”。

中央委員會不該对这个“弱点”表示驚訝，而應該从这里面得出唯一有价值的結論。政治局和1961年全国會議的所謂“結構改革”絕對引不起党的群众和积极分子的兴趣。这种現代修正主义实在太幼稚，决不能使劳动者脫离他們实现真正階級要

求的斗争。

* * *

现在来阐明一下修正主义的一种手法。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要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需要划分为若干阶段。例如,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与宣傳密切相关的,然后进入鼓动,进而为了成为行动的动力,需要組織、发动、发展并在一定条件下达到更高的水平,然后轉入实现新的目标。

一定的行动口号,既可以符合仍然属于宣傳鼓动范围的目标的部分实现,也可以为达到新的发展而創造更好的条件。

这种策略是必要的,它应该考虑到斗争的防御方面与进攻方面,它应该与生活結合在一起,它应该是运动的,也就是說,它应该是辯证的。

确定阶段与进行妥协都是这样的。一个既定目标本身并不因为它被称作“阶段”就是好东西,正如妥协本身并不因为它被称作“明智的妥协”就是好东西。对于修正主义者說来,确定“阶段”,树立“标杆”,提出“分期解决方案”(提綱草案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七条)和“試探办法”(提綱草案第四十五条)都不是总斗争的一个“片刻”,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們用这些东西代替了斗争的目的。因此,这些阶段与小阶段就成了实现真正目标的障碍,束縛着行动,而最終將轉移开爭取有效目标的行动。

我們在前面已举出了几个例证(如放棄縮減一百亿軍費的口号,主張稅收改革,制定社会綱領等)。

修正主义者厌恶斗争。修正主义者以确定阶段和提出試探办法为借口,掩盖了真正的奋斗目标,代之以“迁就性”的、完全能为阶级敌人所接受的“改良”。在有利于敌人的情况下达成的“妥协”,竟被称作劳动人民由于修正主义的“现实”政策而获得

的一个偉大胜利。这是改良主义者慣用的欺騙手法，政治局現在也經常加以使用了。

9. 联邦制

我們党在上次大战很久以前，就曾主張实行联邦制。十多年以前，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显然是机会主义（左傾机会主义也罢，右傾机会主义也罢）的決議，改变了这个立場。短时的和特殊的情况被他們用来当作拋棄正确立場和目标的辯解。

直到 1961 年瓦隆区掀起强大的运动，并在綱領中明确要求实行联邦制，中央委员会才重新贊成这个民主要求。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联邦制的原則立場，現在是、将来仍然是列宁对待爭取民主斗争的立場。（詳見《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 22 卷）

“正像不实行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进行全面的彻底的爭取民主的革命斗争，就不能造成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財政資本的統治，也和一般資本的統治一样，并不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能消灭的；而民族自决則完全是屬於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財政資本的这种統治，絲毫不能消除政治民主这一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显明的形式的作用。因此，从經濟意义上來說，关于任何一种政治民主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能实现’的一切論断，归結起来，就是在理論上对资本主义同一般政治民主的一般关系和基本关系作了不正确的断定。”^①

^①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見《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38—139 頁。——譯者

“无产階級所面临的刻不容緩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剝夺銀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資产階級，特別是費边社分子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識分子，在这种时机一定会千方百計地打乱和阻止革命，硬要革命接受狹隘的民主目的。”^①

列宁在讲过这段話以后，強調指出，

“必須使为爭取这一要求（民族自决权）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資产階級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②

我們认为，要想有效地进行反对壟断資本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的斗争，尤其是要想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資产階級，工人階級必須紧密地团结起来。实行联邦制則有助于瓦隆、弗兰德和布魯塞尔的劳动人民的团结。

实现联邦制，可以为劳动人民开展經濟与政治的权利要求的斗争創造更好的条件。

实现联邦制，就是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两个民族和三个“共同体”（弗兰德、瓦隆和布魯塞尔），这正是比利时資产階級的“統一国家”所力图否认的事实。

我們所主張的联邦制，虽規定在政治、經濟、社会、文化等許多方面享有最大限度的“自决权”，但它本身并不消灭、也无法消灭資产階級专政和資产階級国家。持有相反的说法則是散布幻想。但是这种联邦制却动摇着百年来資产階級旧秩序的结构。

它不仅可以把广大的工人群众，而且可以把其他劳动阶层的广大群众卷进政治斗争中来。尽管其中有些阶层对此运动有着自己的观点和偏見，但客观上，这个斗争在打击着資本，打击

①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見《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7頁。——譯者

② 同上书，第150頁。——譯者

着資產階級的国家。无产階級及其有覺悟的先鋒隊應該團結起來，並將這一龐大的聯盟引導到更堅決地進行反壟斷資本、反壟斷資本的國家的鬥爭。

*
* *
*

政治局對聯邦制的態度的特點是混淆不清。1961年初，讓·特爾夫在關於瓦隆人民運動的短文中說道：

“我國有兩個種族和文化各異的地區，它們各有各的特點和願望，經濟發展也不相同。這有利於進行掩蓋階級對立的系統分裂政策。”

“種族”觀念與我們應該對局勢作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毫無共同之處。讓·特爾夫指出了文化不同（當然如此）和經濟發展各異，卻未對兩個民族、三個“共同體”的各自特點和切身要求作出任何分析，因此在他的短文中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這個事實卻是瓦隆區期望實現聯邦制的基础之一——即瓦隆區和弗蘭德區具有不同的政治特點：瓦隆區大多數人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儘管其中大部分人至今還未擺脫改良主義的幻想）；弗蘭德區卻有一大部分人受着天主教政黨（今為天主教社會黨）和宗教的影響，這種情況已持續了數十年之久。

只要工人階級的有覺悟的先鋒隊無視這些特點，或者對於這些差異、特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願望（包括具有民族性的願望）採取輕視的態度，那麼，它就會“有利於（資產階級方面的）掩蓋階級對立的系統分裂政策”。

讓·特爾夫所談的這種“系統分裂政策”，並不是注定由客觀形勢造成它一帆風順的，這一政策的成敗，主要取決於有覺悟的先鋒隊對此問題採取的態度。

讓·特爾夫和政治局重犯了社會民主黨在對待正當的民族

(或具有民族性的)願望上所犯的“錯誤”，表面上似乎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

事實上，改良主義者控制下的比利時工人黨，也同樣忽視工人運動所要求的捍衛弗來米族正當權利的堅決政策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重要意义。

改良主義者所抱的這種態度，表面上激進得很（將“民族問題”與階級鬥爭對立起來），實際上，由於他們沒有為自己提出革命的前景，遂“縮小”工人階級的作用，否認這些運動在力量配備上的可能性，而客觀上（即使不始終是有意識地）這些運動都在進行着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讓·特爾夫在他的短文中說道：“將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混為一談是威脅着聯邦制運動的重要暗礁之一”，這是在“混淆”中重複着同樣的觀念。

瓦隆地區的廣大人民階層，都渴望進行革命改造。雖然他們至今尚未完全丟掉改良主義的幻想，但是，都已日益堅決地起來反對社會民主黨的令人萎靡的陳腐公式，他們要求採取行動以便達到粉碎裹足不前的現象的目的，而這種現象正是比利時社會黨右派想讓這些階層的人民維持着的。

形勢逼人，政治局不得不承認必須實現聯邦制這個奮鬥目標。但這並不等於說就沒有矛盾了，因為政治局對具有民族性的權利要求採取的既是機會主義又是宗派主義的態度，它對行動也是感到厭惡的。

讓·特爾夫在短文中說道：“清楚地說明發生疑問的並不是**比利時國家**（黑體是作者標的），而是**國家的支柱適合與否**的問題。”

（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第四部分第二點（關於聯邦制問題）談到了共產黨提議的法案，法案要求在弗蘭德區和瓦隆區建立

经过选举产生的**介于中央政权与行省之間**的地方权力机构。

提綱草案第四十四条称：

“**联邦制是确保比利时更趋稳定与平衡的一个手段。在这个比利时的内部，壟断資本将无法再利用民族的对立。当前的比利时国家的統一形式則使民族对立愈演愈烈。**”

上面所談的比利时是指甚么呢？上下文表明，是指比利时国家。

瓦隆的劳动人民支持实行联邦制，当然不会是为了确保比利时资产阶级的国家更趋稳定，一旦实现联邦制，资产阶级的国家也絕不会更趋稳定。

要想实现瓦隆劳动人民、尤其是瓦隆人民运动成員所期望的真正的結構改革，問題應該在于，而且必将在于政权問題和工人阶级行使政权問題，必須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問題。劳动群众根据自己切身的經驗一定会認識这一点。

让·特尔夫和中央委员会却把这个国家“稳定”的加强看作是**这个国家的“支柱的适合”**。

在政治局的文件里面，正像在特尔夫的文章、中央工作报告和提綱草案里面一样，都显露出对布魯塞尔区和对該区的一百二十万劳动人民的忽視。

工作报告在談到上述那項法令草案时，談到在**弗兰德区和瓦隆区**建立起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政权。难道布魯塞尔区的人民就沒有权利享有代表嗎？

提綱草案沒有直截了当地承认“两个民族和三个共同体”这种实际情况，而起初說“弗兰德区”和“瓦隆区”，接着又轉口为“布魯塞尔居民点”或“特殊的布魯塞尔整体”。

在上述的特尔夫短文中，又在阶级激进主义的外表下剝夺

了布魯塞爾的一切資格，

“某些會講法文、受過法國文化教育的重要階層，或可作為實現聯邦制的同盟軍，但他們的階級利益使他們更接近於主張統一的資產階級。”

布魯塞爾區一百二十萬居民的絕大多數並不是由銀行家、工業家和高級官員組成的，而是由數十萬工人、職員、小公務員和知識分子組成的。他們都有可能支持聯邦制這一民主要求。布魯塞爾區的瓦隆人民運動主要是由這幾類勞動人民所構成的。

對於占全國人口 14% 的人持這種態度，究竟它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是甚麼呢？

在我們看來，這種態度並不是單純地由於瓦隆居民某些階層的沙文主義余孽作祟而造成的簡單化觀念的反映。這些階層很可能把布魯塞爾的勞動人民與建立在該市的大托拉斯、大壟斷資本同等對待的。

實際上，除了建在首都、多少有些國際性的“比利時”托拉斯和壟斷資本外，在比利時還有所謂弗來米金融勢力，因為它們的主要經濟基礎位於弗蘭德區（如布卡爾公司、熱瓦爾公司、安特衛普沿海與港口利益公司等），還有所謂瓦隆金融勢力，如波愛勒家族以及最強大的家族德·洛努瓦集團。長期以來十分劇烈的對抗，過去使、現在仍然繼續使德·洛努瓦集團與某些“布魯塞爾”的金融勢力互相對立，這對任何人說來都不是秘密。

毫無疑問，德·洛努瓦集團的目標是成為“冶煉大王”，這會使它与盧森堡大公國、洛林、薩爾、甚至魯爾的某些霸主們勾結起來。“反布魯塞爾”的激情正濃，這完全符合在托拉斯歐洲的範圍內進行“超國家整編”的目的。當然這樣做決不會使托拉斯的歐洲感到不愉快的。

而这种反布鲁塞尔的态度是与先进的劳动人民所维护的那种联邦制的要求截然相反的，是与工人运动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垄断资本的国家这一正确政策背道而驰的。

*
* *
*

今天，实行联邦制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已经非常明确了。联邦制受到了全国先进劳动人民和瓦隆广大群众的支持。问题在于确定能实现联邦制的手段和行动的方式。

在瓦隆区，联邦制的口号应从目前的鼓动范围内摆脱出来，进入行动方面。这是使弗兰德、布鲁塞尔和瓦隆某些地区的联邦制口号，从宣传口号变为准备采取行动的鼓动口号的条件。

无容置辩地，这就是瓦隆人民运动的领导人在筹备上次列日代表大会时的意图，尤其是叶尔纳同志还强调了有待组织的“直接行动”。资产阶级没有弄错，它极力反对叶尔纳和瓦隆人民运动。

但是，提纲草案第四十五条的说法是甚么呢？它主张“阶段性”的解决方案和“试探性解决方案”，其性质纯粹是使瓦隆人民运动在现阶段钻到裹足不前的死圈圈中去罢了。

它所提供的概括方案是：

——“建立经民主选择的（？）、真正具有群众代表性的机构”；

在各个“民族集团”中

——由上述这些机构“进行必要的谈判”……“以寻求最适当的解决办法，维护各自的以及共同的利益”；

——“从而为联邦概念的逐渐成熟创造条件，并采取措施实行筹备联邦制”。

根据这个概括方案，党的领导竟将使瓦隆人民运动一味等

待一个“有效的談判对手”。

这还不清楚嗎？即建立起“各民族集团經民主选择、真正具有群众代表性的”机构，其先决条件是在弗兰德、布魯塞尔以及甚至瓦隆的某些地区“联邦概念的成熟”。

只有当希望实行联邦制的瓦隆人民群众的行动創造好这种談判的条件、并将这种談判强加于統一国家的拥护者之后，才有可能进行这个“必須进行的談判”。

同时，还应该把爭取实现联邦制的行动同反对“統一”政府政策的具体表現（如反罢工法案、所謂紀耳松“語言”法案、选举改革等）的行动具体地結合起来，同进行爭取有利于劳动者的权利要求和改革的行动具体地結合起来。

还应该注意的是：在工厂和街道中（它們是行动的組織者）建立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机构。这些机构互相联合，可以成为筹备联邦制的机关。

*
* *

同样，人們不能对提綱草案第三十二条表示同意，因为这一条仅仅揭发了企图“把弗来米右翼民族主义者和瓦隆人民运动等量齐观”的阴谋，而沒有明确指出，对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这班右派分裂分子說来，实际上必須打倒而且唯一应打倒的是瓦隆人民运动。

*
* *

工人阶级与瓦隆其他劳动人民阶层建立了为反資本而奋斗的联盟，而瓦隆人民运动現在就是这一联盟的組織形式。

最近几个月来，瓦隆人民运动在关于劳动群众当前的主要問題上（如稅收改革、生活指数和反罢工法案）采取的立場是完

全正确的。同时，它还善于进行维护弗隆居民（他们是紀耳松法的牺牲品）和木斯克龙—高敏居民（他们受到了不能容許的任人摆布的威胁）的正当权利的斗争，以及善于进行维护布魯塞尔区的民主自由的斗争。

先进的劳动者，瓦隆人民运动的积极分子，都应该意識到加强瓦隆人民运动的必要性。

我們为了同改良主义断絕关系，必須积极估計瓦隆人民运动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的努力和已經做的工作。

瓦隆人民运动产生于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罢工运动中瓦隆区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

它由此而联合了拋棄改良主义而拥护斗争的劳动者。

但是，这个真正的并且极重要的“激进化”并不一定馬上彻底地坚决地同改良主义的思想决裂。这是一个过程。它反映在瓦隆人民运动的发展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改良主义思潮的斗争應該是持久的。

重新墮入資产階級議會活动和改良主义的幻想，这种危机依然存在。这将是宣布瓦隆人民运动的死刑。对整个工人运动也将是沉重的打击。

在这个問題上，党的领导所采取的态度恰恰是在瓦隆人民运动内部提倡最不利于实际行动、最不利于具体組織斗争的、发源于小資产階級的各种傾向。

瓦隆人民运动体现了瓦隆劳动人民的意志，共产党人應該成为瓦隆人民反对壟断資本、反对壟断資本的国家的进攻、爭取劳动群众經濟政治的正义要求的典型战士。

关于联邦制度，瓦隆人民运动的先进积极分子将在每天的斗争中向群众解釋口号的意义。他們應該在企业里和地方上創立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組織，以便組織斗争，从而把基层的联邦

主义机构卷进战斗。

共产党人同瓦隆人民运动的其他全部先进的劳动者一道，努力一步一步地明确当前的目标，总的目标，应该采取的斗争手段和需要締結的同盟。

这样才会在行动中，通过群众的切身經驗，逐渐成熟地意識到工人階級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权等根本問題。

10. 帮助左翼社会党劳动者摆脱改良主义呢？还是援救左派分子呢？

提綱草案第五十条承认：

“（社会党）右派正以其反民主的行徑制造分裂条件，而且正准备把分裂的責任推卸在左翼力量的身上。”

提綱草案在提出这一事实之后，竟抽象地煞有其事地說：

“共产党认为，不让右派分子得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成立一个社会党反对派只会有利于右派。此外，它还会削弱工人行动的可能性，妨碍反壟断的斗争。”

上述段落的总标题是：

《社会党内部的分裂仅仅有利于右派》。

这种观察問題的方法清楚地表明想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与右派的团結。

我們就来实际地（而不是抽象地）看看形势吧。让我们提出最乐观的假設，假定极右分子由于拒不低头而在比利时社会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孤立、被击败。

社会党党员应否在这种局势面前屈服呢？在右派的分裂詭詐面前应否退让呢（不幸这种事情常常发生）？难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劳动者采取坚定的态度“将会削弱工人行动的可能性

并妨碍反壟断的斗争”嗎？

我們再提出另外一个假設：假定社会党左翼在比利时社会党内已竭力维护自己的斗争立場，但实际上右派却对左翼社会党的劳动者采取了开除措施（根据比利时社会党的結構和活动，甚至可以使用代表大会決議这样的所謂“民主”形式，因而采取开除措施是可能的）。

我們不妨举一个具体例子，例如，宣布不得同时属于比利时社会党和瓦隆人民运动。

左翼社会党劳动者应否屈服，应否“忠实执行”这种代表大会的決議呢？这种态度会不会增加工人阶级反壟断資本行动的可能性呢？

值得注意的是，提綱草案第五十条，沒有从对改良主义和右派的态度进行任何原則批評出发，而是想把社会党党员的行动局限在“要求比利时社会党的党内民主和忠实履行代表大会的決議”。

政治局的观点，实际上沒有給社会党劳动者指出任何出路。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政治局已放棄了使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先鋒队的立場，政治局本身在實踐中已日益走向右派的立場。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貫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本来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采取一貫的阶级立場，把广大的社会党劳动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級引到日益坚决的阶级立場上来。

共产党本應該是反对改良主义右派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影响，反对他們在比利时社会党内部并通过比利时社会党进行活动的基本力量。

*
* *
*

但是，政治局的立場不仅有助于解除劳动者武装，使他們迷

失方向，而且为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国家、反兄弟党的运动作出了贡献，客观上还有助于比利时社会党右派反对左翼社会党员的行动。

1962年初《红旗报》上刊载的皮埃尔·儒瓦的一系列文章、杜夏多的一篇文章和卢扬的一篇文章，都成了《人民报》的好材料了。

1962年2月27日《人民报》写道：

“共产党人的转变。

“皮埃尔·儒瓦先生在《红旗报》上骤然间颂扬起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了……

“这是姗姗来迟的褒奖。

“我们自然是怀着某种满意的心情记下我国的一位共产党领袖的这番懺悔的……

“经过这番转变，可以期待其他的转变。总有一天，许多共产党员会对多年来在工人阶级内干下的分裂勾当感到遗憾。”

1962年3月10—11日的《人民报》写道：

“共产党人的转变；

“比利时共产党人的转变仍在继续中。昨天，皮埃尔·儒瓦先生已承认列宁的某些论点已经过时，今天又输到了卢扬先生……

“人们将有机会来注意该党的修正主义，该党已承认它刚刚‘从某种禁锢中摆脱出来’。”

1962年3月16日的《人民报》写道：

“修正主义与宗派主义左倾主义”

“……好，我们几乎可以同意这位共产党人（杜夏多）的意见。他善于巧妙地掌握思想意识的平衡。为了给他一点安慰，我们想再奉告这一点：宗派主义左倾主义同样也是各社会党内的

不良因素。”

格里巴同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一事，为比利时社会党右派提供了新武器。1962年11月22日《人民报》的社论——题为《格里巴被开除》——是对社会党左翼的一种隐蔽的威胁。

人们特别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如果把对付‘异端分子’格里巴的措施的十分之一用于比利时社会党（哪怕情节更为严重），保险人们立即看到共产党的报纸又该义愤填膺了，并且竭力从中捞取论据。”

1962年12月13日《人民报》在一篇题为《派别活动》的社论中对瓦隆人民运动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文章的出发点是以特尔夫在瓦隆人民运动列日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上的一次发言为依据的：

“前部长、前共产党议员让·特尔夫在步入瓦隆人民运动决议起草委员会议事大厅时声称：

“这个决议对比利时社会党未免有些过于苛刻了。应本着‘客观’的精神来加以修改。瓦隆人民运动仍然应该是比利时社会党内的一个压力集团，而不是一个系统的反对派系。”

恰恰相反，这份决议草案是完全正确的。它对政府政策的批判、对比利时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的批判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让·特尔夫看来，这份决议“未免太过于苛刻了”，它是不客观的……因此，让·特尔夫在瓦隆人民运动代表大会上急忙援助了比利时社会党的右派分子。

提纲草案第五十二条大谈“宗派主义过激主义”、“左倾主义”、“教条主义”，却没有作任何说明。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他们在谩骂那些在党内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同志时，还是使用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历来对革命者所惯用的策略。

列宁在整整一生中饱尝了这类辱骂。提綱草案却对社会党左翼也加以指责了。

“这种左傾偏差在社会党左翼有所反映，有时在我們党内也有所反映。对于像我們这样的国家來說，这种偏差是非常可怕的……”

毫無疑問，我們的某些同志和社会党左翼的某些同志都犯过一些左傾錯誤。

而今天，主要威胁着我們党的致命的政治危險肯定是修正主义的危險。

至于社会党左翼，其中某些参加者的左傾主义也絕不是他們的重要特点。

事实上，社会党左翼思想不一致，有几个派別，但沒有一家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尽管其中有些成員傾向于靠近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最能标志这些不同派別的，不是帶有改良主义幻想的殘余就是受到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花样“翻新”的引誘，再不然就是托洛茨基的机会主义变种。

但是，总的來說，大部分社会党左翼基于自己的切身經驗，是在朝着比較一貫的階級斗争立場轉变。

这就触怒了修正主义的政治局。它与右派分子站在同一立場上說什么“左翼危險”，“謹防左翼”。

如果这还不算是階級合作思想，还不算是数十年来所散播、鼓吹、培植起来的改良主义，那么，照提綱草案第五十二条的說法，究竟現在什么是“对我国特別可怕”的危險呢？政治局否认这是階級合作思想和改良主义，因此，这只能证实政治局本身已經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場上。

但是，改良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已經气数将尽，即便“在我国”也是如此。

改良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已经受到狠狠的打击。这种影响将愈来愈受到这样的打击，尽管我们党现在的领导人中途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阶段，而这可能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11. 群众行动呢，还是议会迷？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深刻和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军事戒严或摧残蹂躏。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摧残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说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就愈能操纵资产阶级议会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历史局限性和条件性。

“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制度’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败和虚伪。为了准备群众进行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家和鼓动家要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

“然而当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妙处……

“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下，

議會從來沒有解決過重大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牆垣阻隔着，所以工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覺到，看到和体会到：資產階級的議會是別人的機關，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是敵對階級即少數剝削者的機關……”①。

我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提綱草案曾談起“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議會道路”。

十三大摒棄了這個觀點。然而政治局毫不考慮這一警告，事實上，他們的行徑似乎是向社會主義邁進真能通過議會道路似的。

政治局秉承這一方針，而將“到議員家里請願”作為一種高級的行動方式。

我們並不反對到議員家里請願。

當一個企業的勞動者即將或準備轉入爭取權利要求的行動之前，往往派遣一個代表團找領導，向領導遞交一本勞動者的要求書並表明鬥爭的決心。這既是一種強制性要求，是行動的發端，是行動的一部分，也是一種“示威”，如果進行得好，它還是動員群眾的補充手段。

勞動者也深知到工會領導那里去請求或要求組織鬥爭的意義，當然，這些請願團不能代替真正行動的本身，但可以為行動作準備。

根據不同情況和對象，到議員家里去請願並沒有或只能有一個與我們上述各類型的請願團相似的意義。然而，對政治局來說，這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到議員家里去請願”成了萬靈藥方，或者正如1962年7月28日《紅旗報》所說的：

①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見《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7—229頁。——譯者

“……如果工人运动懂得它终于从这里获得了它过去所缺乏的手段，获得了可使议会生活同国家合拍的方法，那么，工运面前必将展开一片料想不到的远景。”

难道这不是散播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幻想，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

这是“赞美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美妙”。

*
* *

中央委员会在提纲第三十九条中，再次以对资产阶级议会的幻想来代替维护与扩大民主自由的具体斗争。提纲草案第三十九条写道：

“根除比利时议会与劳动群众的分离……”

这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无法实现的目标。

诚然，群众的压力可以强制实现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权利要求和改革。然而，只有行动才能施加这种压力。政治局时刻谈到的这种压力就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使这种压力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资产阶级议会与劳动群众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对抗性的经常性矛盾的表现之一。

政治局及其追随者——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三大的立场。

12. 共同市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

我们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纲草案第三十七条）曾严厉明确地谴责过共同市场和欧洲煤钢联营，因为它们是“托拉斯的欧洲”，并且同样谴责了它们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性条约

的政策勾結在一起。

提綱強調指出：歐洲一体化不但不能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反而為更加深刻的矛盾和加強剝削西歐勞動者奠定了基礎。

這次的提綱草案按照政治局自十三大以來奉行的實踐路線着手進行“分析”，得出了同十三大全然不同的政治路線。

提綱草案承認某些難於否認的證據：

“在壟斷資本庇護下實現經濟一体化，如歐洲煤鋼聯營和歐洲共同市場，主要是企圖加強超等大托拉斯的威力……

……然而，經濟一体化並不因此就消除分裂着資本主義世界的深刻矛盾。

它更加激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提綱草案第三條）。

提綱草案第四十六條又說：

“國際經濟一体化就算在本質上並不一定反動、倒退，但只要是在壟斷資本庇護下實現的，就必然會引起極壞的後果；歐洲經濟共同體正是這樣。”

人們在這裡可以看到戲法的第一幕。

當前歐洲經濟一体化的本質正在于它受着壟斷資本的庇護。

中央委員會的那種說法，從階級觀點來說，等於這樣說：

“工業集中就算在本質上不是反動、倒退的因素，只要是在壟斷資本庇護下實現的，就必然會引起極壞的後果。”

中央委員會情願受修正主義的迷惑，無視現實，以便只看到些表面的和眼前的東西。

修正主義者每逢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繁榮，便茫然不知所措。他們從短暫的現象出發，承認所謂資本主義矛盾的緩和並加以一般化。例如，提綱草案第十條說：

“經濟一体化並不僅僅靠它自己來保證生產的不斷發展，也

不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周期发展、衰退时期和经济危机。”

“并不仅仅靠它自己”，这句话岂不明明白白意味着它也有
一份功劳吗？

可是，事情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切根本矛盾日益深刻化的基础之一，而且还引起新的矛盾的产生。

*
* *

然而，提纲草案第二条却连“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都不谈了。它说：

“军费的过度膨胀虽然使军火托拉斯发财，但也妨碍了经济的平衡发展……”

照修正主义“理论家”看起来，只要撇开战争的费用，资本主义经济就保险能够“平衡发展”了！

*
* *

同样，提纲草案也没有明确地指出共同市场是旨在对不发达国家加强殖民统治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一种尝试。

列宁早已作过说明，而且仍然完全适用于今天：

“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①

我们则仍然站在1960年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立场上，

“在‘整体化’口号下产生的新的国际组织，实际上在加深着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组织是最大的资本家集团

^①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见《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9页。——译者

之間瓜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新形式，是較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向其較弱的伙伴實行經濟滲透的新形式……

帝國主義者結成以美國為首的各種軍事政治聯盟，共同進行反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鬥爭，扼殺民族解放運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

提綱草案第四十六條借口不要局限於揭露共同市場具有的危險，竟然說：

“今天共同市場已成事實，必須予以考慮，對其施加影響，以便改造它，給它指出其他方向，或以其他機構取而代之，使經濟整體化為社會進步和組織和平共處服務。”

當印刷這幾行字的油墨未乾的時候，共同市場已瀕於破裂了！提綱卻沒有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與日俱增的情況作出任何分析，尤其沒有分析使美英帝國主義之間、英帝國主義與巴黎—波恩軸心共同統治的野心之間、巴黎—波恩軸心本身與美國之間，以及共同市場成員國之間相互對立的矛盾。

中央委員會認為應該進入共同市場——這個托拉斯的歐洲——以便：

“在裡面發生影響，予以改造。”

中央委員會奮起直追，趕上了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者的立場，這些忠於自己的一貫觀點的改良主義者已完全“一體”到這個資本主義的新機器中去了。

勞動群眾的代表參加某些機構，雖然不應該一概加以反對，但他們參加這些機構只能具有下述內容：例如，忠於本階級的工人代表參加代表額對等的委員會或議會，不是要“改造這些機構”，而是要在這些機構中充當勞動者的權利要求的代言人，利

用这些合法的可能性越发强有力地号召展开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政治局关于共同市场问题的“大转变”还表现在其他更广的观点上。

提纲草案第四条称：

“(“社会主义”)针对把世界分成经济竞赛集团，主张在有计划地实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经济援助，恢复世界范围的统一市场；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将在这统一市场中和平地进行较量。”

这就是现在有人想给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指定的奋斗目标：“恢复世界统一市场”，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必将带来政治一体化，我们面前呈现出的是一个“更新”的怪物，包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世界。

两个阵营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是恢复“世界统一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不同的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统一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一体化，只能是建立国际范围的阶级合作，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变质，只能是从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

认为通过一体化，社会主义就能将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比改良主义的理論还要空想，还要错误，因为改良主义理論还主张通过生产协会^①与合作社来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

这些“新理論”企图使人相信，采用一些经济法术，仅仅依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竞赛（某些人还提和平合作），就有可能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① 生产协会（Phalanstères）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提倡的理想集体制。——譯者

这种理論的唯一目的是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作用的理論，否認關於必須進行革命鬥爭、必須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以及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

這些修正主義理論從思想上和實踐上都在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使工人階級喪失鬥志，因此，客觀上是为保存資本主義的統治服務的。

*
* *
*

政治局及其追隨者——中央委員會，選取了導致國際範圍內階級合作的道路。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則始終站在各國無產者在國際範圍內進行偉大的階級鬥爭的最前列，這一鬥爭日益擴大，正接近最終的勝利。

四、要革命呢，还是要社会改良？要馬克思列寧主義呢，还是要修正主義？要共產黨呢，还是要改良主義的政黨？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團結呢，还是要修正主義基礎上的假“團結”？

1. 社会主义仍然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嗎？

1962年2月22日《紅旗報》上登載的所謂政治局的“意見書”中稱：

“普遍建立社會主義並不是戰略目的。它是社會發展本身

的基本情况和客观法则。

“不是由共产党人在其制定的政治路线中来确定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必然的转变是生活本身的表现，是人类社会走向进步和幸福的演进结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它存在的理由是使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有秩序的形式，使它的时刻接近，缩短实现它的阶段，利用已经取得的理论教训和经验来避免摸索和暗礁。总之，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人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阐述了修正主义的典型的观点。修正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自行发生的，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表现”，党的作用不过是“有助于”或者“便于”终会自行产生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是资本主义自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自动论”观点。列宁在1908年4月所著《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书中写道：

“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同他们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相辅相成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

的修正主义。”^①

在1904年^②列宁所著《怎么办》一书中，我们看到引自“经济主义”（这是机会主义的变种）刊物《工人事业》杂志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与政治局的“意见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可以看出，某些所谓“新”思想，不过是半世纪前的旧货色而已）：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只是要以自己的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客观发展过程。……但是因为《火星报》（列宁主义报纸）对于策略持有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意见，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③

这份“经济主义”报纸竟责备《火星报》：“把自己的纲领拿来与运动对立，把自己的纲领当作翱翔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精神。”

列宁用极其锋利的语言驳斥了这种被他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观点。

他随即指出：

“单是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的‘互相比較的意义的估計’这个说法，就已经暴露出完全缺乏自觉性的事实……

“难道社会民主党（即当时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作者）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不仅翱翔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的‘精神’吗？”^④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必然为革命形势创造客观条件。然而，只有当主观因素与这些客观条件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产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20页。——译者

② 疑为1902年。——译者

③ 列宁：《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2页。——译者

④ 同上书，第362—364页。——译者

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

我們之所以說資本主义的垮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都是历史上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那是指:产生这种情况的客观条件,必将存在,工人阶级,或广而言之,劳动人民,必将找到道路,必定会决定获胜的手段,必定会创造必要的主观因素。

这是不以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們的唯一“作用”是企图妨碍、延緩和阻止主观因素的行动和革命的行动。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6月)一文中指出:

“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沒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

“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这种主观变化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①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切行动,沒有不是根据实现我們最終目的的需要来决定的。即工人阶级进行斗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

我們与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修正主义者所追随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社会资本主义的立場。

2. 作为工人阶级先鋒队的 政党是否必要?

我們已經看到,政治局不仅拒絕把社会主义的胜利与实现当作党的行动的最終目的(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級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見《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9—190頁。——譯者

阶段)，而且否认应该如此。

在另一个文件中，我們也已說明，党章修改草案的作法也一样。

从这个立場出发，政治局仅仅給党指定：发生有益的作用而不是必不可少的作用。

中央委员会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取消了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观念。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一个現存政权，如果你不去推它，它絕不会自己倒下去。革命的胜利也絕不会自己到来，而应该去准备和爭取。

而且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能够保证这个条件。

工人阶级要想采取**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行动，那么，就**必需**和**必不可少**地要有自己的政党，这个政党应该是有觉悟的、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够率领并领导群众的先锋队。

3. 通过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

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写道：

“走向社会主义要求实现一系列的结构改革，它将造成民主的扩大，标志着从资本主义社会轉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的几个阶段。”

伯內尔在1961年12月16—17日全国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說道：“爭取结构改革的斗争就是我們这个时代在国内进行的斗争。”

所有这些改革，都“将使比利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跨进一大步”（提綱草案第三十九条）。

“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開展的爭取當前權利要求的鬥爭，產生着新的權利要求。它日益清楚地顯示出，必須實現旨在監督、限制和（如有可能）粉碎壟斷資本政權並給予（？）勞動群眾以實權地位的深刻的結構改革。”（提綱草案第四十一條）

“應該通過擴大民主來使當前的政治結構適應新的需要，以使群眾更直接地參與制定所有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問題的決定。”（提綱草案第四十三條）

“勞動人民日益清楚地看到，他們自己以及國家利益迫切要求進行的深刻改革，將破壞壟斷資本政權的基礎，將擴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將成為走向社會主義的重要階段的標志。”（提綱草案第二十條）

在題為《人民群眾的新要求》一節中，提綱草案第十九條寫道：

勞動人民“要求過問經濟生活和公眾事務的管理”。

我們則認為，工人階級的根本願望是取得政治權力並行使這種權力。

所有這些修正主義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一點，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①

“無論從革命這一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里轉到另一個階級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標志。”^②

① 列寧：《論兩個政權》，見《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頁。——譯者

② 列寧：《論策略書》，見《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頁。——譯者

我們已經看到，事實上修正主義者已經拋棄了社會主義這一最終目的。

他們的奮鬥目標越縮越小而變成了，

勞動者要“過問經濟生活和公眾事務的管理”這樣一個卑躬屈膝的要求。

除了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進行改革並保持資產階級民主外，他們不願指出任何其他的遠景。他們力圖使勞動者產生幻想，說甚么一定數量的改革將保證逐步“從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不但不提出政權這個根本問題，而且硬說有可能，

“給予(?)勞動群眾以實權地位，監督、限制和(如有可能)粉碎壟斷資本權力”，並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利用資本主義的國家——即壟斷資本的國家本身！——作為行使這一“實權”的工具！

他們不但不提出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一長遠目標，反而希望“適應當前的政治結構”。

他們並想以此來“遷就”資本主義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修修補補”辯解。

在修正主義者看來，爭取當前物質上和政治上的權利要求鬥爭和爭取改革的鬥爭，客觀上就是實現“走向社會主義”。

我們在第三部分已經看到，修正主義的邏輯已經使他們削弱、甚至拋棄了真正進行任何爭取權利要求、爭取民主自由、爭取有利於勞動者的改革的鬥爭。

修正主義把工人階級在行動中樹立起自己的領導作用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聯盟的觀點，變成了使工人階級附屬於它的可能的(甚至自稱的)同盟軍的觀點。

修正主義借口“講究成效”，提出了一些甚至能為關心“社會

安宁”的階級敌人所接受的“目标”。

旧根結底，修正主义高估了資本主义力量，而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修正主义在實踐中为了不顾事实地替自己的观点辯解，在策略上“不得不”墮入主观主义，散布一些涣散斗志的幻想，把恶劣的妥协說成是胜利。

他們的思想反映了小資产階級思想的不稳定性，在實踐中，他們时而低估、时而高估資本主义的力量，以致会做出冒險主义的行动。

修正主义者把他們的“走向社会主义”說成是“有效的”、合理的可靠的道路，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改良資本主义的观点。

修正主义者提出这种观点来和“急性人”（即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所謂“罗曼蒂克”观点相对立。他們誣蔑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宗派主义者”、“左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指責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主要危險”。

他們对最凶恶的敌人非常諒解（“应加强肯尼迪所处的地位”），对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上的同志和党却滿怀怨恨。

*
* *
*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既然是革命者，就能够始終不險地站在爭取当前权利要求、爭取民主自由、爭取有利于劳动者的改革的最前列。

这一斗争是我們日常必需进行的活动，因为它可以提高无产階級的階級觉悟，可以在行动中結成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联盟，可以使得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們的真正出路，夺取政权是必不可少的，总之能使无产階級（他

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因素)做好准备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們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在每个国家中夺取政权。

我們认为: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①

4. 国家是否为阶级的国家?

在1961年12月伯内尔向全国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我們可以讀到如下段落。

“希望看到国家在经济动向(事实上经济是由国家資助的)方面显出能起到有益作用的要求正在高涨,这是很正常的。全国进行斗争以便使这个国家发生民主变化并在自己的創議中反映比利时人的要求和全国利益,这也是很正常的。”

什么比利时人? 什么国家? 国内的什么利益?

提綱草案第五十三条批評了修正主义的国家观点,說修正主义者认为国家:“超然于阶级冲突之外。”

实际上,修正主义者否认国家有阶级性。中央委员会在下述段落中剛好拾起了修正主义的理論作为自己的东西:

“这些(修正主义的!)錯誤观点……妨碍进行改变国家内部力量对比的任何行动,妨碍进行改变政权結構并将此結構变成监督壟断資本和削減它們权力的手段的任何行动……。

“这就要求群众不断对国家及国家机构施加压力。国家机构本身无力抵抗壟断資本,无力掙脫壟断資本对它施加的控制。”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見《列宁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9頁。——譯者

根据这种說法，如果說这不是把国家看成是不幸地受到了壟断資本的压力，因此應該以群众的“压力”把壟断資本的压力抵消的一种超階級的“中立”国家論，又是什么呢？

老实說，我国的修正主义者还稍微“改进”了修正主义的傳統观点呢！傳統观点主張，劳动者可以占据国家机器，用它作为劳动者自己的政权机构。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則认为，應該予以改变的是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

改良主义者曾經用“通过选票”来夺取政权的烏托邦远景来欺騙工人階級。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就更加溫和了：“只要与多数派的代表进行接触和攀談”以及派其他請願团到議員那里去，就能实现“改变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专政的工具，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統治整个社会的工具，而这个統治是直接依靠暴力的。

在我国，現今的国家是資產階級的国家，是資產階級对全民专政的工具。哪怕这个专政是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内行使的。

工人階級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打碎这个国家机器。

提綱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条第一段的提法就与最明显的现实绝对相反，但它是我国修正主义者“理論”的必不可少的基石。

“目前时期的特点是，国际上和每个国家的社会結構和上层建筑都在发生着迅速和广泛的根本变化。”

什么叫做“国际上社会結構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变化呢”？

这种变化只能在統一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显然这里談不上这个問題）——的世界内发生，或者只能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已“一体化”的世界里发生，而这“一

体化”的观点正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我国的修正主义者所珍视的观点，我們已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第12节揭露过了。

那么，每个国家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正在发生的（迅速而广泛的！）“根本变化”变在哪里呢？

“结构的根本变化”应该指生产关系的变化，如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剥削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根本变化应指国家的阶级性的变化。

但是，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阿登纳德国、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家中，这些“根本变化”在哪里呢？

提綱草案的出发点完全是建立在騙人的鬼話上面的。

*
* *
*

工人阶级是願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但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显然，只有当人民时刻准备回击资产阶级的暴力时，才有这个可能。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当主客观条件都已齐备时，却向无产阶级宣揚不要通过非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显然，这只能是投降和叛变。

我国修正主义分子又是怎样說法的呢？

大約一年以前，皮埃尔·儒瓦就曾說过这样的話：

“以这种方式（即采用和平方式）来实现这个过渡是大有良机的。”

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看来，今天的問題仅仅在于“比利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現在讓我們来看看事实。

——当比利时劳动人民起来反对利奥波尔三世再度登基时，镇压机器是殘酷无情的，造成五名死亡。

——当劳动者进行反伊斯更斯的“单一法”的斗争时，死四人。

——当一年前巴黎劳动人民举行和平示威反对法西斯危险时，死八名。

——当米兰青年发出和平呼吁，声援古巴时，死一名。

——当意大利劳动人民过去起来和平地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和塔姆希罗尼政府时，街头死了好些人。

这里所谈的还仅仅是我国和我们的邻国而已。况且所有这些行动，所有这些斗争，都不是直接针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特权的。

再如比利时的宪兵费用，在有社会党参加的政府下西，逐年增加，镇压手段得到了加强。这个政府竟敢提出“反罢工法案”来武装政府，反对劳动人民。

给工人阶级造成歌舞升平的假象，感到“本国的结构和上层建筑”正在和平地（而且只能是和平地）发生着根本变化，这岂不是麻痹工人阶级，从思想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吗？

*
*
*

5. 修正主义者的“民主”手法

政治局的“民主观念”的含义，已经在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党章修改草案中有所透露。政治局的“民主观念”是官僚集中制的观念，这个党中，讨论只能在“同辈”间进行，与下级讨论会“有失身份”（貝倫用的词句，见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一号文件）。

这些都是比利时社会党最坏的右派分子的观点。

我們通过几个例子來說明一下政治局的作法。

* *

1962年初，在党内和党刊上开辟了一个《論壇》。中央委员会的決議称，开辟这个《論壇》意在：

“努力估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更新因素”……

“总结我党为了使比利时工人运动更加有效而在党的政治和民主职能方面进行的改革。”

伯内尔在1962年1月19日的《紅旗报》上进一步指出：

“目前国际上正在广泛地进行着交锋。我們应该懂得它的意义并作出评价，以便比共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格里巴同志于1962年1月21日給《論壇》寄去了自己的文章。政治局决定在2月22日的《紅旗报》上予以发表。政治局并在这篇文章之前冠上一頂“帽子”，指責格里巴同志：

“从文章一开始就歪曲了中央委员会決議的精神”。

这个論断使人联想到有位校官在視察时問新兵“湯是否好喝”的典故。有位倒霉的軍人倒霉地答了一句“湯很难喝”。这位校官暴跳如雷地說：“沒問你湯是不是难喝，是問你湯是不是好喝。”

格里巴同志文章的后面，紧跟着政治局的所謂“意見书”（都在同一天报纸上）。在“意見书”中，政治局“深入”并扩充了恰恰是格里巴同志所批判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此外，这份“意見书”还誣蔑格里巴同志“断章取义，悍然不顾这些引证的上下文”。

然而，任何細心的讀者都会看到，正是政治局刪、增和歪曲了格里巴同志的文章。尤其是，政治局的文章竟然篡改了格里巴同志引证过的让·布魯姆的一篇文章的原文，以便指責格里

巴采取了篡改的手法！（參閱《在剛果的比利时人》一章）

在这篇“意見书”中，政治局对一个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展开了无耻的、恶意的、誣蔑性的攻击。

政治局以为在这篇文章里應該試圖詆毀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結果，政治局自己反倒弄得声名狼藉了。我們将来还要談到这个問題。

几天之后，格里巴同志寄去了对“意見书”的答复。众所周知，政治局沒有予以发表。

政治局可以允許自己在党刊上誣蔑党的一位同志，后者却沒有回答的权利！

許多同志寄去文章批評党的领导机构。这些文章同样也沒有被发表。

党刊上开辟的《論壇》很快就結束了，因为党的基层很可能通过真正的政治討論而摸清真相。

政治局仅仅要使人們相信格里巴同志的意見是孤立的、个别的意見。

过了几周，格里巴同志被撤消了中央委員的职务。

* * *

1962年11月6日，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通过了两项決議（我們前已提到），这是声援社会主义古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決議。这两項決議都遭到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攻击。地区委员会执行局决定把这些決議寄給党刊。

《紅旗报》未予发表！11月17—18日的中央全会还譴責这两項決議“違背党的路綫”！

格里巴同志当时被置于两种境地：其一，必需不贊同“这些作法”——即把这两項声援性決議寄給党刊——，其二，除在

“同輩”間（即在中央委員會）維護自己的觀點外，不得在黨內維護自己觀點。

格里巴同志拒絕接受這兩項要求，因為第一個要求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違反八十個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和我黨代表大會的決議；第二個要求違反黨內的列寧主義準則，違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格里巴同志在拒絕這兩項要求後被開除了中央委員會。

*
* * *

這些事件過後，政治局利用黨的常設機構，組織了對布魯塞爾地區委員會真正的暴力鎮壓。

- 違反常規，不得舉行幹部會議；
- 不准召集地區委員會執行局；
- 越過地區委員會行事；
- 把討論分散到每半个月召開一次的區委會議；
- 這些會議的當然報告人系——根據“官僚集中制”的準則——堅定不移地贊同中央委員會決議的中央委員。

大概這些還嫌不夠，於是決定，凡不同意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地區委員，除在自己所在的基層組織維護自己觀點外，禁止到地區委員會所屬各黨委會去維護自己的觀點。

*
* * *

這條絕對違反民主的“準則”在今天討論籌備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文件草案的時候還在貫徹執行中。

中委和地區委員**必須起來維護**的“路線”就是“**草案**”的路線。

這樣一來，在代表大會之前，“草案”就已成了“路線”了。

因此，目前，地區委員或中委被禁止去維護仍然有效的現行

党章，禁止他們去維護我們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決定的路線！

*
* *
*

1963年1月15日于克勒市委大會決定將一個修改黨章的反草案及其說明通告地區委員會的各市委會、布魯塞爾地區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

格里巴同志和蘭多爾夫同志，由於沒有反對這一決定，並且表示贊同，因而遭到了地區委員會的斥責。

2月6日，于克勒市委以三十五票對二票，兩票棄權，通過一項決議，駁回了這個斥責。我們從決議中摘引下面兩個看法：

“此外認為，尤其在地區代表大會和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期間，黨員、特別是同一地區委員會的黨員，均有权獲悉足以闡明目前在地區委員會內部展開的關於重大問題的討論的一切情況……

“認為，于克勒市委正是履行了與黨員的這項權利完全吻合的義務；……

“認為，事實上，這個斥責是針對所有通過此項遭到批評的決議的同志。其真正目的在於與那個古怪的第一號決議（這項決議“譴責”並“拒絕”了于克勒市委的建議。本市委大會拒絕考慮此決議）一起對目前進行的討論及其前景施加不能容許的、令人遺憾的壓力。”

按照黨章的規定，地區委員會必須重新考慮它原來的幾項決定。但是，地區委員會的多數斷然堅持了這個斥責，重犯了它在對待把黨的一項文件寄往黨的某些組織一事上所持的那種中世紀蒙昧主義的態度。

*
* *
*

這就是修正主義者的“作法”，在這方面，他們同比利時社會

党右派比起来是毫无逊色的。

6. 是“后退”了，还是从十一大到十四大

政治局的所謂“意見书”（1962年2月22日《紅旗报》指控格里巴同志想“后退”，想“退到十年以前的論点”。

今天这样可笑地指責格里巴的政治局委員，差不多只有一名例外，几乎都是十年前或更早一些时候一再犯党所譴責的那些錯誤的人。記得在1954年維耳沃尔德代表大会前举行的布魯塞尔地区代表大会上，伯內尔以党的領導机构的名义宣布，停止德洛涅同志党籍，听候开除，因为他維護了在几周以后被通过的論点。

維耳沃尔德代表大会表示反对政治局的政治立場和它的官僚集中制方法，反对中央委员会对这个政治局采取的包庇态度。

当时格里巴同志已不是中央委員，他在1951年代表大会上被排除出了中央委员会，因为他当时維護了后来在1954年維耳沃尔德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場。

我們来回顾一下其中的两个重要立場，它們正好說明政治局今天所抱的态度：

“通过这些例子，我們就能确定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质。解放后，我們在忽視工人問題和忽視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明显的机会主义錯誤。

“后来，这些錯誤在左傾詞句的掩盖下，一犯再犯，实际上导致了近几年的宗派主义立場。”

（比利时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綱第三十二条）

“这种錯誤的民主集中制观念曾存在于整个中央委员会中。中央委员会犯了这样的錯誤：它忘記了集体領導原則要求人人

对党負起个人責任。”

(同上,第三十六條)

“为使基层的批評得以壮大发展,应鼓励并促进之。应使每个提出健康批評的人确信:他决不会因提出批評而受到責备,而是他的批評会受到欢迎,他所揭发的缺点和錯誤将实际上得到糾正。此外,党的領導也应作出批評的榜样,进行这种批評的訓練。”

(同上,第三十七條)

对于 1954 年以前所犯錯誤共同負有責任的人,犯下了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的人,曾在党内实行或容忍独断独行与命令主义的人,于維耳沃尔德代表大会前不久,甚至在維耳沃尔德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拥护維耳沃尔德方針的姿态。

当时这批人还不过是潜在的修正主义分子,但是,在維耳沃尔德之后,他們也沒有对左傾机会主义的残余真正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向党敲起了警钟,警告党謹防政治局的危險的投降的傾向。

但当时大部分党员认为这只不过是暫时的、偶然的錯誤。然而,任何自我批評都沒作。1958 年 4 月 22 日的《紅旗报》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这个現代修正主义的大作)“无疑包含着一些丰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政治局从未对这个論断做过任何說明。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政治局正日益公开地采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观点。

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綱草案”中出現了一些修正主义的現点和提法。代表大会对此进行了糾正。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政治局更日益公开和系統地发展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立場观点。

政治局現在談到退回到十年前去，事實是政治局退回到五十年前，退回到已被歷史所唾棄的修正主義理論中去了。

7. 政治局與威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團結的危險

現在大家都知道，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存在着深刻分歧。

目前，把這些分歧簡單地看成為“主觀因素”，就是說只是由於對局勢估價的不同而產生的，那將是錯誤的。

實際上，這些分歧觸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綫的內容本身，它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究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修正主義？

分歧還涉及兄弟黨之間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关系問題。

我們不想在這裡談到這些問題的所有方面，也不想談到導致目前局面的發展過程的所有因素。

在這場辯論中表示態度的各國共產黨——目前，大部分都公開表示了態度——公开发表了許多重要文件，我們的同志們應該極為仔細地加以研究。因此，一般講來，我們希望同志們自己通過研究這些文件來了解各方面的立場。

*
• •

人們都還記得，早在1956年，多承美國國務院的“一片苦心”，各兄弟黨和公眾輿論得悉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

上述“做法”的後果，是在所有共產黨中引起了一陣很大的

混乱。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报告的内容本身并没有正确的分析，特别是对于波兰在1956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和同年匈牙利的反革命阴谋，都起着极为消极的作用。

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屡次被置于一些公开肯定的政治立场的既成事实面前，而这些立场却是损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损害1957年共同宣言的，损害1960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的。

有些党的领导竟企图把这种单方面的意见和决定看作对全体共产党人都有约束力。照他们看起来，这些东西应该作为大家的法律，并且置于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一致通过的宣言和声明之上。

这些做法违背了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权利平等的原则，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坛上，未被邀请出席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遭到了许多党领导人的公开、片面的攻击（当时我党未参与攻击）。

一个代表大会的讲坛被用来斗争另一个兄弟党，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这种攻击的诬蔑性，今天看得更清楚了。

他们攻击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了所谓的“破坏”。然而，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实际上，他们所攻击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政治立场，尽管他们没有提到这点。

此外，还有某些指控涉及 1959 年以前好几年的事情。1959 年正好是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的那年，苏共代表团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机构签署了一项共同声明，赞扬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的正确政策。

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的讲坛上竟然說：

“看来，他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指望用这种方法来准备条件，以便博得享受帝国主义者施舍的权利。帝国主义者随时准备給那些分裂共产党人队伍的人支付三十枚銀币。”

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

反之，参加巴尔干条約的南斯拉夫(其他两个成員国均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却接受了大量的美援(总数达一千五百亿以上的比利时法郎)和美国軍事装备。但是，铁托却在 1962 年 12 月最高苏維埃的讲坛上享受到了莫大的荣誉。

尤其显得毫无道理的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本身进行的攻击是来自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現正直接遭受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設在意大利的火箭发射台和所有武装力量的威胁。

意共领导人与其詆毀一个直接受到来自意大利国土上的威胁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便利于帝国主义的骯髒勾当，倒不如把自己的这股勁头用来动员意大利劳动者反对这些侵略基地。

*
* * *

后来，又愈来愈多地发生了对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許多兄弟党的攻击。

*
* * *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起初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些国家关系上的措施：片面中断了成百的貿易协定；召回技術人員；放棄了发罗拉（在阿尔巴尼亚境內）基地；事实上断絕了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等等。

这种态度竟发展到与帝国主义者一道，向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尼赫魯的印度提供軍用物資！

*
* *
*

目前，造成这种极端危险的局势的人，一面要求停止他們自己所挑起的这场公开論战，一面却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繼續进行攻击。

也就是說，有些同志應該繼續听凭虐待和誣蔑而不能为自己辯护。

*
* *
*

关于分歧的政治內容，可以概括如下：要么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結起来，因而必須遵守 1957 年和 1960 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声明；要么陷入修正主义。

某些共产党（包括我們党在內）的领导人，对于受到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1960 年 11 月）严厉譴責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持的态度是很突出的。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絲毫沒有改变自己的立場，他們公开地这样宣称。

但是，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今天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看成是一些曾經犯了一些錯誤，但目前正在糾正錯誤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与事实恰恰相反。

正是兄弟党的这些领导人在向铁托的立場看齐。

我們則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完全同意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關於這個問題的提法：

“各國共產黨一致譴責國際機會主義的南斯拉夫變種——現代修正主義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布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用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綱領同1957年宣言相對抗，把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立起來，使自己的國家脫離了社會主義陣營，使它依賴美國帝國主義者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的所謂‘援助’，從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鬥爭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險。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進行着反對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破壞工作。他們以非集團政策為借口，進行着有害於一切愛好和平力量 and 國家的團結的活動。進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領導人，為了使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反列寧主義思想的影响而積極鬥爭，仍然是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一項必要任務。”

*
* *
*

我們黨的領導很不光彩地成了首先公開造謠誣蔑中國共產黨中的一個。

在此以前，黨的領導對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只是提供了經歪曲和篡改的情況。

1961年12月7日讓·布魯姆開始在《紅旗報》上對中國同志公開提出“批評”。

1962年1月間讓·特爾夫以其特有的筆調發起了進攻。

1962年2月22日政治局的所謂“意見書”竟達到了毫無根據的謾罵、誹謗和誣蔑的少見的程度。

“人們（即中国同志）全盘否定了批判个人迷信的重要性和有益性。”（政治局文件）

在 1956 年和 1957 年中国共产党曾发表了两个文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这两个文件是至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这个问题（“个人迷信”）所作出的最好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

“有人攻击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可能的和有益的論点。”

由此而“邏輯地得出”这种理論：

“‘局部战争’对世界和平，必然是无害的，沒有危险的。”（政治局文件）

这种毫无根据的謠言实际上是在冒着天下之大不韙，誣蔑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好战”。这个国家尽管經常不断地遭受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却依然每一天都证明着它的和平意志。

我們早已习惯于我們敌人的这些誣蔑了。

不幸，我們現在看到，某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却在支持帝国主义进行的反共心理战。

中国同志的所有文件和声明都批駁了这些誣蔑。

中国同志的实际行动，正是真正始終不渝地为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而斗争的表率。

政治局文件指責有人：

——要求“不断地、毫无限度地进行派別活动的权利”。

——“反对党与党之間兄弟平等的原則，死抱住‘领导党’的錯誤观点不放。”

进行派別活动？这是修正主义者和右派对于那些不願在他們的打击下屈服的人常常提出的指控。

提出这类指控的人，都是那些不願进行真誠的討論、企图对党员封鎖消息、害怕真理的人。

“党与党之間的兄弟平等”嗎？修正主义者所实行的兄弟平等到底怎样呢？政治局“意見书”的草拟人已树立了榜样。

中国同志在国际声援方面做出了巨大牺牲，足以表明他們是在貫徹党与党之間的兄弟平等。

几年来，他們受到了其他党领导机构所发动的真正的、有組織的圍攻，但他們所表現的耐性和观点的寬闊，足以表明他們多么关切共产党人的兄弟友誼，多么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而其他党的所作所为則恰恰相反。

“领导党的观点”嗎？真是賊喊“捉賊”！

攻击中国同志的那些党的领导人表明，他們事实上的跟隨主义已經达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

政治局文件称：“有人对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意义提出了異議。”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斗争和行动都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榜样。否則，中国共产党人怎能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呢？

我們倒是始終在等待着修正主义味儿的“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意义”呢！

政治局文件談到有人：

“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及其先鋒政党——共产党……的深深不信任，把这些党看作純粹是輔助力量……从而导致反馬克思主义的‘輸出革命’的观点。”

“輸出革命”？这一向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革命运动的无耻誹謗。修正主义者却把它重新拾起来加以發揮！

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可耻誹謗的基础上輸出反革命的。

这就是警察进行迫害的“口实”。

妨碍帝国主义者及与帝国主义者站在一起的修正主义者的，正是革命者活跃的道义援助，他们决不允許反革命的輸出。他們支持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运动和斗争。

中国同志称：

“我們一直认为，革命是每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我們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某一个国家人民的解放，要依靠自己国内人民的觉悟，自己国内革命成熟的条件。革命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誰也不能不許別国人民进行革命，也不能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去制造別国的革命。”^①

政治局的无稽攻击是不可原谅的。

*
* *
*

在提綱草案第三部分里，中央委员会恬不知耻地歪曲了坚守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的党和同志們的主張。

中央委员会照抄修正主义分子对这些党和同志們进行的攻击。

提綱草案第五部分談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用什么詞句来談的呢？

提綱草案再次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誹謗。

这两个兄弟党被指控为反对 1957 年和 1960 年国际會議的宣言和声明。

正是在政治局的所謂“意見书”（1962 年 2 月 22 日）里攻击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那些人，发出了这个新的誣

^① 《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0 頁。——譯者

蔑。然而，这个声明，是經我們的代表所簽署的，是我們的中央委员会所一致贊同的。

在我們所提起的那篇文章中，政治局泄露了自己对这份声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所抱的真正态度。实际上，政治局把它看作一張廢紙；把它看作，

“一个如此四平八穩的声明……这样就可能使人依据这个声明来为闡述、維護和执行有时是完全相反的、或者往往是具有极大分歧的政治論点作辯解。”

政治局还进一步指出，

“声明的普遍价值遭到了損害。”

*
*
*

今天政治局的路綫，公然就是受到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所譴責的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路綫。

政治局的日益明显的修正主义态度受到了其他共产党領導中反馬克思列宁主义潮流的鼓励和支持。

我們正在为击败我們党內的修正主义和为实现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党的真正团結而斗争。

我們欢迎并支持一切旨在反对修正主义潮流的具体倡議和态度，因为修正主义潮流制造分裂，而分裂活动使得企图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者心花怒放。

我們欢迎并支持一切有助于維護并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的团結（即馬克思列宁主义团結）的具体倡議和态度。

我們认为，只有在执行 1957 年和 1960 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結起来，我們才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使帝国主义者的期望破产，从而滿足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期望。

*
* *
*

最后，我們向黨員发出一个号召。

我們业已指出，政治局在所有根本問題上都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极为严重的局势使先进的劳动者——共产党人——感到痛心。

政治局所抱的态度严重地損害了我們的党，从而严重地損害了我国整个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

約瑟夫·雅克莫特和儒利安·拉奧的党的共产党人，一定会勇敢地面对当前的考驗的。击败我們党內的修正主义并赋予我党以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的斗争，无疑是艰苦的。

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排除一切困难而取得胜利。

約瑟夫·雅克莫特曾經說过：

“必須作出抉择，是完全与有产者站在一起，还是完全与被剝削者站在一起。”

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963年 8 月 1 日完稿)

第二部分

社会革命党, 还是社会 改良民主党?

关于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
代表大会)党章修改草案

1963年1月份的《紅旗報》上公布了中央委員會提出的比利时共产党党章修改草案。文件的开头是全国書記雷納·貝倫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

这是中央委員會为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的第一个文件。

手法是很巧妙的。的确，正如讀者将会看到的那样，新的第一条是新改良主义的真正原則声明。党的領導机构的修正主义者希望，这个总綱領会获得全党的贊同。这样，他們过去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就可能在“理論”上得到掩护。而他們的修正主义論点这时也就成了对新党章的具体执行。

繼續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的同志和組織被指控为“反党”。

此外，其它各条的修改表明了蓄意要使窃据領導机构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党的活动方面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取得“合法化”。

一、一个修正主义的总綱領

我們把中央委員會为准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而通过的党章第一条的新提法全文刊载如下：

“比利时共产党是劳动人民有組織的、战斗的联盟，他們承认，必須把消灭資本主义社会，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作为保证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物质与精神幸福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比利时共产党要求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城乡的人民群众联合在工人阶级周围，向着这些目标前进，并实现它们。

“比利时共产党在它整个的活动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吸取比利时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教训和经验。它在此基础上，根据比利时国内和国际上斗争发展的条件，制订它的政策，并正确执行之。

“比利时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组成因素。它正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贡献。它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它为保证人类能得到他们所渴望的一切方面的幸福而进行经常的斗争，由于生产力的急剧发展和科学、技术方面进步的规模，这种幸福的可能性是特别大的。

“在争取人类幸福的斗争中，维护和平的斗争是比利时共产党的中心目标。维护和平是走向进步的条件。

“维护和平，争取和平共处和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斗争，同大垄断组织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活动相抵触。

“走向社会主义要通过监督与缩小大垄断组织的权力的斗争。它要求实现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这类结构性改革将构成民主的扩大，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些阶段。

“比利时共产党认为，联合受垄断组织势力威胁的整个力量，组成一个反垄断阵线的条件是存在的。它把致力于这个阵线的组成看作是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准备同其它进步的政党与组织结成持久的联盟，联盟的目标是：通过实现限制与监督垄断组织权力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扩大民主自由和民主权力，以保卫和平，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条件。”

二、是社会革命党，还是社会改良民主党？

(对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条的批判)

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新党章修改草案的第一点批判，也是最根本的批判，是关于第一条的政治内容。

同原来的条文相比，新的第一条取消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概念。

它还取消了“比利时共产党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的步骤——作为自己的目标”。

把党规定为“劳动人民有组织的、战斗的联盟，他们承认，必须把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而不是把它规定为工人阶级为实现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所必需的先锋队。党章一开头就否认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

第一条拟作为一个原则性的声明。然而它却对一个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一字不提。

这当然有它的原因。新的第一条写道，

“走向社会主义要通过监督与缩小大垄断组织的权力的斗争。它要求实现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这类结构性改革将构成民主的扩大，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些阶段。”

这个说法在第一条的末尾再次谈到了，并且谈得更加清楚：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比利时共产党)准备同其它进步的政党与组织结成持久的联盟，联盟的目标是：通过实现限制与监督垄断组织权力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扩大民主自由和民主权力，以保卫和平，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条件。”

这样，被塞入党章中的不是社会革命党的概念，而是社会改良民主党的概念。

党章的說明报告证实这个方針。

因此，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新的第一条是不能接受的。

领导机构要党拋棄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拋棄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共产主义胜利的最终目标，它想把党的目标引向保卫和平，实现社会改良，放棄引导工人阶级进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夺取政权的坚定、自觉的意志。这样作是要取消党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理論教导我們，而且实践也证明，拋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拋棄彻底的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共产主义，会导致无法再正确有效地进行保卫和平、争取改革的斗争。

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批評意見，我們认为，以党章《緒論》的形式提出一个原則性的宣言，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綱領，同党章第一条中闡明的修正主义“理論”的总綱領对照比較一下是必要的。

三、党章緒論（我們的草案）或者 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党内 团結不可缺少的基础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是今后人类和各民族发展中的一个不堪容忍的障碍。帝国主义——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本性是它自己无法克服的、深重矛盾的基础。

帝国主义本性的基本特征——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经常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是：

- 一小撮财政资本寡头垄断着基本生产手段；
- 千方百计地寻求最高利润；
- 人剥削人，人压迫人；
- 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制；
- 生产无政府状态；
- 发展的不等和不平衡；
- 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 总危机和周期危机；
- 凶恶的军国主义发展成为侵略战争的障地；
- 几乎整个人类生存没有保障；
- 寄生没落和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浪费；
- 精神和道德的堕落；
- 民族压迫，兼并倾向，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 资产阶级国家作用的加强，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的掘墓人

这样，帝国主义一方面创造着自身灭亡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创造着利用这些条件摧毁资本主义、建设新社会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是：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工人阶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力量，以及无产阶级的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所有身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灾难性的不幸后果痛苦的人们，总之，几乎全体人民。

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社会分成阶级的现象。

換句話說，共产主义社会将同时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一切方面与一切形式。人类将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把整个力量用于向自然进行斗争，用于发展和加强人类自身的集体威力。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兄弟般友爱的组合，在这里，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再也不会遇到社会的限制。社会生产将按照一项总的计划自觉地、协调地发展，以便满足社会和社会上的每个成员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的需要。

这个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在实现了对剥削者的剥夺之后——一切生产资料成为整个社会所有，其特征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永远消灭一切战争的社会根源和民族根源。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当个人服从劳动分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消失之后，当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人们不可少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人的多面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了之后，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将滚滚而来，到那时候，真正完全的民主将成为习惯，国家将消亡，社会的大旗将写着：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可避免的胜利

抉择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要么灾难，要么改良了的资本主义，因为不存在可能改良的资本主义。

抉择只能是：要么是带来周期灾难的资本主义，要么进行社会主义解放革命。

总而言之，反对其果是不够的，必須打击其因。

資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两者都是历史必然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人阶级，更广泛地說，劳动人民，将会找到道路，会确定取得胜利的办法。

馬克思列宁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辯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可以开辟必經之路，确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創造为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軍的斗争取得胜利所需的主观条件。

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运动。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观点，根本不是建立在某个世界改革者臆想或发明出来的理想与原則的基础之上的。它們是現存的阶级斗争的現實情况的总的反映。

工人阶级的解放應該是劳动者自己的事业。

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其性质來說，是国际性的；只在形式上，是民族性的。

工人阶级的斗争在思想、經濟和政治两条战綫上进行着。

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斗争的最終目标是建設共产主义社会。

壟断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与表現。国家是一种阶级統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它建立一种“秩序”，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并使之更坚固，以便緩和阶级冲突。

国家施加于劳动群众的巨大压迫——这个国家越来越同强

大的壟斷集團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正日益明顯地表露出來。

資產階級的議會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一種制度，國家的代表機關和選舉原則只是一些裝飾品。在資產階級議會中，人民的意志遭到踐踏。

階級鬥爭的劇烈程度和鬥爭形式，取決於反动派對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麼程度，取決於這些反动派對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這一或那一階段是否使用暴力。

勞動人民希望社會主義革命用和平的方法進行。但是，這種前景只有在人民隨時準備回擊資產階級的暴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用哪一種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現實可能性，由每個國家的具體歷史條件所決定。

建設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是：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無產階級在每個國家奪取政權；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

這就是說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聯合勞動人民的其它階層，也就是說，建立最完全的民主，過去任何民主都不能與之相比擬的民主，這種民主是對勞動人民的，由勞動人民享受，對國內外反革命的企圖則實行鎮壓。

*
* *
*

建立一種新型的國家，即國家—公社，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組成領導階級。

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機關將是執行機關，同時又是立法的機關，是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的意志的代表機關。

在這種情況下，議會——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這是由於議會制的緣故——可能變成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工具，從而改變其內容。

工人階級政權結束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用社會主義經濟代替資本主義經濟，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其結果是，民族徹底解放，社會分成階級的現象消失，從而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政府將從事事務管理和生產活動的領導。

那時候，國家本身將會消亡。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

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而且歷史經驗也表明，工人階級對壟斷資產階級決定性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一個共產黨，即工人階級的充滿戰鬥力的、戰鬥的先鋒隊，把工人階級和人民中最有覺悟的分子組織起來，根據時間和地點的具體與特殊條件，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這個黨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基礎上。

它實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它支持任何一個共產黨人，支持世界上的任何勞動者與人民為人類進步所作的努力。

共產黨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產黨同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支持並參與群眾經常的與當前的鬥爭，爭取和平；反對戰爭危險；爭取恢復、保衛和擴大民主自由；爭取有利益於群眾的、削弱壟斷資產階級，即削弱帝國主義的改革；保衛和加強群眾的勝利果實；爭取勞動者之間相互團結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以便提高人民的覺悟，實現最終目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

各國共產黨保衛整個工人運動和勞動群眾的最高利益，把它放在前頭並使之更臻完備。

通过共产党人这种自觉的活动，同劳动人民其它組織相比起来說，党将实现它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組織最高形式的职能。

为了获得必要的認識和經驗，为了教育并提高群众的觉悟，党必須經常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

共产党及其党员必須实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便克服缺点和錯誤，达到教育自己，教育人民的目的。

共产党注意维护自己的队伍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它在制訂政策时以国家的具体情况作为出发点。

共产党反对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經驗主义或教条主义滲入它的队伍中来；共产党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紧密地結合起来。

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由共同의思想和共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权利平等的。

每个党对工人阶级負責，对本国的劳动人民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負責。每个党是国际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有机組成部分。

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系中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則的具体实践。

比利时共产党

比利时共产党是在 1921 年，由以約瑟夫·雅克莫特为首的先进的劳动人民的联合，在比利时和国际工人运动經驗的基础上，在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的基础上，在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它們曾使比利时工人党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导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分裂——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比利时共产党在劳动人民爭取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保卫和扩大民主自由，驅逐国家的占領者，爭取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爭取劳动人民的权利要求等一系列偉大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

比利时共产党曾經通过下列活动和斗争起了这个作用。它們是：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揭发工人运动中的投降派和改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在无阶级内部的影响，反对自己队伍中的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爭取工人阶级战斗的团结和全体劳动人民行动的联合。

我們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 胜利的时代

我們时代的基本内容，是由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們的时代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制度消灭的时代，是新兴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大大促成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

在苏联，确定了建設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目标。

其它一些国家的人民也正在建設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已經在短期內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有利于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相互支援，相互帮助。

社会主义国家为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而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反革命輸出，坚决反对侵略。社会主义国家同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揭露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卑劣的誹謗，按照他們的說法，共产党人为了推翻資本主义制度，需要国与国之間的战争，需要輸出革命。

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竭力取得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支持并帮助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把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国际斗争的利益，为了推翻世界上一切資本家而忍受最大的牺牲。

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和加强，促使殖民奴役制度崩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战斗力的壮大，造成了新的力量对比，这种力量对比为局部的日常斗争和打倒資本主义的决定性斗争开辟新的可能条件。

战争不是注定的。今天，通过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一切反对战争的国家 and 所有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世界战争是能够防止的。

已經把人类卷入两次战争浩劫的帝国主义是今天另一次更可怕的灾难的威胁。美帝国主义是主要侵略力量和战争力量，是世界上最大的剝削者。西德帝国主义对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正在加重。

帝国主义者之間的矛盾正在增加。比利时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劳动人民的負担加重，損害国家主权，威胁我們的生存。

和平也不是注定的。

为和平而斗争，就是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动员群众，实现最广泛的联盟，反对战争贩子，反对

軍国主义和軍备負担，爭取禁止原子武器。就是強調指出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指出确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和平共处、束縛帝国主义和削弱其手段的可能性；就是有效地声援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就是准备通过群众斗争坚决反击帝国主义者及其同謀者的任何侵略行动。

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殖民奴役制度趋于崩潰，就其历史意义來說，它仅次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对这个运动的国际支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特別重要的責任。

如果团结工人阶级，实現在有效目标基础上的最广泛的联盟，孤立最反动的力量，开展有效行动，把主要打击指向资本主义壟断組織及其政权的話，那么，进行爭取滿足工人阶级和其它阶层的劳动人民当前的政治、經濟要求的斗争的更大可能条件和爭取滿足有利于他們的改革的斗争的更大可能条件同样是存在的。共产党为保卫和扩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对反动派的进攻和一切法西斯化的企图而斗争。

所有这些战线上的斗争都是必要的。它們当中的任何一个斗争都不能单独代替其它斗争，也不能否定其它斗争。它們必須相互支持。

只有通过所有这些斗争，群众才能准备决定性的战斗，才能形成推翻资本主义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

共产党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見解和計劃。在我們时代，党的活动的最終目的也就是比利时的劳动人民所希望的和他們将要作的：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建設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四、民主集中制，还是官僚集中制

我們現在对中央委员会制訂的党章修改草案提出第二点批評。这实际上是关于党的活动的概念。

自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实践越来越表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也追随他的作法）往往用官僚集中制的观点代替民主集中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党的活动的列宁主义准则，甚至党章条文，均遭到了破坏。

领导机构的政治观点同它的組織活动的实践之間是有联系的。如果是工人阶级的組織，特别是共产党的組織的話，那么，当领导机构的政治观点滑向右傾或“左”傾机会主义去的时候，这些观点就必定同阶级斗争的日常实践相抵触，同党的成员的生活經驗相抵触。

在这种矛盾面前，希望維持其錯誤路綫的领导机构，不願作自我批評，以行政的、反民主的和官僚主义的措施，对待党员和党的組織。

这是党在 1945—1954 年期间非常熟悉的现象。一会儿实行右傾机会主义，一会儿又实行“左”傾机会主义的党的领导机构越来越陷入反民主的、甚至专制独裁的行动。

1954 年的維耳沃尔德代表大会开展了譴責当时占优势的“左”傾机会主义和恢复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的斗争，同时也开展了建立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官僚集中制为基础的、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的斗争。

現行的党章就是出自这次代表大会的，它标志这方面的严肃努力。对这个党章的修改，只有在有新的改进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

工人战士們非常了解，在各組織中实行民主的人，不一定是談論民主最多的人。

如果实践是反民主的話，那么，关于民主的談論只能是高談闊論和掩盖事实的烟幕，而不能是別的。

当由于錯誤的观点、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和对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等所引起的危險是领导机关的行为造成的时候，这种危險就特別严重，因为那会給党带来損害。

*
* *
*

雷納·貝倫在他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把他对党的活动的看法作了如下表述：

“关于这点，有必要說明，当各級組織的黨員向下級提出一些以后要經他們所屬組織的最高一級討論的問題时，他們这样作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他們錯了，他們勢必要回到可能已經被他們說服了的同志面前，‘糾正他們提出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誰会否认我們的經常定期的选举制度为黨員提供选举由最好的黨員組成的各級领导机关的可能性呢？因此，当有重要問題要提出的时候，自然要向人們所屬的最高組織提出，因为，只有在那一級，問題才能得到最有效的討論。

“我們认为，在比利时社会党内和其它党内，流行着不同的作法是有它的理由的，因为在这些党内，反对事实上的終身‘教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在我們党里，这些不同作法就沒有理由了。

“只有下述这类领导人才能奉行社会党的那种作法。这类领导人与其說喜欢同他們的‘同級’忠实地进行意見交鋒，不如說他們更喜欢在曾經投票选举他們的同志面前濫用其威信。”

这样，党的同志们对于现在党的领导人的、在关于领导人同党的关系，特别是同党的基层的关系方面的错误的、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这种观点是，在“最高級”作出决定之前，领导人不能向基层提出问题，他们不应该使自己有可能处于在基层面前“纠正他们提出的问题”的境地。可以这样说，由于他们并不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人，所以他们就应当表现成那样。

討論只应该在“同級”之間进行。否則，要是同基层討論的話，这就是“降低身份”。

雷納·貝倫所主張的这样一种态度恰恰是人們自称要譴責的社會民主党领导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一种不容置疑的教条主义更加恶化了；对这一点有谁看不到呢？

这样一种态度导致一个閉塞的领导集团的形成。

与此相反，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但注意来自领导机关对基层的监督和意見，而且还注意来自基层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和意見。

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注意到，制訂、貫徹和檢驗党的路綫不仅是几个领导机关的事情，而且也是全党的事情。它不仅把每个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立場提交“同級”审議，而且也提交全党审議，定期同全党商量，向全党报告实在的情况，因此，党可以在掌握情况下发表意見。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还注意到，基层的創造性活动和批評是要受到鼓励的，而不是受到責难的。

党在行动上的和为了行动的統一与政治团結的条件是：

(1) 党的整个活动和政策都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指导的；

(2) 党的活动是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且是以民主集

中制为基础的。

雷納·貝倫和政治局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先鋒党的实践，同时也反对党的活动的列宁主义准則和民主集中制。

在这种情况下，下述作法是不会令人惊奇的：中央委员会的建議中裝飾一些表面上民主的条文——正如人們在資产階級和社会民主党的組織中經常碰到的那样——然而却小心翼翼地避免規定实行这些条文的方法。这种作法的目的是，使“同級”駕于党的活动准則“之上”。

当一些同志想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准則，使大家，包括領導机构，尊重这些准則的时候，于是便被无中生有地指控为进行“分裂活动”。

政治局似乎有权繼續进行分裂活动，似乎有权不断进行修正主义的横行霸道的活动和对同志进行誹謗；而党，党员及党的組織似乎只有說“同意”的权利。

我們現在从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对党章的一处修改中，举出一个違反党员最起码的权利的、有意义的例子来。过去的党章第五条規定：

“每当对党员作出决定时，党员本人有权以个人身份参加討論。”

在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新的第五条中，这个保证不見了，而代之以：

“有权以个人身份参加任何对其活动和行为提出疑問的討論。”

而参加这种討論也只是：

“在他所在的党組織的大会上，在他所屬的党的机关中，在他定期参加的或定期作为代表出席的會議和代表大会上。”

总之，党章草案“慷慨地”給予党员以参加他所在的組織中的討論的权利。

很清楚，任何他不参加其中的委员会不但可以对他的活动和行为提出怀疑，而且甚至可以在沒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对他作出决定！

修正主义的政治局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談論是很多的，但是，这是为了掩盖官僚集中制的观点，为了掩盖政治局集团活动的完全专制的实践。

我們必須保卫并对劳动人民說明真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原則。所以我們提出党章中的一条条文来（我們建議中的第六条），这一条是：

“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組織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党的活动的具体方式應該尊重这个原則。

“民主集中制要求：

“（1）所有党的領導机关，从下到上，都是选举产生的机关；

“（2）党的各級領導机关必須經常收集党組織和党员的意見，研究他們的經驗，及时帮助他們解決問題；

“（3）党的任何机关必須定期对它所領導的組織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4）任何党的机关必須定期向上級領導机关提出自己的活动报告。

“如果在活动过程中出現了一些需要上級領導机关作出決定的問題，那就必須坚持向上級机关提出来，并要求作出答复；

“（5）各級党的机关实行集体工作，集体領導和个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

“(6) 各級都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地監督党的决定的貫徹执行；

“(7) 上級机关的决定对下級机关和全体黨員帶有强制性；紀律是少数服从多数；

“(8) 遵守第一条和第二、四、五各条的内容。”

(第一条規定共产党的性质；第二条：“誰能当黨員”；第四条：“黨員的义务”；第五条：“黨員的权利”。)

*
* *
*

关于我們的党章草案，政治局硬說，它“表現出了一种以根本不同的方向同中央委员会的草案相对抗的意志，表現出了一种要使另外一条政治路綫胜利的意志”(1963年3月1日《紅旗报》)。

由于政治局如此地攻击我們的《緒論》中已經提过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它事实上承认企图把一条**与这些原則根本对立的路綫**强加于党。

像我們所說的那樣，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党章草案的目的在于要把比利时共产党，由**社会革命党**改造成为一个受官僚集中制和修正主义领导机构专制統治的**社会改良民主党**。

我們过去、現在和将来都为爭取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鋒队的、按照真正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准則从事活动的共产党而斗争。

第三部分

愈来愈深地陷入修正主义

从政治局的暴力行为到它的
制造分裂的阴谋手段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及其后果

一、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手法

現在党的某些活动方式与組織方法是与修正主义的政治內容相适应的，是与作为一个先鋒队的党的列宁主义观点相对立的。

修正主义者对党采取的“战略”如下：篡夺领导机构，从思想上、組織上和战斗性上瓦解党，采取置人于既成事实面前的策略，以便强制实行日益修正主义的政策，最后达到完全专断，以图消灭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干部。

这是历来的改良主义者所慣用的手段。

一个宗派主义领导集团的形成

現今的宗派主义领导集团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54年夏季。当时，絕大多数党的干部都要求終止独断独行，要求恢复民主集中制，要求譴責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这个宗派主义集团却从中破坏，并以此来夸耀。

該集团从来沒有真正想要譴責专断的方法，对于1954年以前所犯的政治錯誤只是輕描淡写地檢討一番。該宗派主义集团的大部分成員，当时都屬於上届领导机构，他們不止一次地与“左”傾机会主义者狼狽为奸，向一貫維護革命立場的同志展开进攻。这就是1954年比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几个月、比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及随后几年的情况。

該集团对党采取两面派手法，掩盖了自己的真正意图。

該集团长期以来秘密地进行着瓦解和消灭党的活动，使党

不成其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这个宗派集团，特別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竟明目張胆地宣揚自己的政策。

既成事实

在修正主义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遵循着同一个策略。某某领导人的一席演說、一篇文章，或者政治局的一份“公报”，竟公然决定着一种政治立場，领导机构就把这种立場当作党的“路綫”，哪怕它与代表大会決議、与前几届中央委员会的決議、与国际決議相对立也在所不計。

事后，中央委员会則要影射地或明确地譴責那些反对用这种方法来“决定”“党的路綫”的人。

那些沒有对这种作法进行反击的中央委員，并不都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同时也應該指出，在领导机构已經公开說明这是全党的路綫以后再来討論，是一种虛假的討論。领导机构最終將把討論引导到运用反民主的“信任案”的故技。

政治局在近年来的所有政治問題上，几乎都采用了修正主义者的打击手法，将中央委员会置于既成事实的面前。

茲列举如下：

- 1956年匈牙利事件，
- 自1957年起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
- 1960年7月剛果事件，
- 誣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
- 百万人大罢工，
- 稅收改革，
- 制定社会綱領，
- 反罢工草案，

- 語言学草案，
- 中印边界冲突，
- “加勒比海危机”，
- 支持肯尼迪和斯巴克。

这种置人于既成事实面前的作法，也是符合蓄意分裂的企图的，因为，政治局在一味发展修正主义主張，千方百计想把修正主义主張强加于人，把那些拒不在他們的专橫行为面前无条件屈服的人說成“反党”分子，說成是“宗派主义者”。

对政治局來說，为了达到修正主义的目的，用最无耻的手段也是在所不惜的。

要么在指揮棒下完全地、无条件地屈从于修正主义教条，要么辞职，这就是政治局想强加于人的东西。

修正主义者害怕政治討論

《紅旗报》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作是“打进核心的破坏分子”，“宗派主义分子”，“破坏党章分子”，“分裂主义者”……，我們不必一一列举了！

老实說，这些形容詞用在政治局身上倒是恰如其分的。

党的領導机构所以提出这一連串的“指控”，是因为他們不敢面对真正的政治辯論。

他們认为，黨員應該是普普通通的执行者。在党内哪怕简单的了解情况也是遭到禁止和应予取締的。八个月来，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連一次介紹情况的會議都沒有召集过。

一名黨員可以看到社会党、資产階級、反动派和法西斯的报刊，但是却禁止他收到和看到其他党委会的政治討論的文件。

我們曾說过这样一句話：“党的組織、机构和黨員應該了解党的活动、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的最全面的情况”，修正主义者

則把这种說法看成是——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与党的合法性决裂”。

政治局极其注意禁止了解情况。根据这些标准而策划的两次《論壇》(1962年1至3月的《論壇》和1963年2至4月为筹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而辟的《論壇》)真是一出滑稽戏。

1963年4月10日《紅旗报》也承认,“委员会(《論壇》的主持者)认为,对于它所收到的某些文章不应予以发表”,也就是說,正是这些文章揭露了修正主义,闡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

即便寥寥地发表几篇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也要伴随着評論、解釋和无耻誹謗。

对于这些东西的答复却未見发表。

1932年罢工以后被工人营救出獄的党的締造者亨利·格利納同志,被政治局的說謊家在报刊上誣陷地加上了“造謠”的罪名,讀者甚至无法知道“造”了甚么“謠”,因为那篇文章是在被檢查后刪去了。

領導机构中修正主义分子的行为好像教士一样,用他們的代表之一勒米·吉利斯的話來說,他們把“政党一制度”視為“宗教”。

他們不仅不让了解我們党的許多同志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而且連某些兄弟党的文件也是橫遭禁止的。

《紅旗报》的讀者始終期望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朝鮮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的文件的确切文本。相反,《紅旗报》讀者所“获得”的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新聞”,来自印度反动資產階級;讀者“有权”得悉的是不附任何評論的铁托的反共报告(見1963年5月20日《紅旗报》)。

《紅旗报》在4月22日列宁誕辰节保持緘默,同时却用大量

篇幅报道若望二十三世的荒誕言論。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遭到排斥，斯巴克的許多言論却受到推崇。

在政治局看来，修正主义就是党的政治“路綫”，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算共产党人。

分裂主义及資产階級民族主义

政治局的分裂勾当不仅表現在对待比利时共产党上，而且也表現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

政治局站在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从而背叛了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尤其是当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要求履行具体的义务时，諸如匈牙利事件、剛果事件、古巴事件和中印边境冲突等，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了。

政治局在国际上进行分裂勾当起于 1961 年底公开对兄弟党进行誣蔑，这种誣蔑至今仍在繼續进行中。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所发展的就不单是資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和平主义立場，而是采取了資产階級民族主义、新殖民主义、与最不体面的反共言論，它事实上反对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虽然它不敢明言，实际上是采取了种族主义。

政治局在 1962 年 2 月 22 日的《紅旗报》上攻击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从而使自己声名狼籍，它否认了过去它曾虛伪地贊同的东西。

政治局就这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了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态度。

黨員的真正党紀在于始終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于将国际无产階級的团結付諸实践，在于遵守并貫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并于必要时，反对

党领导的阴谋活动和倒行逆施行为。

修正主义者的惶恐和“四人”的被开除

在比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三十六小时，德洛涅、格里巴、馬索茲和兰多尔夫等同志才接到通知說，关于开除他們一事已在进行。

这个建議毫无道理可言，而是基于对他們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起訴。

按照党章的規定，根据党正常生活的最起碼的准則，建議开除某人須經各当事人所屬基层組織加以研究，但这一步根本沒有作到，这些組織不知道有这样一桩事情。

修正主义的领导机构賦与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布魯塞尔代表团如下的任务：鉴于他們持“反党章的态度，进行宗派活动以及图謀以同样方法繼續进行这种活动”，乃提請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將他們开除出党。由于党领导机构的阴谋活动，該代表团是由修正主义分子組成的。这个阴谋活动是背着这四位当事人进行的，代表团沒有听取他們的申述。

在安特卫普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这四名遭到“开除”威胁的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党员被禁止进入代表大会会场，反之，资产阶級和社会民主党的記者却接到了邀請。

这四位同志多次請求代表大会听取他們的意見，特別是格里巴同志，他于4月13日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向大会主席团寄去了下面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們：

“我請求你們准許我參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全部討論和大会工作，并将我此項請求自大会开幕时起提交代表大会。

“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的請求是正当的：

“1. 我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員，因此我需要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負責。

“2. 根据現行党章第三十二条的規定，并且按照法定時間，我已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申訴，反对将我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认为，政治局所持的反面意見及党中央委员会似乎也重彈这些反面意見是錯誤的。

“3. 范·吉伊同志在 1963 年 4 月 5 日的《紅旗报》上提出了‘他們是否真想让代表大会听取自己的意見’的問題。

“这个問題特別是針對我提出来的，因此，我請求能使人听到我的意見，借以答复他提出的这个問題。

“4. 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我受到了指名的人身攻击，在《紅旗报》上刊载的許多篇文件和文章中我也受到了指名的人身攻击。在几乎每天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論壇》上更是如此。毫无疑问，代表大会期間也会如此。根据現行党章第五条的規定，我认为有权亲自参加这些討論。

“5. 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在 4 月 11 日晚間的會議上，即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開幕前三十六小时，正式提出开除一事，其他三位同志，莫里斯·德洛涅、莫里斯·馬索茲和雷納·兰多尔夫也同样提出被开除。

“我吁請全国代表大会反对这种作法。

“显然，如果地区委员会請求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开除，是对党章的精神与条文的肆意破坏。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雅克·格里巴(签名)”

下午四时許，格里巴同志再度提出自己的請求。六时半，他接到了如下的一封复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研究了希望你参加代表大会并

在会上发言的請求。主席团决定駁回你的請求。

此致

敬礼

阿·德貢宁克(签名)”

此外，这四位同志还請求主席团向大会代表散发一个概括了他們的立場的文件，也是毫无所获。

面对这一系列蓄意封鎖消息的作法，这四位同志在布魯塞尔的二十余名黨員的帮助下，于4月14日星期日大会代表步出会场时，向他們散发了上述文件。

这也說明，所謂在“大庭广众”之下散发这个文件是个决定性的进攻信号的指控，是多么虛伪，多么荒唐啊！

請看，政治局是怎样出其不意地使代表大会通过“开除”布魯塞尔这四位同志的：

——未听取被告意見，被告甚至沒有正式目睹代表大会上犯下的这个打击罪行；

——被告所屬的基层組織事先未被征求意见，甚至不知此事；

——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开除”中成了初审和終审的机构，沒有上訴的可能，而实际上全国代表大会应是审理对开除提出的申訴的組織；

——破坏了党章所規定的关于开除的期限与手續的条文与精神；按照党章規定，开除須同时經基层組織与地区委員會的同意，否則中央委員會則需在基层組織的一个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定，因为被开除者仍然有权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申訴。

人們很少看到这样层出不穷的不能容許的反党章的作法。不仅这四位同志是这种作法的牺牲品，而且全党都在遭受着在整个工运面前寡廉鮮耻到这种地步的領導机构的专断之苦。

党领导机构的分裂活动与日俱增

布魯塞尔地区的党员們听到这个打击后，反应異常强烈。

該地区的許多組織都认为开除这四位同志是无效的，并紛紛要求举行一次地区特別代表大会。

早在4月30日，这些組織已占地区委员会成員的三分之一，按照党章的規定，地区特別代表大会需于5月份举行，但是，修正主义的领导机构不仅企图向該地区的其他組織掩盖这一要求，而且宣布这一要求是“不能接受的”。

面对这种再度破坏党章的行为，曾經要求举行地区特別代表大会的各組織共推举四十二名代表，于5月10日举行了會議，組成了**地区特別代表大会組織委员会**，通过了一項共同声明。声明要点如下：

“签署人于1963年5月10日在“铁路工人”党委政治書記維利·德·瓦艾勒同志的主持下举行了會議，注意到：地区领导机构（書記处及地区委员会）不顾許多机构的极力請求，竟悍然拒絕。

“1. 考虑上述机构作出的关于安特卫普代表大会采取反对德洛涅、格里巴、馬索茲和兰多尔夫等四名布魯塞尔地区的反党章、反民主的措施的決議。

.....

“此外，签署人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得知，党章規定的召开一次地区特別代表大会的法定人数自**1963年4月30日起**已經达到。本地区贊成召开地区特別代表大会的人数已超过全体的三分之一。

“为弥补地区领导机构在这个問題上的失职，下述签署人茲决定：

“1. 根据党章的要求，自己組成布魯塞尔地区特別代表大会

組織委員會；

“2. 于 1963 年 6 月在布魯塞爾召開上述代表大會，市黨委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者選代表一人，組成各市委的代表團。”

5 月 16 日，在“組織委員會”的主持下，舉行了一次有一百四十二位幹部出席的幹部會議，這是近年來地區委員會舉行的出席人數最多、最熱烈的一次會議。

會議通過了如下決議：

“出席 1963 年 5 月 16 日在莫倫貝克市書記豐斯·莫倫努主持下的幹部會議的一百四十二名幹部，在听取并討論了羅歇·范·根同志代表地區特別代表大會組織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之後，

“發現：此次幹部會議是布魯塞爾地區最近幾年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會議，

“譴責：地區領導機構的失職，六個月來，特別是從 3 月 15 日地區代表大會以來，再也沒有舉行幹部會議或報告會，系統地忽視向本地區黨員提供情況；

“通過：以組織委員會名義所作的報告，

“指出：贊同 1963 年 5 月 10 日贊成召開一次地區特別代表大會的各市委政治書記和市委以及其他組織通過的‘共同聲明’，

“向所有關心黨的團結的共產黨人發出緊急呼喚：呼喚你們堅決行動起來，以求終止黨的機器以及某些屈從于黨的機器的幹部的反黨章的專斷的作法；

“表示絕對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決心貫徹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聲明，決心忠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一百四十二名出席者，除一名棄權、四位同志

未參加表決外，全體一致通過”

目前，領導機構想要求每個組織和每個黨員，無論過去、現

在和将来，都贊同自己的修正主义政策和独断独行的行为。有力地反对修正主义、并重申坚决作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鋒战士的人愈来愈多了。布魯塞尔的絕大多數党的干部都是这样。

在其他地区委员会中，长期以来党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路綫造成的不良景象，随着政治局所执行的“路綫”和作法而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后果，变成了日益增长的不安。

政治局則以层出不穷的分裂主义的专断行为来进行反击。

直到本书付印时，他們所作的上述行为已經有以下多項：

——“撤消”于克勒市委、埃特貝克市委和沙尔貝克市委的市委会和大学生支部，“解除”铁路工人党委政治書記的职务；

——解散布魯塞尔自由大学的干部党委的全体大会；

——“停止”埃特貝克共青团三名青年的团籍“六个月”；

——将圣吉尔市委的十三位同志“排除出党”；

——“拒絕”把共产主义大学生支部的一位書記“看作是黨員”；

——“无視”德罗让博市委会的存在；

——一般說来，以“开除”来威胁一切支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和譴責政治局独断独行措施的人。

正像人們所看到的那样，政治局所吹噓的“更新”，主要表现在发明了一整套新詞汇来修飾自己的分裂措施。

所有这些所謂“制裁”，对于热情开展自己活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黨員和組織來說，都是无效的。受到这种或那种“決議”制裁的同志的人数达到这种地步，以至在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中修正主义分子自己陷于孤立，事实上是自己把自己开除出了地区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在5月20日的《红旗报》上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說：

“中央委员会提請注意：根据党章第二条的規定，比利时共产党自由地接納‘一切接受其綱領、章程和決議的人’，今后凡屬支持开除四人的分裂勾当的人，不能再視為属于共产党。”

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伯內尔、特尔夫、布魯姆集团及其党羽，背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背棄了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党章，奉行着修正主义和专断的作法，并进行威胁說：

“你承认这就是党的綱領和准則嗎？”

“你答应譴責那些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上、站在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立場上为遵守民主集中制而斗争的同志嗎？”

“如果你不答应，你就不能被看作是党员。”

党员們无论現在和将来都会对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个最后通牒給以应有的回答的。这群修正主义者要求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豎起白旗，投降，叛变，自己把手足束縛起来。

修正主义者絕不能在比利时消灭馬克思列宁主义。

*
*
*

政治局所持的态度多么令人想起1920至1921年間，社会民主党人对約瑟夫·雅克莫特及团結在《被剝削者》杂志周围的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人所持的态度啊！

我們还記得約瑟夫·雅克莫特曾代表出席1920年12月11日至12日比利时工人党限制性特別代表大会的一个代表小組所宣讀的如下声明，

“我們过去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活动，始終是以无产階級階級斗争运动的最高利益为依据的，始終是以比利时的社会党的团

結和执行我党的国内、国际根本原則的基础上开展社会革命行动为依据的。

“我們曾不断地为在比利时工人运动内部遵循并将繼續遵循唯一符合无产階級利益的策略而进行斗争，这就是階級斗争，在所有陣地上反对資产階級，不妥协，也不諒解。決議起草委员会多数派提交討論的議案，极其严重地損害了少数派的行动自由。我們认为該項議案使我們无法在比利时工人党内进行社会主义活动。

“我們声明：我們把通过這項議案看作是一項开除措施。我們提請代表大会注意，我們的观点得到了国内无产階級广大群众的支持，尤其是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一致同意作出一項規定，确保社会主义运动左翼享有必要的、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

“只有通过此动議才能使我們完全自由地、正規地繼續在党内进行我們的活动。值此庄严的时刻，我們提請目前支持起草委员会动議的人密切注意他們所承担的沉重責任。

“他們应就此問題作出决定。

“我們方面已尽了一切努力避免分裂，分裂的責任应由他們来承担。”

在当前的情况下，黨員們無論現在或将来都会向修正主义的領導机构及其代表提出下列問題：

——“你們是否答应遵守并貫徹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呢？

——“如果不答应，我們就沒有必要和你們进行討論，共产党內沒有你們的地位。

——“如果答应，那么，为表示你們的誠意，則应正式地、无保留地譴責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譴責政治局，譴責政治局的思想和實踐，譴責它对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各兄弟党进

行的攻击。你們應該宣布，你們开除并采取反党章措施反对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是无效的。

“如果你們拒不这样作，由此而表明你們的两面手法，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对修正主义宗派分子提出的警告，作出回答。”

那时，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会坚决地坚持自己的原则。

他們将一如既往，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开展战斗活动：为目前的权利要求，为維護遭到威胁的民主权利，为保卫和平、反对世界大战危險，为反对以世界主要的侵略和战争力量——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資本帝国主义、剝削者和战争販子，为反对我国的托拉斯、壟断資本和控股公司，为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斗争。

他們将为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主要危險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为爭取遵守和贯彻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为維護并加强我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进行不調和的斗争。

二、比利时社会党右派与政治局 相互支持

我們曾經指出，一段时期以来，这种相互勾結是多么公开、多么为众人所知呀！近来这种勾結又进一步加强了。

1963年3月16日，《人民报》以《左派的錯誤》为题，利用《紅旗报》上刊载的一篇署名让·杜波施的文章来反对社会党左派。《人民报》把让·杜波施看作是新改良主义者，并作如下評論：“当一个共产党人說出真理时，我們就贊同他。”

1963年4月17日，《人民报》以《派系权》为题，夸奖般地引

了一整段伯內尔在比共安特卫普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企图为社会党右派领导机构的立场“辩护”。

1963年5月9日《人民报》的一篇题为《右派和左派》的社论，再次对社会党左翼发起攻击。这篇社论明确地、公然地重申社会党属于“改良社会主义”，反对它所谓的“已经过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并且随即指出：

“俄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十分了解这一点，它为其他国家共产党非常及时地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行动和适用于发达国家的行动作了区别，并且为发达国家发明出走向社会主义的‘各种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党的传统的改良主义者和自命为共产党人的新改良主义者，都利用了苏共二十大的某些方面，并作了同样的解释。

社会党主席列奥·科拉尔，在总题为《改良主义与革命》的三篇文章中（见5月15、16、17三天的《人民报》），重申了传统的改良主义观点。《人民报》上进行的这场论战的重要性恰恰表明：比利时社会党右派面对着劳动群众日益强大的潮流，不得不加强他们维护改良主义思想的斗争。

比共领导机构对此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

比共主席伯內尔在5月29日《红旗报》上的一篇题为《真正的两段论法》的社论中，拒绝在思想意识和“学说上”进行论战，他说：

“……列奥·科拉尔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提出问题。我认为这很可惜……。”

继而又进一步指出：

“两段论法不是在改良主义与革命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总之，伯內尔不反对科拉尔和其他社会党右派的改良主义，

只是对科拉尔所提出的辯解性的論据提出異議，并代之以新改良主义的解决方案。

但是，不幸，对于改良主义說来，其表現沒有比科拉尔的表現更具有說服力了。

伯內尔說：“真正的两段論法如下：要么左派力量（包括天主教劳动者）采取統一行动，要么反动派获胜”。

統一行动的目标是什么？通过什么手段来达到統一行动呢？

按照上述說法，仿佛劳动人民要想取得反对資本主义及資本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战争危險、对民主自由及生活水平的威胁——的真正胜利而搞統一行动，并不需要提出論据来揭露改良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似的。

伯內尔走得更远。伯內尔文章批評的鋒芒指向“社会党左派”，实际上是指向企图从改良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党劳动者。他写道：

“請允許我在这里批評一下社会党左派。实在令人遺憾的是这个左派的許多分子对于开展行动想得不够，而且隱居在學說中，无視統一斗争的必要性。”

科拉尔說过，“討論是劳而无功的”，伯內尔也随声附和。

所有这些誣蔑都无法掩盖真理。

在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傳統改良主义的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劳动者的推动下，已經有效地展开了反对战争危險、反对比利时政府屈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反对“单一法”、反对政府的稅收改革、爭取提高工資待遇、反对反罢工法等斗争。

政治局并不滿足于支持右派反对社会党左翼的运动，而且还想造成最富战斗性的劳动者队伍的分裂。

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路綫” 与实践中的修正主义

目前党内进行的政治斗争使人想起当改良主义在比利时工人党领导机构中居统治地位的时候我国工人运动所经历的那场斗争，这场斗争导致了比利时共产党的诞生。现在进行的这场政治斗争还令人回忆起各国共产党与托派“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搏斗的时代。这些冒险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最后都与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勾结在一起了。

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因此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今天这种现象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两个关键时期一样，修正主义分子都是彼此互相支持的。

弗朗索瓦·皮佑（见1963年4月23日《人道报》）竟干预我们党的事务，公开支持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分裂行动，把我们的行动看作是“无原则的小集团”的活动！

在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中，这个小集团代表着绝大多数干部！

说我们是“无原则”吗？我们的读者自会作出判断的。我们要指出的是，弗朗索瓦·皮佑倒是与比共政治局的修正主义“原则”结合在一起的！

瓦德克·罗歇在1963年5月9日的《人道报》上，再次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公开进攻，因为中国共产党犯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大罪”。瓦德克·罗歇是以曲解《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来开始“阐述”问题的。

要维护修正主义立场，势必要使用不光明磊落的手法。

布鲁塞尔地区委员会修正主义的书记处当然迫不及待地广泛散播了这篇讲话。

修正主义者是否认为可以通过粗暴的阴谋活动和诽谤，就能消灭馬克思列宁主义呢？

同样，他們还妄图消灭阶级斗争哩！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都接受修正主义者的挑战，每次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胜利，变得更加巩固。

关于伯内尔在比利时共产党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这篇演说是关于那些早已熟知的、前面已经揭发了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一篇毫不精采的文章而已。

但我們要指出伯内尔的一个极其无耻的诽谤。他說：

“他們（指党内维护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的同志）还散播反苏的謠言，趁去秋加勒比海这样严重事件的机会，干下了轉移視听的勾当”。

反苏的謠言！真是賊喊“捉賊”。只有在斗争中和行动中才能看出当苏联遭受帝国主义威胁的时候究竟誰是苏联的真正朋友，究竟誰对偉大十月革命的国家表現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們只要追溯一下政治局在 1956 年匈牙利事件时所持的态度！

只要回忆一下政治局在 1960 年 7 月刚果事件和关于在加丹加停火問題上所站的立場，这种立場既違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与苏联的立場相矛盾。

我們在《紅旗报》上愈来愈多地讀到这样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的借口是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批判那些实有其事的或編造出来的过去的錯誤，其实这才是反苏和不折不扣的反共呢。

这絲毫也不能使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感到惊奇，因为修正主义者是要变成反苏反共的。

政治局对阿尔巴尼亚同志和中国同志的攻击，达到了最凶恶的反动派才有的那种疯狂地步。

我們有必要来談談 1963 年 4 月 10 日最后一期《論壇》里面的一段話（既然領導机构未对此文作任何評論，因此可以认为它是“符合政治局的路綫的”）。文中說：

“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将来有一天要控告中国兄弟需对由于原子战争而造成的毁灭和其他的残杀承担共同責任。但是等到这一天来临就迟了，因为我們凭經驗知道，死者是永远不会复生的，也不会再起来高呼报仇的。”

不，不是死者要高呼报仇，而是現在活在世上的共产党人要对策划这篇文章并蓄意支持将它公布出来的那些人——說得輕一点——高呼报仇的。

*
* *
*

我們再来談談伯內尔的第二个誹謗：“趁加勒比海事件的机会干下了轉移視綫的勾当”。

这样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指控，指的是什么呢？

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的同志們組織了一些示威游行，声援古巴，反对美帝挑起的战争危險。

1962 年 11 月 6 日，当美国舰队不断对该島进行軍事封鎖时，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执行局再度发出声援古巴的号召。

以上簡短地介紹了一下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犯的“罪行”。

在伯內尔看来，向社会主义的古巴表示声援就是干下了“明显的轉移視綫的勾当”。

*
* *
*

伯內尔根本无法反駁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的批判，因此

再次誣蔑他們，硬說他們“沒有一個論點，沒有一句口號，沒有一項行動建議”。

修正主義者甚么時候有過一個行之有效的論點、行之有效的口號和行之有效的行動建議呢？修正主義者沒有過，原因很簡單，他們**反對**行動。

反之，伯內爾、特爾夫、布魯姆及追隨他們的人，千方百計地壓制行動建議，壓制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進行的鬥爭。

這本著作恰恰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始終站在行動的最前哨的，這正是與修正主義領導人衝突的基礎。

尤其是，布魯塞爾的同志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幾年來布魯塞爾地區委員會及所屬各黨委所進行的活動正是基於這些同志的建議。這些同志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革命者，值得高興的是，他們是地區委員會幹部真正的多數。

布魯塞爾的同志們還知道：黨領導機構和地區委員會的修正主義者一貫對行動決議和貫徹執行這些決議製造障礙。他們尤其記得，百萬人大罷工再次表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站在鬥爭、組織行動、罷工糾察隊、示威的最前列的，修正主義分子是不到這些地方來的！

*
* *
*

伯內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還採取了明顯地支持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分子的立場。他說：

“我們希望與南斯拉夫同志恢復黨與黨的關係。我們黨對於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基礎上恢復這種關係感到興趣。儘管我們與南斯拉夫同志有某些思想分歧，我們絕不要忘記，他們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趕走了剝削者資本家和地主，工人階級在那里執政，他們正在建設新的南斯拉夫。”

当铁托知道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他一定会首先感到惊奇的！

为便于衡量伯内尔的背棄程度起见，我们来与上述的 1960 年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論断作个比較。声明說：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

再論反罢工草案

議會通过（反罢工）草案后，党的领导机构再次把組織工人行动听命于議會辯論，也就是說，实际上是把組織工人行动听命于等待参議院开始辯論。

中央委员会（見 1963 年 5 月 20 日《紅旗报》）別无良策，只是不切实际地要求“原訂 5 月 28 日举行的参議院的辯論延期举行”，要求“筹备工人和工会會議，并于草案公开討論之日召集工人和工会會議，向参議員提出抗議并决定行动办法”！

在开始討論之日（此次討論历时三天）举行工人會議以便“决定行动办法”，这真是葬送行动的最好办法。

5 月 27 日，让·布魯姆在《紅旗报》上以下面的着实出色的看法作为他的文章的結尾：

“5 月 28 日即原訂参議院开始公开辯論之日，就在明天了！抓紧时间哪！”

这不是廢話嗎？

反动派对民主自由的严重打击，是有社会党参加的政府所通过的。

工人阶级遭受了严重的失敗。但是，只要为进一步斗争而从中記取教訓，哪怕是潰敗也可以迅速地轉为胜利反攻。

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态度再次对涣散工人阶级的战斗意志起了决定的作用。由于我们党领导机构背棄了真正譴責改良主义的实践，拋棄真正組織斗争，因此，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所措，既沒有有組織的先鋒队，也沒有帶路人。反对反罢工法的斗争沒有結束，它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发展起来。如果工人阶级丟掉了修正主义的和議會主义的幻想，就一定会廢除这些法律。

在行将到来的日益尖銳的斗争中，非常需要有一个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鋒队，需要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

党领导机构是否丟掉了自己的綱領？

让·布魯姆在1963年5月25日的《紅旗报》星期刊上宣布“共产党要展开一个寻求新政策的运动”。

这表现出修正主义领导机构的政治混乱。让·布魯姆企图使党员平靜下来，每个党员的“任务”是“銷售《紅旗报》、散发傳单，举着旗子或标語牌，与听众进行討論”。

討論些甚么呢？无疑要（对听众）提出这样的問題，“你是否要对一筹莫展的共产党提出一个‘新政策’呢？”

誠然，让·布魯姆虽不願意这样作，但他的話表明：举行布魯塞尔地区特別代表大会指出了一条阳关大道；举行布魯塞尔地区特別代表大会是**全国特別代表大会**的第一阶段，全国特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应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和遵守共产党的正常党内生活法則来进行。

这样作才有可能恢复党的团結，恢复党的战斗力，恢复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鋒队的能力。

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对西班牙贵族 进行的“有效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认为应该参加比利时君主政体复兴运动的一个事件，即参加宫廷里举办的一次“花园酒会”。

原定“向議員請願的作法”被“有利”的递交“綱領书”的办法代替了。在这綱領书中我們看到共青团請求国王：

“运用您对佛朗哥將軍政府的声威，运用您与西班牙貴族的家庭联系，并以比利时人民和人权的名义要求赦免政治犯并給予西班牙人民民主权利”。

如果对《紅旗报》所說的派遣請願团到議員家中去一事所作一个解釋，那么递交綱領书无疑是“青年工人过去所缺乏的一个新手段”，“一个可以使君主制度按照国家的节拍存在下去，从而展現着过去未想到的远景吧”……

共产主义青年和学生摒棄了修正主义分子这派毫无动员性的胡言乱語，力主比利时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結成联盟，以便大力声援为反佛朗哥制度、爭取自由而斗争的英勇的西班牙人民。

修正主义的騙局与有效进行反对 战争危险的斗争相对立

1963年5月15日《紅旗报》上的杂文栏在引证緒艾南主教的一篇“具有很高思想修养的演說”(原文如此)时，写道：“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有着同一个公分母，即維護和平”。

所有的人嗎？难道包括肯尼迪、麦克納馬拉、阿登納、斯派达尔、李奇微、蔣介石、克虜伯、溫台尔家族、通用电力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老板們嗎？

对于这篇“杂文”來說，毫无保留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

战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的观点，以及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所有这些都已經过时了，都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1963年5月17日，《红旗报》杂文栏又以《国王与共处》为题，大肆赞赏地引用了(比利时)博杜安国王在伦敦中心商业区发表的讲话，并以讲话中的一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

“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和平，那么科学上的发现可以成为我们遭受危亡的原因。我们进行的努力可以归纳为几句话：**大西洋两岸西方国家的联盟合作**(黑体是作者标的)，与东方国家和平共处，始终不渝地继续进行核裁军与核监督的行动。

“等待着我们的任务是巨大的，但它值得我们满怀热情地去做。”

这段引文的结尾也就是这篇杂文的结尾。

既然如此，当然就用不着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了！

罗伯·达歇在1963年5月17日《红旗报》的一篇社论中，甚为赞赏斯巴克对《消息报》发表的谈话。社论说：

“毫无疑问，保罗—亨利·斯巴克的这篇富有积极意义的讲话给予《消息报》的支持，标志着‘政府思想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现在刚好为保罗—亨利·斯巴克及其同僚提供了一个机会，即开始一个‘有利于和平共处政策’的重要阶段的机会。大臣对《消息报》说，比利时将成为这一政策的倡导者。

“读过这篇讲话以后是会怀着满意的心情的。如果人们看到这篇讲话能在渥太华会议上得到确切的引伸发挥，那么这种满意的心情会更大”。

渥太华会议现在已经闭幕了。

它不仅没有缓和国际局势方面和在进行谈判以实现腊帕英基计划方面更进一步，也没有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

条約国家之間締結互不侵犯条約方面更进一步，而且正如《真理报》对渥太华會議所作的評論：

“西方列强在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核軍备竞赛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这一步使国际問題的解决更加棘手，并在裁軍和禁止核武器談判的道路上設置了新的障碍。”

反之，让·布魯姆却悍然不顾最明显的事实（見1963年5月28日《紅旗报》上题为《渥太华會議后，新的必要性》的文章，副标题为：《轉折的开端嗎？》），竟认为：

“……但是在空气中毕竟有新东西呀。

“會議的气氛是以两股潮流間的某种势均力敌为标志的：一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傳統潮流，这股潮流以‘冷战’政策和恐怖的和平功能的瘋狂理論为重要标志；另一股潮流，按照我們的說法，称作寻求派，这一派力图从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中得出积极的結論。保罗·亨利·斯巴克属于后一潮流。这一点表现出他尊重我国公众輿論的一切积极傾向。他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与华沙条約締約国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条約，和建立无核子区进行辯护。

“值得指出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会这次允許他这样作，这桩事情哪怕在一年以前都是不大能够設想出来的。

“当有人說渥太华會議揭示出国际政策方面有可能开始轉变的时候，他們並沒有弄錯。”

这段引文相当长，但对于說明我国修正主义分子的心劳日拙來說是有好处的。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要求正确地估价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魁首以及他們在工运中的代理人的作用和行动，要求揭露修正主义者散播的危险的、解除斗争的幻想。

修正主义者实际上拋棄了爭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制造的

战争危险的斗争的明确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把我国最广泛的群众团结到真正有效的行动中去——而代之以追随于斯巴克之流的狡诈阴谋的要求。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提到了不懈地为和平而斗争的綱領的梗概，所以我們就不再在此处加以論述了。

反对修正主义者所要的分裂——怎么办？

党内愈来愈多的同志正在摆脱领导机构的控制，拋棄领导机构奉行的政策，而投入坚决的反对修正主义斗争。

他們都可以衡量得出，领导机构想把党拖入深淵，它想把政策强加于党的毒害性。

他們懂得，使大部分党员投身政治行动（和参加会议）的方法是重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因为修正主义政策造成的是各組織的貧血与硬化。在这方面看一看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的情况是很有意义的，尽管布魯塞尔地区委员会的客观条件往往比国内其他地区困难，但是由于他們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鮮明，所以党組織的活动仍很頻繁，政治影响很大。

*
* *

工人运动的骨干——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正在摆脱改良主义，他們根据自己的切身經驗知道，改良主义的有害行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們正在寻找革命斗争的道路。

由于领导机构奉行修正主义政策，这些先进的劳动者看不出目前的比利时共产党就是他們所渴望的革命政党。

*
* *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的斗争喚起了党员和非党劳动者的

兴趣，他們正发现了或再次发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所具有的不可代替的重要性。这是我国工人运动真正革新的基础。

我們呼吁所有先进劳动者都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活动，加强我們的队伍。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将百折不撓地繼續并扩大自己反对改良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的斗争。

* *

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者已經为党和工人阶级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他們破坏了党的团结，今天正企图造成党的分裂。

怎样才能恢复这遭到損害的团结呢？

应该从政治上战胜修正主义，将修正主义从党内根除出去。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领导机构对党的严重打击，是长期策划的结果。

因此，目前党员和党的組織都要求举行一次**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以弥补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造成的损失。

全国特别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应遵照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进行，保证所有党员都能公平、全面地了解情况，組織真正的民主討論。

在各級党組織的帮助下，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应制訂一个总綱，提出一些能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应用于我国和国际环境的具体条件中去的观点。

* *

在党目前所处的环境下，即修正主义宗派集团控制了机构、书刊和报纸的情况下，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注意不仅使共产党人而且使劳动群众了解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行动建議。

*
* *
*

对工人阶级、对我国劳动人民以及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负有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重视工人运动和劳动群众的最高利益，要站在争取权利要求、反对战争危险、争取民主自由、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最前哨，要站在一切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反击的最前哨。

制定工人阶级行动的目前主要奋斗目标，确定行动方式，组织行动并争取必要的同盟军，这就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党组织应尽的义务。

在我国当前具体条件下，这样一个团结与斗争的纲领包含些什么内容呢？

我们认为，在比利时将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个社会与政治的权利要求总纲周围的时刻已经来临了，要想全部获得这些权利要求，则需通过进行反垄断资本、反垄断资本的国家行动。

在1950年和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期间，大多数工人在辉煌的斗争中团结一致，曾使资产阶级发抖，曾使资产阶级政权动摇。

改良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代都善于巧妙地利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整体感和它作为整个阶级来行动的意志，但是他们是为了把这种意识和意志转移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补“计划”。

从近年来的各种胜利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工人阶级，必将团结一心进行斗争，忍受必要的牺牲，以实现真正有效的目标。

目前阶段，问题在于准备并组织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争取全部实现权利要求总纲而斗争。

这个总纲中需包括工人阶级当前物质与政治权利要求的根

本点,諸如:

——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最低三周的工資照付休假,享受退休金的年龄降低五年;

——普遍減輕打击劳动人民的直接稅和間接稅(对中等薪金或工資和低薪金或工資平均減輕50%);

——普遍提高,

工資、薪金和退休金,

对患病和殘廢的津貼費(十二万法郎以下的实际工資的80%),

普遍提高失业和“生活安全”补助金(使之能維持最低生活标准),

普遍提高家庭补助(特别是对第一、二个儿童)和其他社会补助;

——免費医疗;

——对妇女和青年实行“同工間酬”原則;

——教育民主化(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采取真正使劳动人民子女享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社会措施);

——廢除反罢工法,爭取获得在企业中开展工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权利(特別要爭取享有在工作地点集会的权利和禁止資方迫害);

——实行联邦制;

——停止屈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侵略政策,清除这种政策造成的后果;

——取消在比利时的外国基地和原子武器;

——不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武装力量;

——不增加服兵役期限;

——縮減一百亿軍費开支。

許多工会和政党的代表大会都曾把这些权利要求列入自己的決議和竞选綱領，現在右派和修正主义的領導人却迫不及待地將它們束之高閣了。

現在的問題不是去无謂地列举和开列出各种各样工人目前的殷切希望。

权利要求总綱應該是一个團結整个工人階級採取行动的綱領。

實現这些权利要求的款項从何而来呢？

應該从浪費資金的地方提取，

——从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壟斷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中提取，

——从巨額收入者的逃稅中提取，

——从巨額軍費預算中提取。

我們希望先进的黨員們号召劳动者就这个**权利要求总綱**的确切、完整的内容进行討論并把它确定下来，使它成为整个工人階級斗争的短期奋斗目标，将其他劳动人民階层的广大群众團結在工人階級周圍，与工人階級站在一起。

我們希望他們促进比利时总工会从事战斗性的工会活动，促进由基层組織起来的統一行动的實現。

我們希望他們促进系統的战斗性的工会活动——这些活动既相互配合又各有不同——團結一切行业，不給資本家任何可乘之机，直到最后取得行动的勝利。

当前各工厂、各行业和区域性的权利要求斗争及反对資方和政府进攻的斗争，都是这个普遍行动发展的准备和保证。

另一方面，为这个权利要求总綱进行斗争，不仅能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和战斗性，而且有助于劳动群众开展其他活动，尤其有助于反对战争危險、爭取和平和爭取銷毀熱核武器的行动，有助于真正貫徹无產階級国际主义所要求的行动。

* * *

我們可以預料，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目前階段，必將是總危機的加劇，矛盾必將增加，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工人運動將日益高漲，階級鬥爭必將激烈起來。

我國 1960 年 12 月至 1961 年 1 月期間的大罷工是行將爆發的偉大鬥爭的先兆。

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是工人階級取得勝利的必要保證。這個政黨要在反對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的烈火中鍛造出來，需在從事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經過千錘百煉。這場鬥爭的勝利是與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失敗密切相關的。

* * *

修正主義者無法否認國際力量對比已經變得愈來愈有利於社會主義。

但是，他們企圖使人相信，這個新的力量對比，會是解除鬥志，投降帝國主義和拋棄行動的一個原因。

我們則要說，恰恰相反，我們應該因此而提出更有膽略的奮鬥目標。

目前，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革命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力量，我國工人運動的策略應以此現實情況為依據。

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從事社會主義建設，這些並非是超出當前現實的抽象目標和書生之見。

正是自現在起，工人階級應時刻準備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为自己規定，要在这场革命斗争中起到领导者和組織者的作用。

对我们說来，这不仅是一项宣傳任务，而且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工人阶级抵抗着资本家的进攻，应该为开展声势浩大的运动創造条件。

我們要指出：日常的斗争只触及罪恶所造成的后果，而未触及产生罪恶的根源。

我們还要說明：罪恶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归根結蒂，必須打倒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一切形式的剝削制度，消灭貧困，消灭危机，消灭战争。

通过日常与资本家冲突所記取的教訓，我們應該揭露资产阶级的国家的作用，揭露改良主义与修正主义。

我們的政治行动应该作到，把我們在人民群众当前斗争中的先进活动和不断使工人阶级准备实现最終目的結合起来。这个目的超出了現存制度的范围，危及現存制度。这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

如果不把两者結合起来，那么，不是党的失敗——党变成一个宗派——就是蜕化变质，墮入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

一个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行动可以發揮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这种潜力长期以来受到了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抑制。

只有这样才能打倒这个泥足巨人——即托拉斯和壟断资本的政权。

真理必将战胜修正主义者的謊言。

站在斗争崗位上的工人阶级的团结万岁！

让我们为反对修正主义破坏分子所期望的分裂、为实现真正的团结——即清除了修正主义毒素的共产党的团结——而百倍努力。

为使共产党成为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奋勇前进！

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九六四年 五月 十三日